RACHEL CUSK

A LIFE'S WORK:
ON BECOMING A MOTHER



成为母亲

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

[英] 蕾切尔·卡斯克 著

黄建树 译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RACHEL CUSK

A LIFE'S WORK:
ON BECOMING A MOTHER



成为母亲

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

[英] 蕾切尔·卡斯克 著

黄建树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RACHEL CUSK

A LIFE'S WORK:
ON BECOMING A MOTHER

成为母亲

一 名 知 识 女 性 的 自 白

[英] 蕾切尔·卡斯克 著

黄建树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为母亲/（英）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著；黄建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A Life’s Work：On Becoming A Mother

ISBN 978-7-208-15258-8

I.①成…　II.①蕾……②黄…　III.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IV.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0671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010-52187586

书名：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

作者：[英]蕾切尔·卡斯克

译者：黄建树

责任编辑：朱艺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ISBN：978-7-208-15258-8/G·1909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Email：info@wenjingbook.cn

目录

致谢
序章
四十周
莉莉·芭特的宝宝
肠绞痛与其他故事
爱，离别
妈妈宝宝
额外的狐狸
地狱厨房
帮手
请别忘了大声叫
和睡眠说再见
呼吸
妒火
译后记

献给艾德里安

致谢

我想感谢里根·亚瑟与乔治亚·加勒特，我们就如何做母亲这一话题聊了很多，也有过很多交流，这让我深有感触。我的继女、朋友及铁杆盟友莫莉·克拉克虽未被本书提及，却存在其中：我希望她某天能读到这些内容，并喜欢它们。在某年2月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把她的幸运项链送给了我，也许她已不记得这一幕，我却记得。

孩子象征着想象力，母亲的语言因此变得缺乏想象，如同命令，且很抽象。孩子象征着成长，母亲因此变得缺乏活力、空洞，且无法与自然出现的新奇事物互动。孩子永恒且不朽，母亲却时间有限，必须按安排行事，且匆匆忙忙。母亲的道德变成了片面的责任与纪律。她对于未来与希望的感觉被自己的亲生孩子所取代；因此，产后抑郁症可能会长期潜伏。她的孩子继承了她的脆弱情感，她因此可能会过度照看孩子，忽视了自己，因而感到愤恨。此外，她的思维过程被限制在成年人理性的框架之中，于是鬼魂的声音与面孔、动物、想象出来的逼真场景与她渐行渐远；对她而言，它们像是病态的妄想与幻觉。她的语言失去了情感与咒语的力量；她解释着，争辩着。

——詹姆斯·希尔曼：《不称职的母亲》

序章

回首往事，若我能在某一刻弄清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总想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有孩子。这个问题很神秘，让我觉得最为有趣，比爱、工作、寿命以及幸福程度等问题都有趣。我能想象其他那些问题，却无法想象生孩子这件事。我想知道我能否挺过生孩子这一关，并非因为它的答案会让做母亲这件事变得可以想象，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若一直被疑云所笼罩，会让我分心。我想控制的，正是这件令人分心的事，它与做母亲本身同样重要。我视其为一种威胁，一种我当不了母亲的缺陷形式。可是，女性必须且的确希望自己以后会生孩子：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渴望，还有些人游刃有余，让别人觉得她们对此事毫不在意。我的策略是否认，因此，等真做了母亲，我既惊讶又措手不及；我不知做母亲会带来何种后果，且有个毫无根据却很独特的想法：我随随便便就当上了母亲，这全拜某种比我强大的力量所赐，因此只能认命。

某种意义上，本书试图讲述我初为人母的经历，以及生孩子只是个序幕的戏剧性事件。毫无疑问，它记录了我的转型期。我很想谈一谈自己对做母亲的看法，这种想法最初很强烈，可它藏得很深，在我那重组过后的生活表象之下。我女儿艾伯丁出生几个月后，它消失殆尽。我故意忘掉我在不久前强烈感受到的一切：事实上，我难以忍受。我对这世界充满无止境的欲望，凡事我都感兴趣，我渴望做回当母亲前的那个自己，那个回不去的自己；我渴望获得自由，生孩子前我也许有过却没有珍惜的自由。于我而言，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我总在谋划从里面逃出来；艾伯丁六个月大时，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此时我重回围城，就像某个逃犯被捕，只能闷闷不乐地接受现实。之前我曾慎重考虑过的自由变成了悬挂在两次怀孕之间的一张小吊床：我陷入包围之中；正是在那时，我才再次真切地感受到做母亲既真实又奇怪。在怀我二女儿杰西以及她出生的头几个月内，我在这种感受再度消失前写完了这本书。

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悲观地认为，一本讨论母性的书只能吸引其他母亲；即使是母亲，也只能吸引像我这样的，她们觉得做母亲的经历非常重要，以致阅读相关读物能给人某种奇怪的慰藉。我提及“其他母亲”和“只能”等字眼，仿佛充满了歉意：因为几乎无法对外界解释做母亲的体验。做母亲时，女性放弃了自己的公众价值，以换取一系列私人意义。如同某些人耳听不见的声音一样，别人很难识别这种私人意义。若换个角度去聆听，也许我们能听到那些声音。“这星球上的所有人都为女人所生，”美国诗人及女性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1]写道，“所有男女共同拥有的一段不可否认的经历，即我们在某个女性身体中长达数月的成长期……我们大多数人从女人的角度首次了解爱与失望，刚与柔为何物。这一经历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它将伴随我们一生，甚至持续到我们弥留之际。”

当然，有很多有分量的分析、史学研究、论战以及社会研究去讨论如何做母亲。人们将其视作阶级、地理、政治、种族以及心理话题，并严肃对待这些话题。1977年，艾德丽安·里奇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受她的启发，我才记录下自己如何做母亲。然而，我做母亲时，觉得之前从未有人写过如何做母亲：这个例子也许只能说明我所描述的那种不善分辨音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不善分辨音调，每当为人父母者说话，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便会受折磨，我们小时候便遇到过这种情况，等我们长大成人，它又让我们陷入困惑，想知道为什么从未有人告诉过我们为人父母意味着什么—包括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母亲！我确信，若三年前看到如今自己所写的这本书，我肯定会纳闷：如果本书的作者觉得生孩子这么恐怖，为何她一开始还会费尽心思地去要孩子呢？

本书并不研究母性及其历史；同时，本书也不讨论如何做母亲，以免有人读到此处依旧怀有如此幻想。我只是写下了自己对生孩子经历的看法，用一种希望有人认同的写法。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得承认这种坦诚的文体让我略感担忧。除开需要自我暴露，它还要求作者愿意打扰自己周围人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我所谓的打扰其实就是忽略。我并未过多谈论自己的具体情况、与我一同生活的人，或者

别的人情世故—我与孩子的关系难免会涉及这些人情世故。我所做的，是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作一张画布，方便我描绘这本书的主题，即母性。

可依我看，孩子以及谁去照顾孩子这两个话题已同政治有了密切联系；所以，写一本讨论母性的书，却不对我如何能抽出空来写这本书略作说明，此举也许有些自相矛盾。艾伯丁出生的头六个月，我在家照顾她，我的伴侣则继续上班。这段经历很有说服力，它向我揭示了之前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件事：孩子出生后，他/她母亲和父亲的生活轨迹便不同了；两人之前地位基本平等，如今却处在了某种彻底敌对的关系之中。在家照顾孩子和在办公室上班的一天截然不同。不论它们各自有何利弊，这两种生活都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孩子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从最开始便相互对立，此后，男性的统治地位必然愈发牢固：父亲逐渐得到了外界、金钱、权威和名望的保护，而母亲的职权范围则扩展到整个家庭领域。众所周知，若夫妇双方均有全职工作，母亲一方通常要承担的繁重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远超她们应做的份额，因此，她们必须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应对孩子会出现的紧急情况。此议题事关性别政治，但哪怕是在最开明的家庭—我承认我家便是如此—育儿者和工作者之间也存在一道鸿沟。跨越这条鸿沟异常困难。对父亲来说，一种对策是自己待在家而让母亲去工作：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差别如此巨大，并深受保守主义影响，因此也许男人们在照顾孩子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伴侣的仆从。然而，几乎没有男性会容忍这种安排可能会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坏处；言下之意是，能够容忍这一点的男性比大多数同胞更加致力于性别平等，这让他们冒着颜面扫地的风险，同样的风险也让女性做全职母亲的前景黯淡。父母双方也可以雇奶妈或保育员，然后都去工作，有时候也可以各自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某几天在家带孩子，另外几天去上班。若两人中有一人在家办公，这种模式便会更难操作，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了孩子，像我这样的职业可谓“理想职业”。在家工作的那位在家务活分配上难免会遭到不公正待遇。他们的角色开始类似于空中交通管制员[2]的角色。

还没生孩子时，我曾不动感情、轻松愉快地以为，雇人去专职照

顾孩子能解决既工作又当母亲的难题。那时候，对我来说，公平似乎便是一切。我不知道怀孕生子的经历对性别平等这一概念有多大的冲击。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于是女性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她体内存在另一个人，孩子出生后便受她的意识所管辖。孩子在身边时，她做不了自己；孩子不在时她也做不了自己。于是，不管孩子在不在身边，你都觉得很困难。一旦发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陷入矛盾之中、无法挽回，或是陷入某种神秘的圈套，你被困在其中，只能不停地做无用的挣扎。

就我而言，我们决定一起推翻传统的家庭文化。别人对此的反应有惊讶，有赞许，也有恐慌。比起简单的不走寻常路，这种最具惩罚性、最不可行的家庭生活模式似乎少有人评论，也少有人关注。我的伴侣辞掉了工作，我们迁出了伦敦。人们开始打听起他的情况来，仿佛他身患重病或已经过世。他们热切地问我，他要做什么呀？在我这儿得不到答案，他们便直接问他。在蕾切尔写她那本讨论照顾孩子的书的时候照顾孩子，他如是回答。似乎没人觉得这个回答特别滑稽。

照顾孩子这份工作地位低下。它让人离群索居，感觉无聊，要求苛刻又没完没了，令人精疲力竭。它会侵蚀你的自尊，将你同成人世界割裂开来。越是与生活脱节，这件事做起来就越困难；可是，让孩子意识到你的存在，而不是让自己活在孩子的世界里，也很难。哪怕你赞同所有人都认可的生活方式，可依然有些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我坚信，在这一事业中，慷慨比平等更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父母即祸害”这种说法实在是包罗万象，这是因为它吸纳了“善”“恶”这类褒贬意味明显的形容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基本上见不到这些词。身为母亲，你要学习如何既当烈士，又当恶魔。若没有孩子，我可能没什么个性，与这种可能性相比，做了母亲的我更正直、更讨人厌，与世上这两类事物的联系也更紧密。

我试图在本书中探讨上述话题中的一部分，旨在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女人转变为母亲意味着什么。我对女人和母亲的定义一直很模糊，可定义的过程持续让我着迷。这过程一直都是如此，我并不怀疑

这一点，可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心路历程对我们而言，要远比我们母辈所经历的漫长。生孩子和做母亲如同铸造性别不平等的铁砧，在我们的社会，女性的责任、期待及经历类似男性，所以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感到恐惧。女性变了，可她们的生理条件一直未改变。同样地，母性虽为我们的性别史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可窗玻璃极易碎。我一直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每一位成员都会经历从出生到独立异常艰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征用某个女人的生命，这正是我试着去描述的内容。

本书用朴素的方式来探讨母性这一主题，撰写本书时，我做母亲的最初热情还在。本书描绘的这一段时期里，时间似乎停滞不前，并未线性流逝；所以我按主题，而非按日期来记录它。毫无疑问，我希望自己也许会从其他阶段收获启迪。但我却借鉴了其他人的思考，在书中包含了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读所想的小说中的一些讨论；对我而言，这些讨论能表达我想讨论的主题。这些小说的选择确有偏颇，带有私人性质：很久以前，文学界便发现、记录下这样一块天地，我自认为是它的首位居民；有数不胜数的诗歌与小说可取代我选择的作品。比起找出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来说明我居然引经据典过，更重要的是阐明做了母亲以后人的感受力会如何变化：因为有了小孩，我的阅读经历—实际上是文化类作品的阅读经历—发生了巨变，因为我发现，“艺术与表达”这个概念比我之前认为的要更为包容和必要，在产出和创作的欲望方面也更具人情味。

行文至此，可将眼下这些文字视作一封信，收信人为愿意读它的女性；愿我的经历能够陪伴你们。

四十周

在泳池的更衣室里能看见很多女性的身体。如同洞穴壁画一般，裸露的身体有一种叙事特质；这一特质会因衣着与环境而沉默，它只会在此，这个潮湿的公共场所出现，在这里，我们依据性别进行匿名分组。虽然我也是女儿身，更衣室的这一幕依旧短暂地让我产生了一种孩童才有的恐惧，看到这些乳房、腹部和臀部，我反感且敬畏；这些非理想化的、原始的肉体忘却了自己的魅力，似乎纯粹为生殖而存在。吹风机在歌唱，储物柜门因为开合而发出巨响，淋浴房那铺着瓷砖的地板满是药膏与泡沫。青筋暴露、肌肉发达的大腿来回阔步，赤裸的手臂整理着纠缠的头发，用毛巾擦着颤得厉害的皮肤。乳房、腹部和臀部各式各样，有的有痣和疤痕，皮肤或皱或光滑，有的如同刻了神秘符号，有的则空白一片，像刚成形的大理石：是陈述，也是物料，它们作为物体而存在，单靠外形去传达信息。有时更衣室里有小孩，我发现他们凝视的样子与我过去一样，我现在还有点想这样做：他们对于成人的外形，其中明显突起的部分，身上的绒毛，以及饱经风霜的样子所暗含的信息表现出过分的惊讶与恐惧，这一切揭示了愉悦和痛苦，与交媾、怀孕以及生产相关的未曾透露过的秘密。如同恐怖电影的预告片一样，成人的身体明显地暗示着想象力范围内那些一直让人心绪不宁的存在，直到法定年龄，你才会完全明了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小时候，从对生孩子的后果有所了解的那一刻起，我便担心起这件事来。当时，我对生孩子的了解不含脚注，也无条款表明你不一定非得要孩子，更别说你也许就无法生育：如同生活中所有的事实一样，生孩子这件事没法儿讨价还价。看着我那休息不足的瘦小身体，我只知道，终有一天，另一个身体会出自其中，即便我不清楚它会如何、从何处出来。就我所理解，我不会在以后装配某种提取装置。这具躯体极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如同装满糖果的墨西哥皮纳塔娃娃[3]。有些人留着这些娃娃，甚至在最急迫、最难以抑制的欲

望的刺激下也无法让悲剧—娃娃的使命所在—在它们身上上演。大多数人不会留着这些娃娃。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在当地孩子们的派对上，我们曾用棍子击打那些娃娃，直到它们炸开，随后交出宝贵的糖果。无须真知灼见就能知晓生孩子会异常痛苦。我很快便借鉴早年间的疼痛经历来理解这一痛苦。于我而言，忍受身体上的不适是我是女人这一事实的必要附属品；每当我切到或擦伤自己，摔倒或去看牙医，我总是既感到痛苦，又因此感到恐惧，同时我也恐惧，自己明明注定会在未来感受到生孩子所带来的神秘剧痛却还是记得这点儿小伤。

上学时，有人给我们放了一部讲述一个女人生孩子的影片。那女人裸着身子，胳膊和双腿瘦而有力，动来动去，她腹部有个巨大突起，这让她饱受折磨；她头发很长，乱蓬蓬的。她没被禁锢在床上，没被一圈站着的穿白大褂而闪着白光的医生和护士围着。事实上，银幕上的她压根儿就不在医院。她独自一人站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除了一把放在中间的矮凳子外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把凳子，我有点分心。对于即将到来的猛攻，这把凳子似乎不是合适的防御工事。镜头很暗淡，在夜间拍摄；观众观看时，就像是通过墙上一个孔窥视某种糟糕且隐秘的事物，某种我们注定无法理解也无意观看的事物。那女人一边呻吟，一边咆哮，在房间里踱步，如同疯人一般，又像是关在笼中的动物。她时不时在墙上靠几分钟，双手抱头，然后大喊着朝对面的墙上撞去。仿佛她正在同某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在她的一系列反应所造成的噪音及破坏的映衬下，她的孤独显得很奇怪。这时，我注意到她其实并非独自一人；另一个衣着完整的女人正安静地坐在角落。那女人偶尔会小声说话，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这声音虽然微弱，也帮不上什么忙，但的确是一种鼓励。她的存在让分娩过程变得颇为正式，可她帮不上忙，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这很残忍，也让人难以理解。那裸体女人用力撕扯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咆哮了起来。突然，她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房间中间，坐在凳子上，一条腿弯曲着，另一条腿有力地伸向一旁；她的双手紧紧抱在胸前，仿佛准备唱歌似的。她的同伴起身跪在她身前。摄影机是固定的，我们看不到事态发生转折时的特写镜头。事实上，画面似乎越来越暗，越来越不清晰，

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时间，两个女人一动不动，看起来像是在亲密交流，两人的身影也混在了一起；突然间，穿着衣服的女人身子向前倾，伸出双手，然后一个不断扭动小身体的宝宝便落在了那双手里。裸体女人发出了最后的痛苦的叫声，这声音如长笛般，音调越来越高，最终变为愉悦的约德尔[4]式唱腔。

“娜塔莎在1813年的早春结婚，”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处描绘年轻的女主角时如是写道，“1820年时已有了三个女儿，此外还有一个儿子，她渴望生儿子，眼下正在照料她儿子。她变得愈发结实，肩也变宽了，于是很难在如今这个健壮且充满母性的女人身上辨认出昔日那个苗条且活泼的娜塔莎的影子。她的容貌更加轮廓分明，表情冷静、柔和而且安详。她脸上没了不断发光的勃勃生气，那股生气曾在她脸上燃烧，让那张脸充满魅力。如今，别人往往只能看到她的脸和身体，而看不到她的灵魂。映入人们眼帘的她，只是一个强壮、模样俊俏且能生孩子的女人。”

怀孕时，肉体与心灵的生活不再努力区分彼此，而是不可避免、历史性地交织在一起。若将人生比作一套书，描写年轻、美貌和独立的那一卷完结后，接着便是描写为人母的那一卷，比起前一卷来，这本书从第一页起便呈现出更长且更难读的迹象：故事讲述了托尔斯泰的娜塔莎如何从声音稚嫩、喜爱打扮的万人迷变为谜一样的一家之主，也讲述了女儿如何变成家长，女主角如何变得同浪漫情节势不两立。托尔斯泰并未写出这么一卷，而是写了《安娜·卡列尼娜》来发掘母亲这一角色中依然存在的女性形象，并展示其破坏力。要知道，每个人做起母亲来都差不多，任何花招都无法以和平方式将人从这种职业中解放出来；怀孕则是学习成为人母的新兵训练营。

我深思熟虑后才来到这个营地，但并不清楚营地的情况。我对怀孕的了解与大家一样，换言之，我只了解其表象。我多次经过这里，也曾好奇高墙之后到底在发生些什么。我知道每一位被收容者都必须忍受疼痛才能得到释放许可，我曾想象过这座营地是这么一个地方，

在这里会出现一些神秘且专业的准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有装在密封的信封里的绝密信息，这些信息会解释这种疼痛的含义，也会消除疼痛。我告诉医生我怀孕了，他在一张小纸片上做了些加法，写下了一连串日期。现在是7月。他给我一个日期，来年的3月。我花了些时间才意识到这是我的预产期。他让我去见一见助产士。出去时把门带上，他说。

助产士给了我一些信息，可都是些特定类型的信息：是我预计会遭遇的一些事，但不涉及她和其他人准备如何应对这些事。她让我一两个月以后再来。我原以为我至少能得到一些针对怀孕的专业知识，以缓解我的恐惧。怀孕期间我到底该怎么办？看到我那张苦恼的脸，她推荐了一两本也许能读一读的怀孕方面的书。我去买了那些书，然后回了家。孕期持续两百六十六天，四十周，九个月，或三个学期—取决于计数方法。医学界按周计。对公众来说，别人的孕期和日常生活没什么两样，所以他们按月份计。我不知道谁会按学期计，老师们也许会这么做，或是生第五个孩子的女性。只有那些饱受痛苦、含冤入狱，以及心碎之人才会按天计数。我焦躁地从一种计数法换到另一种计数法，不过我的怀孕故事最好还是按学期来详述。第一学期以呕吐和疲惫为特色，第二学期则是大肚子和幸福感，在第三学期，你也许会有如下体验：脸变浮肿、腕关节和膝盖肿胀、血管静脉曲张、痔疮、长期胃灼热、便秘、手脚不便、健忘、疲乏、惧怕生孩子、渴望孕期结束。

我注意到，这些书里没有提及准妈妈们最开始如何了解宝宝出生的方式，此乃孕期的一大特色。书中有足够多的描述这一事件的插图：这些插图通常以一系列截面图的形式呈现，第一幅展示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最后一幅则展示宝宝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我开始怀疑，这段经历类似于你从大型喷气式客机的乘客里被选中要求自行驾驶飞机，并使之降落。书中偶尔会出现一些束手无策的女性的照片和形象，仿佛正处于死亡的瞬间：她们愁眉苦脸、大汗淋漓、苦苦哀求，双眼或紧闭，或望向天空，她们的身体淹没于一堆床单和医院的管线中，或因疼痛直立起来，张开手臂，摆出十字形的姿势。这些照片仿佛正展示着某段秘密的女性历史，一个被秘藏起来的关于痛苦的

故事。可是，哪怕这些图片如此坦诚，似乎依然无法参透分娩的秘密。书中的说明文字写道：很多女性发现，若采取直立的姿势，生孩子会更容易，抑或宝宝出生的那一刻会感到隽永、宁静。

谈到自己生孩子的经历时，我母亲总是异常坦率。她说，时机一到，无论她们给你什么药，全都吃掉。我也从其他女性那里得到过让我感到不安的线索，她们一提到“痛”这个字，便一边发出疲惫的笑声，一边大声说话；有的则故作神秘地说：事后你就变了个人似的。从没有人解释这些线索；突然间，似乎一切都变得非常安静，仿佛有人无意中违背了某种沉默的誓言。我决定，一旦生了孩子，我将抓住一切机会来传播这些经历；私底下我从未遇到过这种追求真相之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也从没听说或读到直接描述这种最普遍存在的事件的内容，这一事实表明，另外还有一些可怕的事物，它与这个谜有着密切联系：不知何故，在这些煎熬的时刻，我们身上某种基本成分被拿走，于是事后虽然样貌与声音大致与之前一样，但那时的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幻象，被洗了脑，无法为真相作证。电影《天外魔花》[5]的某个场景让我有类似感受，当时，两个尚未被外星人控制的角色中的一个透露说他事实上已被外星人控制。电影的结尾处给了那个男性角色的女朋友的脸部一个特写，她脸上写满了恐惧，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如今独处于一个满是机器人的世界。

享有特权的现代女性是这样一种生物，若她们愿意，其性别可一直作为表面特征存在。我如何理解“女性”这个词呢？虚假的事物；是化妆品的储藏室，是充满了洒了香水的精品店以及包装精美的商品的世界，也是充满了假睫毛、法国润肤霜、粉末胭脂的世界；是受苦、自控、忍耐等字眼通常只与减肥相关的世界；是充满温和、自愿压迫的世界，人们也许能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处找到其与现实的交汇处：其中包含了特定类型的不快、歧视、恐惧，抑或一片完整的生存领域，这片领域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且随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发个性化、不确定、难以言喻。若女性有其固定含义，那么它曾经的含义现已不适用；然而，就广义而言，就生殖意义而言，女性曾经的含义一直沿用至今。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不论她们因为性别不平等吃了多少苦，她们还是得履行自己的使命。在履行这一使命时，我感觉偏离

了正确的人生航向，我一路向前，却无法到达目的地；仿佛我登上一列火车，从车窗能看到我之前一直走的那条路；火车与那条路平行行驶一段时间后加速，然后匀速地东开一段，又西开一段，开向满是陌生山丘的远方，将一切抛在车后，任其消失在视野中。

我去比利牛斯山徒步旅行。到目前为止，唯一能证明我状态有所变化的事实是，一整周的时间里，都有一大群小虫跟着我，它们围着我漫无目的地乱转，像粉丝，也像保镖。那周末临结束时，我偏离了既有路线，去了一个海拔很高结了冰的湖泊。我必须重新沿着上山的路下山才能回到原来的路线，后来我决定按着正确的方向穿过积雪，希望能在山坳通道处的另一头重回正轨。我绕着那湖泊走，这座极寒的湖泊呈超自然的螺旋状，地势沿着这座湖泊扶摇直上，仿佛一只碗的边缘部分。这些边缘部分由于覆盖着冰雪而非常滑，沿湖缓慢走了一会儿以后，我明显陷入了危险之中：由于帆布背包太重，我可能滑向冰面之下，然后沉入湖底。我缓缓往回移动，试图走另一边，那边有一条锯齿状的小径，几乎垂直向上地通往山坳通道。在顶部，我在通道的一个微小的间隙处发现了一个神殿，里面有一座圣母玛利亚雕像。我迷信地祈祷了。看起来整个法国就在我身前，就在下面几英里处。在我脚下，这座山突然急剧转了个向，通往一个被雪覆盖的狭窄溪谷，看起来我必须穿过这溪谷下山。雪看起来跟云朵一样，既松软又深，溪谷看起来则如同天地之间的距离那样远。我突然感到一阵疯狂。我如同一个相信自己会飞的孩子，突然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极限所在。这幅既美丽又可怕的景致似乎突然间变得渺小且魔幻，就像一个只有娃娃般大小的世界，我坚信自己像巨人一样，几步就能跨越这个世界。连着好几天，我都是缓步前行，步履艰难，紧贴着这座山；此刻，我仿佛到达了天堂一般，放纵地尖叫，开心地跳入雪中。当然，所谓的雪并不是雪。它其实是冰。等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时，已经太晚了，天空和山脉快速地打我身边飞过，显得很模糊。山坡很陡，我背部着地，垂直落在了山坡上，我试图让脚和胳膊埋入如玻璃般坚硬的粗糙的雪的表层，可我的帆布背包起到了雪橇的作用，让我越滑越快。我面前的比利牛斯山如同长长的滑雪道，不断向下延伸，山势在海拔很低的远处渐渐平缓下来，直至遇到一道岩石

屏障。快速滑过冰面时，我的皮肤火辣辣。我开始像石头一样蹦蹦跳跳，在空中翻滚。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没做好迎接疼痛的准备，哪怕我知道自己也许很快就会扭断脖子。在我看来，什么也无法阻挡我往下落，我试着振作起来，去理解，去做好准备，去认识到或认可我的身体可能会走向灭亡，可我还是一如既往；我因恐惧和怀疑而神志不清，却依旧一点未变。这一事实出人意料，比任何事情都让我害怕。我撞上了一块巨大的卵石；我的身体被撞得颠了起来，此时，我疯狂地用指甲抓住卵石。指甲像纸一样裂开，可我还是抓住了那块石头，用胳膊紧搂住它不放，从而避开了致命的撞击。突然间，我停了下来。卵石附近有一摊碎石，我眼下正在慢慢朝这堆碎石行进。我的胳膊流着血，失去了知觉。这座微型石头岛大约位于半山腰处。我坐在岛上哭了起来，此时夜幕开始笼罩在巨大的、如同珐琅般明亮的比利牛斯山上。我好像觉得自己不再配得上勇敢、理智和博爱这些字眼。我已经放弃伪装成别的性格，这种伪装假装为人提供庇护，却只是开些空头支票。我谁也帮不了，谁也保护不了，只能干坐着，为自己的不幸哭泣，在这不幸毁灭的影响下，我才意识到它。

我该如何在夜幕降临前穿越溪谷剩下的部分下山呢？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眼下，我下方很远处出现了一个幻影，这幻影一开始像蚂蚁一样，然后慢慢地变大，离我越来越近。一名男子正配合着绳子和冰爪，用冰锥沿着溪谷往上凿出一条路来。他可不是过来带我回家的母亲。他像另一种母亲，打算指导我正确地靠自己穿过冰原下山。你得一直面对着山，他说。你得给自己的手和脚挖洞。我有些过于自艾自怜，为他不打算亲自带我下山而感到愤怒。我曾想象会有担架来救我，兴许会有直升机来。被山坡伤过之后，我很害怕它，更重要的是，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继续前进的勇气。我希望那男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可身处此地，感情用事可行不通。而我恰恰是太感情用事了。指导完我以后，那男人转过身去，在暮色中继续向上。我取下帆布包，把它丢下山，想让事情变得简单些。帆布包弹起来，向下俯冲，然后消失不见，像鹅卵石一样。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往回走，回到先前的冰上去；结果，我慢慢地下山，其实是在往下坠，之前栩栩如生的回忆紧随其后。看样子，我的感受并不会阻碍我的行

动。一直生活在感官世界之中，我这一生还从未亲历过行动和感受间如此直接的冲突。下山时，我觉得自己宁愿像这样，变得务实和勇敢。可当晚在帐篷里，一想到所发生的一切，我就有些害怕，这又让我心烦意乱。我想知道，针对已发生的那些事，是否存在更好的应对措施。我还想知道，到底是活下来更重要，还是恐惧更重要。我还没有仔细考虑怎样做母亲这个问题，不过我怀疑，它也会使事实和感受相冲突，与我爬山的这段令人不安的经历一模一样。

回家后，我卧床了两周。我似乎饱受头晕之苦。由于地心引力，让人头晕的公转，以及我对于竖立的事物的恐惧，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胃里突然翻江倒海，感到有些恶心。被子下面，我的身体开始变暖，变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那长老茧的脚，和因受冻和爬山而变硬的躯体，似乎变形、融化和膨胀了。再次下床时，我成了一个茧。

超声科医生命令道，上下扭一扭你的屁股，看看能不能让宝宝动起来。床旁边的电脑屏幕发出了静电声，受雪花干扰的屏幕里有一个小小的黑白的甲壳纲生命体。虽然充满怨恨，我还是乖乖扭起屁股来。加油，医生冲着那小生命发出刺耳的催促声，你倒是动给我们看一看啊！她把我肚子上的扫描器压得更狠了。小生命挥了挥自己瘦弱的双手，仿佛很烦躁。我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它，让它免受这种折磨，但我却一言不发。医生让我再扭几分钟屁股，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某种医疗程序，可很明显，看到小生命动来动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是让我开心。我想起了一部西部片，影片中，一个牛仔朝一个印第安人的脚开枪，强迫他跳舞。医生问我要不要超声波照片；我得到了一张亮晶晶的纸，上面印有屏幕上出现的雪花般的图像。

回家的路上，我看着那张纸。可以模糊看见那个小生命的侧影，它斜躺在阴影中，脑袋像是聪明的泡状物，依附在宛如灰白色键盘的脊柱上。医院还给了我一堆小册子，它们涉及膳食、针灸、瑜伽、产前培训班、父母培训班、催眠术以及水中分娩等内容，这些册子里的

信息我全都不陌生；要知道，现代怀孕受控于某种宣传方式、标志及语言都属于同一种类的体制，令人惊叹。就纪律严明而论，任何朝鲜啦啦队都无法与英语世界的怀孕女性相媲美。我渴望收到某种诡计的暗号，也渴望收到反抗的秘密信息。我的性别已然成为一个精心布置、很早前便已布下的微型陷阱，我无意间走入其中，如今已经无法逃离。我身上仿佛被怀孕打上了电子标签。我带有女人味儿的一举一动正受到密切监控。

有关怀孕的条条框框以巧妙的形式融入了一本名为《艾玛日记》的书中。在医院里，人们问我，你有《艾玛》这本书吗？这问题明显跟简·奥斯汀无关。再拿一本吧，以备不时之需。我发现艾玛是一个虚构角色，由国民保健制度[6]所创造，她撰写了一本周记来记录自己的孕期。她丈夫叫彼得，她很喜欢用感叹号。她有一头整齐的棕色头发，一双蓝眼睛，穿着笔挺的亮粉色衣服。她有两个朋友，也怀孕了。其中一个是个快活的未婚女孩，有个犹豫不决的男友。另一个是个年长一些的黑人女子，她有个守旧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彼得有风度地准许艾玛和那两名女子来往，艾玛记录下她两位朋友在生活中遭遇的困难，以彰显与她们的友谊；我们得知，她俩的生活要比艾玛的更为错综复杂。根据艾玛的记录，她那位未婚的朋友跟她男友经常吵架。彼得和我不吵架，我好开心！与此同时，她另一位朋友的丈夫则压根不去照顾孩子。艾玛说，彼得和我同意要平均分担一切，我真的很开心！艾玛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她剪短了自己的一头秀发。图中，彼得穿着一条皱巴巴的紧身裤，围着沙发转来转去，沙发上躺着艾玛，正在浏览一本杂志。周六早上彼得总是如此，他想让艾玛休息一下。他们一起装饰儿童房，一起买婴儿服。艾玛的父母周末过来跟他们一起住，自己动手装点房子。她父亲对她说，她正“茁壮成长”。艾玛在健康和安全方面很挑剔。她不吃未消毒的奶酪，不喝未消毒的酒。她觉得，即使一天只抽一根烟也对宝宝有害；我们很惊讶，抽烟这想法居然会出现在她脑海中。她支持且推荐主营婴儿用品的跨国公司和它们的环境不友好型产品，据承诺，每个怀孕的母亲一旦生下宝宝，就会收到以艾玛名义提供的入门级产品礼包。让人费解的是，她对于母乳喂养这个话题非常狂热。她希望不借助药物忍受分娩过程的

疼痛，并期待生个男孩。我立刻翻到了书的结尾，她生了个女孩。她给宝宝起名简。她的确没有借助药物就熬过了整个分娩过程。她说，很糟糕，不过没预料的那么糟。日记里对于她预料了什么只字未提。我想知道分娩采取何种形式。与被谋杀相比，我对分娩的预料不会更乐观，也不会更理性。可是，《艾玛日记》确实暗示人们分娩其实没那么糟糕，因为我可不相信艾玛有着异常丰富的想象力。我想到了那些我认识的有小孩的女人，在评论生孩子时，她们都没说生孩子几乎和她们预料中的那样糟糕。大多数人似乎无法谈论这一话题，只有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曾一度求助产士开枪打死自己。

小册子不断告诉我，怀孕的女人必须做好准备才能抵御疼痛。那些紧张且不了解自己身体的人，那些抗拒分娩的人，尤其是那些害怕痛苦的人，都会觉得更疼。若这一说法算得上是一种威胁，其目的似乎是为了鼓励一种不寻常的集体行为。在准备过程中，加入小组，参加课程，获取伴侣或朋友的帮助，这些方法都值得推荐，可以在分娩前改掉你自大、恐惧，以及一意孤行的毛病。小册子巧妙地让下列言论与事实显得不那么危言耸听：就本质而言，生孩子终究是一件孤独的事；参加为生孩子做准备的课程就像是参加为死亡做准备的课程——诚然，我们所做出的每一点努力，都是为了去除生孩子这个过程的私人意义。于是，读完一定数量的小册子以后，我不再确定即将生孩子的到底是我，还是那个穿着橙色运动装、拿着葡萄柚做示范的女子。虽然小册子里没这么说，但按我的理解，你得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去深呼吸，运动；不论白天黑夜，另一半随时都愿意为你涂按摩油——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这样一来，哪怕无法减少怀孕所带来的麻烦，减轻生孩子的疼痛，你至少会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有关怀孕的书提到这个转型或升华阶段时，描述详尽到了让人感到不安的地步。这些书给了你一个清单，列出需要吃的食物，搭配这些食物的食谱，偶尔还给出了食物的成品照，并配有沙拉或盛穆兹利[7]用的碗等说明。借助图示，它们告诉你该如何爬上床、如何躺在床上以及如何起床，然后再次借助图示，告诉你该如何做爱。书里也包含详尽的对话，涉及分娩在即和即将为人父母这类话题，都是些你很可能会跟另一半谈起的内容。如果愿意，你们可以边喝鸡尾酒边谈这

些话题；当然，你只能喝不含酒精的那种！若要查询不含酒精的鸡尾酒的做法，请翻阅第73页。有一部分内容谈到产检，并建议产检时带一本书或杂志，甚至是针线活，以防必须等一阵子的情况。做超声波检查时，请留足时间以便找到正确的医院科室。找到科室后，请在叫到你名字后进入检查室。操控员操纵扫描仪器时，请脱掉衣服，躺在诊床上。请在身体变得过于笨重之前采购婴儿服。请装饰宝宝房，最好用无铅涂料，颜色以三原色为佳。在夜里，若你睡不着觉，脑子转个不停，请努力平定这一身份暴动，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宝宝建立联系。因为饱受失眠之苦，我听从了最后这条建议，可不论我怎么同宝宝沟通，结果总是我毫无尊严地去求宝宝别伤害我。肚子越来越大，我意识到，与宝宝取得联系，其效果无异于是一块田地和一条穿过其中的在建高速公路取得联系。

如同糟糕的父母，有关怀孕的作品充满了威胁，预示着种种报复行为，作品中到处暗示着欠考虑举动的后果，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吃肉馅饼会损伤宝宝的肝脏。吃蓝纹奶酪宝宝会感染李斯特氏菌，发病时无声无息无症状，却会让宝宝变成丑陋的畸形儿。轻抚猫咪宝宝会得弓形虫病，这种疾病同样无声无息无症状，也会让宝宝畸形。在妊娠的头七周持续多天外部环境超过104℉（约40℃）对宝宝有害，所以别洗桑拿浴，别洗热水澡，在这种情况下，怀孕期间也不要穿紧身内衣，以免宝宝畸形。别喝酒，别抽烟，你这个谋杀犯。别吃阿司匹林。乘汽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如果很难将安全带系在腹部上，可以将下面的带子调松。若有人觉得怀孕期间是这辈子唯一可以正当发胖的时候，请三思。别碰蛋糕、饼干、精制白面、巧克力、糖果、含汽饮料和薯条。某本相关书籍写道，将餐刀放到嘴边时，请看着食物思考，我吃的这一口能给宝宝带来最大的好处吗？若答案为否，请放下餐刀。

在怀孕文化中，宝宝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它既是受害者，也是独裁者。这种生物注定只存在于其出生的那一完美时刻；此后，这个生物退化，衰败，变成罪孽深重的凡夫俗子，哭着返回了现实王国。但是，在怀孕时，它可谓一个奇观、奇迹和补偿。有关怀孕的作品详述了它每周的成长情况，包括宝宝慢慢长出小小的手指和脚趾，

完美的小指甲，以及那双没有眼睑的无辜的大眼睛。人们积极地试着同这种生物交流。大多数书籍认为在怀孕的第14周，你便可以感受到宝宝在活动，它微微地颤动着，就像蝴蝶的翅膀（某本观点更为激进而因此略显过时的书告诉我，这只是风：一个月之后，才能感觉到宝宝真的在动。该书愉快地补充道，别担心摔倒，也别担心交通事故或从楼梯上摔下来。只有重物直接砸到肚子上的强力冲击才会伤到宝宝）。17周的时候，宝宝有了听力。它能听见你，妈妈的声音！我感觉到，宝宝有充足的时间去忘怀并厌烦这一变化。我还学到，宝宝很活跃时，我应该用双手缓缓抚摸肚子，然后对着宝宝说话或唱歌。宝宝会安静下来。你安抚了宝宝。

我注意到，这样一种孤独、完美且怪异的人造母性，无法推荐给已有小孩的女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没那么容易受骗。在一本书里，我发现书中有一部分专门是给这些不幸者的，名为“再度怀孕”。那部分非常短，其中提到一旦你告诉别人自己怀了二胎或再次怀孕时他们的反应。什么，又怀了？他们也许会问；或者问，你还没生够吗？你会感到身心俱疲。上次怀孕时你的身体已被掏空，它将变得松垮与臃肿。孩子会把精心准备的菜肴扔到地上，一下倒掉装满玩具的盒子，跟你把玩具放回盒子里一样快，还会在夜里尖叫着醒来好几次；所以你不停地收拾、清洗，也许无暇思索自己这次怀孕的事。你也许觉得自己可能无法给新生的宝宝多一些关爱。你也许靠汉堡与薯条为生。你也许很担心自己和另一半的关系，担心钱，也担心自己是否需要更大的房子。但至少这次分娩不会那么痛苦，因为上次分娩后，你所有的肌肉早就扭曲得走了样。

我给医院打电话，想预约产前课程。别人告诉我，太晚了，名额已满。你该早些预约。那时候我又没怀孕，我回答道。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强迫人们必须有远见的世界，在那里，与我同处在一个怀孕阶段的女人正在心仪的学校给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做入学登记。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觉得自己落在了别人之后，还没准备好，只得饱受痛苦，好比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被丢进满是野兽的丛林。我又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发现某个郊区的社区活动中心正开设孕妇瑜伽课。我去那里上课，和另外六七位怀孕女人在地上围坐在一起。老师盘腿坐在

我们中间。之前我从未体验过同类聚会。我们看起来像是被囚禁在自己的肚子里，就像铁栏里服刑的人，也像需要帮助的人。看到我们的这些相似之处，我着实感到安心和平静。我想知道为何自己曾嘲笑并抗拒它。瑜伽老师给我们分享她自己生孩子的经历。这很符合瑜伽的特质，也很正面。她告诉我们她曾在某一时刻受到启迪，当时她意识到，怀孕的女人只需要别人善待她们；考虑到善人太少，解决方式就是怀孕的女人善待彼此。她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为了彼此！老师朝上方舒展双臂，兴高采烈地大笑起来。我们在她的指导下深呼吸。我们变换着姿势。有几度含糊地提到生孩子。我们靠在墙上，运动腿部。有个女孩在劈叉。这时候，老师让我们找个搭档。这一指令浇灭了我的热情。我不想和谁搭档。事实上，我想尽快回家。可我还是一言不发地找了个伴，或者说有人挑中了我。看样子，我们要给彼此做按摩。这就是所谓的善待他人。老师让我们分成两组，一组是按摩师，另一组接受按摩。我是接受按摩者。我的搭档是一个有着柔软卷曲的白发，皮肤晒得黝黑，还打了鼻环的女孩；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她正在给我按摩。我闭上眼，身体如钢一般僵硬。老师轻言细语地给指令，仿佛隔壁有人在睡觉。我离开自己的肉体，决心放飞自我到别处，另一方面，紧张感也如潮水般袭来。过了很久后，按摩才停止。我尴尬地看了看那女孩的眼睛，笑了起来。我怀着专业的热情，开始了按摩。那女孩的皮肤很陌生，只归她个人所有；我虽想温柔一些，但还是带着侵犯她的觉悟干脆利落地给她按摩。按摩过后，上了一些巧克力饼干和茶。我借故离开。在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那些女人全都拿着马克杯围坐在一起，她们的侧影让人觉得她们既生命力旺盛，又很脆弱。她们的话都不多。我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受困于始乱终弃这种可耻行为。

冬天来了。我常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持续不断的绝望。早上起床时，我观察起小山似不断隆起的腹部，又与来势汹汹的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做斗争。孕期还要持续很多周，我孤立无援，觉得愈发不像自己，以后也都会如此。让我恼火的，不只是禁欲—没了向诱惑低头的可能性，我被剥夺了很多乐趣；也不是我身体的极端变化，不是随之而来的奇怪疼痛，不是像活鱼一样在我肚子里挣扎翻腾的不真实的生

命，也不是我的无力感，或是别人眼里以及设想中的脆弱（在公交站，一个没了双臂的年轻男子从我身边走过，他辛酸地说道，别担心，宝宝不会像我这样。我想追上他，像收回自己的合理财产那样收回我刚才看他的那种眼神，不管他觉得那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说，就算宝宝像你那样，我也不在乎，我不是那种人，我只是想摆脱它）。我发现，难以忍受的，其实是我的隐私为大众所知，仿佛我家的门敞开着，陌生人在屋里翻来查去。又仿佛我被逮捕或被要求交代情况，被税务稽查员召唤，被隔离，被搜身。我不再自在地生活，而是处在某种奇异的奉献中。怀孕的这几个月里，我放弃了独处的状态，变成了一座桥，一条连接线，一种媒介。我看报发现美国的一些女子因为伤害自己的胎儿而受到起诉，我很好奇，怎么会这样呢？身体怎么就变成了像电话亭那样的公共空间呢？又怎么会违法地做出自残这种行为呢？我害怕权威，也害怕服从，正是这类故事刺痛了这种害怕。我这人总是畏惧被人发现和揭发我的短处。现在，仿佛有个间谍就安插在我身体里，受到他的监视，我觉得既愧疚又不自在。我确信，给人压力、让人感到警惕的并非宝宝，而是宝宝对于他人的意义，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翁意识，它总把对事物的所有权挂在嘴边。

但我不只是这一贵重货物的司机；我也是它的盒子或容器；虽然我的牢固程度得到了调控与监测，可到达目的地时，人们究竟会用何种方式将我粗暴地打开呢？这依旧是个谜。我读到：有些女性发现生孩子是她们一生中最快乐的经历。这一神奇的说法出自自然（或“主动”）分娩的支持者之口。这种方法很吸引人。与之相比，医疗机构能提供的最佳服务如下：如果你接受强效药注射的话，生孩子就不会很痛苦。多个世纪以来，生孩子充满了痛苦与死亡，后来，女性终于可以使用麻醉剂；我所受的教育让我觉得这一事实很了不起，因此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回过头来考虑自然分娩这一概念。这是种主要基于原始社会女性经验的哲学。此处并不详述这群女性的身份与所在之处，重要的是，她们生孩子时，不会拨打999，也不会让别人在自己的侧腹部上打一针。她们都是顺产，因为她们总是如此，因为医疗机构并未干预她们的天性，还因为生孩子的传统向来一成不变：事实是，生孩子不痛。换言之，创造痛苦的，是对于痛苦的期待，抑或是下列事

实：是男人让女人在分娩期间一动不动地躺着，而原始社会的女性则让你跟自己的姐妹待在一起，保持站姿，别让男人掺和进来。有人给我们看了一些图表，与那些阐述宝宝从女性肚子里出来的图表一样，只不过宝宝是反方向出来的，以此展示重力的作用。但在医院的话，我很好奇院方是否允许站着分娩。答案是，取决于你自己。只要你意识到医院是男人的场所，那么一旦踏入医院一步，你使用人工破膜术，化学引产，电子胎儿监测，推迟分娩，硬膜外麻醉，身体麻痹，产钳分娩，剖腹产的几率，以及你对于宝宝事后接受人工呼吸的需求便会大大增加。何不在家里，在朋友的陪伴下，在安静的环境中生孩子？或者在温暖的分娩池里生孩子？我看了一些这一过程的照片。池子的水很深，像是某种可充气的环状物，周围环绕着室内盆栽植物，看起来很拥挤。里面有一个扎着长辫子的裸体女人，还有一个泳裤特别小的满脸胡子的男人和几个孩子。

用医学方法去处理生孩子时，男性占了主导地位；不幸的是，单单在政治上对此表示愤怒并不足以改善现状。在此舞台上，通过练习瑜伽为生孩子做准备要比以往更重要。自然分娩需要分娩的女性跟着自己的直觉走。就算有这种直觉，我也早已被引向了歧途。告诉我应该躲着医院走的直觉倒一直很敏锐。小时候我长期生病，那时我便知道医院是个冷冰冰的地方，总会发生点什么，总有些事件不可抗拒。背地里，我想象着如果自己从没去过医院，我便不用生孩子。我又读了一些有关自然分娩的书籍。每次看到书里告诫我要把生孩子和自己的身体状况结合起来，我便打起退堂鼓、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孤独境地。逃避痛苦的意愿和权力让我着迷，可这都是无意为之。最终我发现，书中的描述与我幻想中的生孩子的情形一样不真实。如今我离分娩又近了一步，其他女性朋友开始给我种种此方面的明显暗示。我听她们说起侧切，麻药不怎么起作用的剖腹产，缝得乱七八糟的针，痛苦的内科检查，以及长达50小时的产程。诸如“切断”和“撕裂”等字眼被提及。我不再清楚自己到底怕生孩子带来的痛，还是更怕生孩子所招致的干预措施。我告诉院方，我已决定在家生孩子。助产士将一个看起来不太吉利的工具盒拿到我家，我差点儿对她拳脚相加。我瞄了一眼盒子里的手术刀、剪刀和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些

歇斯底里，想知道原因。她执意把盒子留在我卧室，这样一来，哪怕我提前分娩，盒子也在手边。我感觉自己一直害怕的那一刻即将到来，离我越来越近：并非分娩那一刻，甚至不是痛苦的时刻，而是认命的时刻，也是某种可怕幽灵降临的时刻，我曾猜想自己这辈子常常瞥见这幽灵的影子。在夜里，我睁开眼，看着黑暗中助产士留下的盒子。盒子很黑，黑得很浓郁，如同炸弹一样；有好一阵子，我从这黑色中看见了被人提前阻止的可怕事物，看到了质疑，也看到了遭到阻止却迫在眉睫的现实。

然后，事情突然间有了变化。如今已是2月，白日短暂而黯淡，夜晚则如同湖泊般深邃和漆黑。年关之门的铰链嘎吱作响：很快便要打开，让春天的光芒照射进来。我等待着这束光，就像等待着让我做好准备的信号，可它从未来临。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时，我开始出血。我将此事汇报给助产士，她不顾我的抗议，带我去了医院。一进医院我就被带到了超声波检查室。我俯卧着，一群人聚集在我身旁。屏幕上再次出现了雪花般的图像。超声科医生探身向前，敲打着键盘，仔细检查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她直截了当地宣告结果。会诊医生[8]也探身向前。他们仔细看着屏幕，摆出了难以置信的手势。全都是错的，超声科医生说。胎盘完全堵住了子宫颈。宝宝出不来的，看见没？她告诉我。我顺从且聚精会神地看起屏幕来，然后看见一个黑乎乎、打着旋，类似于外太空存在的东西。有人在愤怒地低声说话，声音越说越大。本该早点发现的。眼下这情况威胁到了胎儿的性命。他们告诉我，如果我继续按计划在家生孩子，我俩可能都会死掉。他们讨论的时候，我看着屏幕。超声科医生手里拿着扫描设备，她这会儿有些心不在焉，于是扫描仪稍微挪动了一下；突然间，黑暗中出现了宝宝那张熟睡的脸。那张脸占据了屏幕，月亮般苍白而宁静，幽灵般虚无缥缈。这是一张人脸，它很真实，并非想象；它徘徊着，渐行渐近，等待着在世上立足。其他人都没注意到这张脸。超声科医生拿着扫描设备挥了挥手，宝宝的脸就消失了。

我被告知现在必须待在医院。我很抗拒，也很绝望，于是自作主张离开医院回了家。第二天，我回了医院，并向院方屈服。那是个周日的晚上。医院里漆黑一片，有些荒芜，仿佛患者只在工作时间光临

医院。一位积极过了头，热衷于练习扎针的实习医生如饥似渴地向我扑了过来。她主动要给我验血，并使用插管，不过我都拒绝了。她很愤怒，但还是保持安静；她消失了一会儿，回来时还带了帮手。据她解释，我必须走这些流程。我争辩了一会儿，最终同意只验血。实习医生把针扎进我的胳膊，仿佛她正在参加飞镖冠军赛。然后她又把针扎进我另一只胳膊。血渗到皮肤下面，在我胳膊上形成了两个胎记似的大红斑。我有些后悔，然后被安置在病床上。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在那里，有一大帮实习医生来看我，他们都听说了插管事件，想来报仇雪恨。我把他们全都赶走了。最终，某天很晚时，一个和善的高个女孩来到我床边。把这个插上，好吗？我伸出手来，她将输液流速调节器推入手背的一根血管中后便走了。会诊医生来看我。他表情愉悦，看起来像蒂罗尔人[9]。他说，如果出生于一百五十年前，你现在早就死了。我说大多数人都一样，他不明所以地大笑起来。我将进行剖腹产。你想哪一天生？他笑着问我。我选了周三。我问宝宝是否已经准备好从肚子里出来，然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接生过像小猫、像羽毛、像想法那么轻，几乎活不下来的宝宝。我感觉这医生更希望这些宝宝一开始别出生，而是亲自在育种盘里养他们一段时日。我的宝宝已经八个月大了，对于这家医院来说，这个时间明显有些糟糕。

病房里的其他女士也是要剖腹产的。没人呻吟，也没人扯头发。每天早上，她们中的一或两位走着离开病房，大约一小时后，便和自己的宝宝一起被轮椅推回来。他们被带到其他房间。还有一天、一个小时，最后只得在指定范围内焦虑，我沉默且无力地接受了这一切。我意识到这个冷静、凡事都要依时刻表活动的地方是我注定要待的了。我嘲笑自己没有认真考虑自然分娩，仿佛我所考虑的是奇怪的梦或错觉。麻醉师来看我。全麻还是局部？全麻，我立即答道。他劝我接受做两次局部麻醉的方案。如果你做了全身麻醉，手术室里的那些人就会对你很粗鲁，他说。事后你会很开心的，他一边补充，一边离开了房间。一连三天，我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读，什么也没想。外面的天气特别晴朗，也很宜人。朝窗外望去，这世界看起来停步不前，如此宁静。我感觉自己仿佛到了生命尽头，漂泊在寂静且高耸入云的地狱边境。周三到来时，我在黎明时突然感到很害怕，于是慌里

慌张地打了几个电话。我回到床上时护士过来了。不是查房：她是来找我的。分娩近在眼前。她照料着我，为我的身体做好准备，仿佛要将它埋葬。你今天怎么样？她边准备边问我。然后她便不打扰我了。不一会儿助产士来了。他们准备好了，她说。我们走进电梯，下了两层楼。我们在走廊里穿梭前进，时而左转，时而右转。然后我们推开了两扇门进入了手术室；很奇怪，手术室让我想到了之前看到过的死刑室的照片。房间中间是手术台，就像圣坛一样。房里满是戴着面罩的人。他们一看到我，就涌向前来，抓住我的胳膊，手用力地抵住我的背，像一股强流般把我抬向手术台。他们让我坐到手术台上，我立刻便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攻击。有人给我的胳膊注射了某种液体。我背后的一群人又给我的后背注射了什么。我朝下看，发现一个巨大的三叉输液流速调节器正被推入血管中，场面有些血腥。我不知哪里需要防守，也不知哪里需要全力忍耐，只好就此作罢，垂下头来。不久后，我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手术台上。参与手术的医生正用力把我的身体从一侧抬到另一侧。一张遮挡布搭在了我胸口上方。有人在我皮肤上猛喷了一阵某种冷冰冰的东西。你能感觉到吗？他大声问我。能啊，我大声回答。那这个呢？能啊！这过程似乎很原始，让人有些担心。我希望他听到了我说的话。一位女士正托着我的头，用双手盖住我的双耳。她拿开一只手，告诉我他们已经切好口了。虽然麻醉的效果很明显，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推拉和扭扯。人人都在说话。一台收音机放着音乐，一个男人正随着音乐唱歌。刚才那位女士走开了。我能看见自己的脸映照在头顶上的大灯里。我看了看时钟，发现我离开病房才十分钟而已。怎么了？我问。我的声音不可思议得仿佛是从我的尸体里传出。突然，我担心自己被遗忘了，担心自己将一直处在支离破碎的状态，我的头还在手术台上说着话。我担心自己的灵魂不受束缚，会随时飞走。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某种重大变化发生了：我感觉到了它，感觉到了空气的流动，感觉到了时间开始奔流直下、泄入一条新的支流。世界自行调整了。医生将宝宝高高举过那张遮挡布，以便我能看到。她浑身苍白发青，因惊讶与恐惧而龇牙咧嘴。我立即认出她就是我在超声波检查时看到的那个样子。只有我了解她很平静的这个秘密，以及孕育她的那个浮世。她被带到房间的另一侧，远离了我；她就像一束光一样，她离我越远，我便在阴影处陷得越

深。助产士簇拥在她身边。我看不见她，可哭声像她发送的信息一样传给了我。后来，她又出现了，此时她已穿好衣服，用毯子裹着。她的父亲把她抱了过来。他能主动对宝宝示好，这就够了，也足以弥补她的出生缺乏仪式感的遗憾；体验之钟已然开始嘀嗒作响，时不我待。她的生命已拉开序幕。

莉莉·芭特的宝宝

伊迪丝·华顿1905年的小说《欢乐之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女人既非妻子，又非母亲，亦非女儿，那么她是个怎样的人？华顿自己不属于这三类人。她结过婚，双方出于阶级和利益考虑而结合；可后来她和丈夫分居，渐行渐远，最终去了另一块大陆生活。她的父母都已过世。她没有孩子。她的财富让她有权活下来，她又通过写作继承并赢取了这项权利。她晚年养了一大群供玩赏的宠物狗，并对它们付出了大把心血；后来她偶然间做起了慈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住在法国，给很多孤儿提供过避难所，供他们上学。

《欢乐之家》的女主角莉莉·芭特就是一名孤儿。她的一生与华顿正好相反，就像照片的负像。莉莉的父母过世时没给她留下一分钱。她没受过教育，没什么天赋，也没接受过任何训练。她长得很美；她母亲养育她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可还没看到这笔买卖做成她母亲就过世了。莉莉放任自己去追逐虚荣，就像她的名字[10]让人联想到的那种温室花朵，被遗忘在凄风冷雨之中。她只懂得做一件事，那就是活着，还得漂亮地活着；去依附于一间房间，一个臂膀，一个扣眼。她把时间花在依仗别人的财富上，以暂时维持生活，她游走于不同的乡野别墅之间，总是处在赤贫边缘，极易落在潮流之后。其他女性的丈夫追求她：她收拾好行装，去往下一个派对。妻子和对手们都嫉妒她：她结交新朋友，只要是热情好客、能保证她活下来的人，都可以跟她交朋友。她比女仆都卖力地让自己更机敏、谄媚、具有魅力，可还是麻烦缠身。不知为何，她总是抓不住那些阔气的求婚者的心，总是与流言蜚语为伍。而时间却并不怠慢这位主顾，用手指滑过她美丽的脸庞。她遇到了一个叫劳伦斯·塞尔登的男人，这男人很穷，是个有教养的律师；她强烈地被他吸引，可双方的偏见又让两人分开。她不由自主地去追寻物质上的意义；而他则鄙视虚荣与贪婪，可这些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虚荣；他不停纠缠着她，眼见着她最终陷入贫穷，被世人羞辱；他不停纠缠着她，怀疑她有所保留，怀疑她站在通往另一生

存领域的门口，却不打开那扇门。一天晚上，在回家—那间位于纽约的肮脏的寄宿公寓，她的临终归宿—路上，她遇见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佣，没这么贫困潦倒时，她曾接济过这个女仆。莉莉憔悴的外表让那女孩感到惊讶，于是她请莉莉去她家暖暖身子。生了火的厨房里有一个婴孩，女孩让莉莉抱着婴孩。那晚稍晚些时候，只身一人的莉莉饱受疲惫、疾病以及饥饿的困扰，无意间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酊；奇怪的是，在弥留之际，出现幻觉的她看到了那个婴孩。

> 之前，莉莉从未想象过这种与他人相互扶持的生活。在出于求偶的本能盲目行动时，她曾有过这方面的预感；可是，由于她生活变得四分五裂，这些行动也随即终止了。她之前认识的所有男男女女都如同原子，在某种巨大的离心力的作用下旋转起舞，远离彼此：在内蒂·斯特拉瑟的厨房中，她头一次瞥见生命如何得以延续。
>
> 这个可怜的年轻女工鼓足气力，收集她生活的碎片，用它们给自己筑了一个挡风遮雨之处。对于莉莉来说，这个女工似乎领悟了生存的真谛。她的生活捉襟见肘，处在贫困的边缘，无法招架潜在的病痛与不幸事件，可这种生活却如同鸟巢，尽管它还十分脆弱，修筑在悬崖边上，却永远无所畏惧—仅仅靠着小捆的树叶和干草，却如此牢不可破，足以让托付给鸟巢的生命在深渊之上安然无恙地生活下去……
>
> 今晚，药效似乎比平日里奏效得更慢：每一次悸动都必须依次得到平息，过了很久，她才感受到这些悸动停了下来，如同站岗的哨兵打起了瞌睡。可是，渐渐地，她彻彻底底地被药效所征服……明天终究没那么难过：她确信自己足以面对它。她不太记得自己害怕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可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不再困扰她。她曾闷闷不乐，现在却很开心—她曾觉得自己孤身一人，现在这种感觉消失不见了。
>
> 她微微动了一下，然后侧着身子躺着；这时，她突然明白为

何她不觉得自己很孤单了。这很奇怪—内蒂·斯特拉瑟的孩子正躺在她怀里：她感到了孩子小小的头紧紧靠在她的肩膀上。她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在那里，可对于这个事实，她并不觉得很惊讶，她只感受到了一股传遍全身的战栗，这让她既温暖又快乐。她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让宝宝那毛茸茸的脑袋枕在她的胳膊上，然后屏住呼吸，以免发出声音打扰到睡着的孩子。

躺在那里时，她对自己说，她有一些话必须对塞尔登讲，她已找到某个字，能把他们两人的生活划清界限。她试着再次说出那个字，它忽明忽暗地存在于遥远的思维边缘—她害怕自己醒过来时不记得了；她觉得，如果她记得，能把它告诉塞尔登，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

她慢慢地想不起那个字来，睡眠紧紧抱着她。她努力抵抗睡意，却使不上劲来；她觉得，为了宝宝，自己应该保持清醒；可即使这种感觉也渐渐消失在模糊的宁静困意之中。突然间，孤独感和恐惧感如同一道黑色的洪流袭来，撕裂了这睡意。

她又一次坐了起来，因为惊讶，她冰冷的身体抖个不停：一时间，她似乎让那孩子离开了她的怀抱。可是，不对—她弄错了—它那柔软的身体依旧紧紧地贴着她的身体：暖意再度袭来，流过她的身体，她不再抵抗，沉入暖流之中，然后睡去。

婴孩不仅象征着莉莉寿数已尽，还象征她的一生和生命结束时既脆弱又无助；它同时也反映了被莉莉挥霍掉的女性特质，是一幅关于母与子的幽灵般的图像，两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源于莉莉那脆弱、破碎且无用的美丽皮囊。通过这幅图，莉莉最终找到了她与男性交往时未能感受到的温暖、亲密以及投入。一边是言语、戏谑、被束缚的欲望、流言蜚语、算计和装点，它们所散发的光彩全是假象；另一边则是爱与责任、决心、规矩、安宁、睡眠与黑暗所带来的解脱，一时间这种解脱让莉莉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莉莉那沮丧的身体想要牢牢记住的，并非劳伦斯·塞尔登的形象；也不是性

—不是男欢女爱，而是她最终渴望拥有的一样东西：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她去过的那么多宅子都是些富丽堂皇、残酷无情、供男男女女消遣的风月场所，精心装饰它们的，全是背叛、无趣、贪婪和欲望；唯有在她待过的最后一个宅子，一个破旧的地方，她才寻觅到了自己能够暂时拥有的东西。

一辆的士穿越伦敦的条条街道，送宝宝和我回家。这阵势仿佛皇家婚礼散场后仪仗队驱车穿越欢呼的人群；依照惯例，这一时刻很重要，却由于罕见而招致怀疑，而这又让它变得更为重要；它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关注，沦为他人的笑谈。我毫不怀疑，我和宝宝就是一对，一双。我并非不去谈论宝宝与他人的世俗联系，只不过现在这些联系还未真正产生。此时此刻可以确定的是，如同俄罗斯套娃一般，我进行了自我复制。出门时，我还是独身一人；回家时，我多带回了一人。

等穿过我家前门时，我才意识到情况有变。仿佛我到的是刚刚过世的某人的家，我曾爱过、到现在仍不相信此人已离世。房间、家具、照片和其他物件看起来都是那么熟悉，所以让人难以忍受：站在那里，我感觉自己遭受了悲剧的猛烈攻击，仿佛正身处无可挽回的过往。几分钟过后，同样的房间和物件让我心生恐慌，一种因受到约束而感到的恐慌。看到这些东西，我突然感到一阵暴怒；我仿佛因厌恶而拒绝靠近它们。我觉得有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想做些不忠的事情的渴望让我变了个人似的，让我既渴求又厌恶被我所背叛的东西。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只好坐在沙发上哭了起来。

人们不停对我说，宝宝非常小。她的皮肤红里透蓝。她的眼睛一直闭着。与此同时，伤疤让我失去了活动能力，寸步难行。我和宝宝不久前才分离，我们俩看起来都不完整：我们身上都还保留着我们曾是一体时的残存部分，依然微红且鲜活，让人痛苦。我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我决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去行事。我泡好茶，打了好几个电话，还邀请了左邻右舍。我穿戴整齐，举止正常地去开

门，这时他们惊叫了起来：他们惊叫是因为我事实上已经回归了自我，仿佛一封未寄出的信。小家伙去哪儿了？他们指着我的肚子笑了起来。如今，怀孕已经成了一个错觉。我身体里的宝宝的秘密虽未解开，却已成了过去式。

我的女儿到底属不属于我？这问题萦绕在我心头，得不到确切答案，令我感到担忧。在医院，女儿在我身边时，我立刻觉得自己的习性有些像动物；在家时，我震惊不已，这种感觉像是在做交易，仿佛我外出买了一件异常贵重的物品；在整间商店里，我对这件商品感觉最为强烈，私底下最渴望拥有它；如今，我在自家的客厅里鼓起勇气打量着这件商品，但对它感到有些束手无策。我一边向其他人展示，一边害怕他们评头论足。我让他们摸一摸，甚至抱一抱它；虽然嘴上不说，但我还是有些抓狂，害怕他们伤到它，迫切想把它要回来。我既渴望又害怕它，却无法真正得到或逃离，又无法放弃这么一件珍宝，我现在可谓五味杂陈，左右为难。我女儿继续睡着，她很安静，脸色有些苍白。我开始觉得，压根不能愚蠢地将她比作是某种买来的东西；确切地说，她独立自主，泰然自若。我很好奇她其实知道该做些什么，不久后就会告诉我们；她沉思良久，是否是在酝酿某种宣言，清楚且准确地告知我们该如何行事？助产士来访时，我无助地告诉她，宝宝看起来挺好的。她大笑起来。他们一般都会在第三天爆发，她说。她动手演示了一下这种爆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天晚上，宝宝睁眼了。我们给她拍了照，仿佛在野外看到了某种稀罕的东西。她看着让人难受的闪光灯，眼睛一眨也不眨。她盯着我们看。她的眸子像是晴朗的天空，眼神很清澈，从里面读不出赞赏、指责或其他情绪。我替她感到害怕。我们很可能不会去关心她。要知道，我们不一定非得是现在的样子。她闭上了眼。我们把她抱上床，放到我俩之间。夜里，我醒了过来，发现她在黑暗中又一次凝视着我。她没眨眼睛。她的表情有了变化，添了一丝深意。我试着再度入睡，可我觉得自己被她那令人不安的凝视给束缚住了，让我无法闭眼。我带着罪恶感地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仿佛宝宝趁我睡觉之际快速地从我身上吸收信息；又仿佛她被人派来不是为了代替我，而是为了把我当作某种基地或总部使用，在这里，她能接受指令，等着做好

准备后去执行她的绝密任务。她哭了一小会儿，然后我喂了她。我隔段时间给她换一次尿布。我偶尔—如果顺利的话—会给她拿掉或添上一条毯子。她睁开眼又闭上。我们等着，仿佛在等她表明自己的目的，或是等着她的同类从他们的星球来带她回去。

在这短暂的时刻，宝宝独自躺着，宛若置于神龛之中—依我看，也可以说宝宝正在消化这种独处状态慢慢给她带来的震动，也可以说有人正赋予她权力，让她虽然暂时无法动弹，却依旧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对此我深感困惑。从我女儿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在我的想象中，这会让我自然而然地产生感情。可是，我就算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似乎也无法对她动情。在我看来，怀孕越来越像一场谎言，如同某个满是福音会教徒、说教者、控制狂的地方，又如同一个常有对做母亲怀有错觉的疯子出没的场所。分娩应在诊所里进行，由医院来安排，或许正是这一特性让我乱了头绪，要知道，事实上我生孩子的经历更像割了个阑尾，而不是大多数人理解中的“分娩”。若分娩这一人生章节失去了其字面意义，没给我带来黏着的痛苦，也没有实实在在的结束，恐怕我无法成为一位母亲；恐怕我将原地踏步，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个手术而已，并置宝宝于不顾，也不多考虑她是怎样出生的，只觉得她是被送子鸟留在了门口。

不过，人们都相信孩子的身体归我所有；更准确地说，她的客观存在令人惊讶地体现了我的空虚感。如今，我那缝过线的中空的身体并没有这些感受。我这辈子在此之前曾有过这些感受：我渴望与自身以外的某种对象建立联系，渴望通过占有去感受，去体验这种差异性。到目前为止，这些渴望与物欲差别不大；通过宝宝得到满足的渴望与物欲差别也不大。说到底，宝宝只是个玩偶，我打扮她，喂养她，去哪儿都带着她，就像小姑娘那样骄傲。这些祭祀用酒很普通，却要给祭祀对象额外付出高昂的费用。我所拥有的其他财产已被我逐渐放弃，这样更利于祭祀，或因我不够负责，要求变来变去，这些财产也饱受折磨。现在，我等待去探究自己拥有的一切到底有多么复杂；与此同时，我也没了新的期待，也无法兑现未说出口的承诺。我确定这种复杂性会自行显露，届时我可能无法应对它；可是，宝宝睡觉、吃奶和静静盯着我看时，我偶尔又会没那么确定，甚至忘掉这件

事。宝宝脸色苍白，美丽且娇小。别人惊叹于她的优点。可很明显，我才是她的母亲。

宝宝情绪爆发的时间比助产士预测的要晚得多，其激烈程度却如她所料；此前我因虚假希望而产生的愉悦此时变成了精神不振，让我措手不及。我曾和一个朋友带着宝宝去散步。我觉得自己相当成功：散着步，聊着天，而宝宝靠在我胸前睡在育儿袋中。她出生后的大约两周时间内，我似乎已将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合一了，我既是原来的那个我，又是一名母亲。我和自己的孩子有了身体接触。我与朋友谈话。我决定冒着失去这一幻觉的风险，带着宝宝和朋友去公园另一边的一家咖啡馆，在那里，我必须把宝宝从育儿袋中取出放在腿上，以便坐在一张桌子旁喝咖啡。在考虑和实施这一壮举时，我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与我的幻觉属于同一场梦：这种感觉将挤压、继而刺穿我的睡眠，让意识的第一股溪流和紧随其后的真正洪流涌入我的睡眠。事实上，我既不懂怎样做自己，也不懂怎样当母亲。我既不了解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的朋友。我甚至都弄不清楚天气状况。我们选了一张室外的桌子。团团黑云在我们上空集聚。下起了雨，瓢泼大雨。我试着把宝宝放回育儿袋里；我笨手笨脚，还不够自信；突然间，宝宝哭了起来，发出了特别痛苦且本能的尖叫声。我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打翻了咖啡杯，笨手笨脚地找着零钱；我想说点什么，想安抚她，想解释些什么；我在瓢泼大雨中变换着姿势抱着宝宝，最终跑着穿越了公园；空荡荡的育儿袋在我前面摆来摆去，放声大哭的宝宝在我身前像着了火，我的朋友在我身后尴尬地一路小跑，直到我们跑到路边；我疯狂且绝望地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然后强行让混乱中的我们上了车。我等会儿就给你打电话，我朋友奇怪地说。我透过车窗瞥见了她，身材苗条，衣着得体，矮小结实；不知怎么回事，她要求特别高，而且异常固执；此时她正在人行道上礼貌地挥着手。回家的路上，社交恐惧、巨大的不安感折磨着我，而且我还要在颠簸的出租车里努力尝试止住女儿如同一座惊人的喷泉般涌出的悲痛，这悲痛仿佛来自某个幽深、黑暗且无边无际的地方。这两种心思互不干扰。我惊讶于自己居然如此轻易地就分裂成了两瓣。我既担心不已，又安慰自己。宛若溪流的两股支流，自我和母亲这两个身份并未留意到彼此，

尽管片刻之前还难以将两者区分开来：它们翻腾着向前，过着各自的生活，虽然来自同一源头，但如今已不再试图与彼此同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会继续追寻我在公园里所瞥见的自己的幻象—统一、能干、体验着“生活的一致性”。这一幻象难以追寻。其构成要素立场坚定，充满敌意，同样不守规矩。想要做好一名母亲，我必须不接电话，不工作，不顾之前已做好的安排。想要做好自己，我必须任凭孩子哭；为了能晚上外出，我必须在她饿肚子前采取行动，或把她留在家里；为了思考其他事情，我必须忘掉她。成功扮演一种角色意味着演砸另一个。母亲与自我之间的分歧没有我之前在出租车上想象的那样清晰：然而，这也算得上一种征兆；后来，即使在状态最好时，我也没觉得自己已进步到足以超越这个界限。我只学会了如何为这两种状态制定规矩，如何保护两者间的边界。一开始，我做事的动力来源于两种技能中较新的一种，即母性；可是我震惊地发现，我个人的重要性如同暴跌的股票，最终跌停。所以，我进一步让自己沉浸在养育宝宝的那一丁点儿成功之中。三四周之后，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来到了某个边远地，此时的我对于宝宝需要摄取的热量，睡眠的时长，运动发育和哭闹套路的了解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准，而我余下的生活如同一处荒废的住所，一座废弃的建筑，在那里，腐烂的木料偶尔会断裂，猛地落到地上，驱散鼠群。我受邀参加一个派对，虽然我决定参加，并按时沐浴、穿戴完毕，但我最终却坐在厨房里大哭起来，而派对那里的娱乐时光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宝宝得了肠绞痛，我为人母所取得的那一点微小成就就像轻而易举地捏碎蛋壳一样被摧毁了。对我来说，“如果一个女人不是母亲，那她是个怎样的人”这一问题已被“如果一个人已经是母亲，那她是个怎样的人”以及“母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这两个问题所取代。

肠绞痛与其他故事

我女儿患了肠绞痛[11]。依我看，马才会患这种病。将折磨她的这种病症—这种宝宝和野兽所承受的无言痛苦—称为肠绞痛，似乎有些冷酷无情。我确定在德语中肯定有专门形容这一病症的词，类似于生之悲痛[12]之类的合成词，可译作因某种人类境况而流露出的悲哀之情；要知道，我不确定这种病症算是消化不良。我怀疑医学界也不这么认为：我发现这一病症有五花八门的名字，例如“三个月大的婴儿所患的肠绞痛”“肠绞痛”，或“人们按照术语‘肠绞痛’所理解的某种症状”。偶尔，某个不讲理的行医者会称其为“怄气”，暗示如此观点：小孩的情绪既恼人又讨厌。然而大家都同意，这种病症呈现出来的，是明显无缘无故的阵阵哭声，它在一天中的特定时间出现且无法治疗或安抚。

我女儿的症状完全符合上述描述，只不过肠绞痛的发作时间有些让人困惑，似乎并不确定，而是很笼统、随机且频繁。我查阅了一些相关书籍，它们都坚称，肠绞痛如同瑞士火车一般，来去都很准时。按我过往的经验，时刻、日期及季节都有其规律，可在过去的几周里，我的这些经验发生了巨变，以至于时间变成了某种无差别的质量，仅由宝宝的突发状况来决定，这些状况包括睡着、醒来、哭泣，以及同样令人莫名其妙的满足。一想到她会如那些书所示，在“下午”或者“4点至6点间”展示某种特定行为，我就觉得奇怪。那些书还建议带着宝宝上下走动，有节奏地摇晃她，把她放在育儿袋或婴儿背巾中，还有唱歌或跳舞。我最近读到政府正给一些十多岁的贫困少女提供会弄湿尿布、哭个不停的洋娃娃，意在让她们了解做母亲的真实情况。有迹象表明娃娃们在少女手里待不了一小时就会从高层公寓的顶楼如雨点般落到人行道上，如此一来，她们便可自由地往高级金融相关的工作方向发展了。与此类似，我读的那些书里都提到了对于哭声的健康忠告。我从中得知，宝宝的哭声会导致心情沮丧、精神疾病，从而让你伤害宝宝。若你觉得自己可能会伤害宝宝，就把它安置

在安全的地方，然后离开房间，在外面待上十分钟。这个教程的语气简单粗暴，书的开头是长篇幅的花言巧语，谈论母乳喂养、亲密关系，以及你和伴侣如何在房事上转移注意力，直到能够重新“充分行房”。结尾部分是一连串电话号码，它们属于拥有诸如哭泣危机[13]此类名字的机构或组织。

按图索骥育儿法显然已经走到了兰兹角[14]；我迅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由我自己来研究和解决。书里说，母亲很快便能辨别自己宝宝不同哭声的含义。我的确弄明白了一件事：当宝宝因喂奶而停止哭泣，我事后也许可以将哭声的含义解读为她饿了，或者若哭声有多重含义，至少饥饿是其中一种。宝宝的哭声震耳欲聋，十分迫切，让人觉得事出紧急，以至于一听到哭声，我的第一反应总想火速把她送到医院，或者如消防警报响起一般从家中撤出。我明白，哭声是宝宝唯一的交流手段，由多种原因造成；作为宝宝的首席伴侣和连接她与世界的纽带，我理应对这些原因进行解释。有人认为，宝宝时刻都将这些解释当作构造自己未来性格的信息。换言之，我对宝宝哭泣的反应会影响她的成长。我不该冲动行事，不该举措失当，以免在未来的日子里会突然发现，与我朝夕相处的居然是我种种弱点的可怕化身，此人由我的这些缺点拼凑而成，所用的胶水则是她自身显而易见的无限、变质又畸形的欲望。

我能轻易理解自己读到的关于母子早期关系的内容。我明白这一切：孩子渴望重回母亲的身体，想去探索与满足自身的欲望，去探寻自身的极限，去认识他人以及此人的意愿；母亲有既想保护又想放手、既想让步又想分离的冲动，她有既要去爱护又要确保凡事朝正确方向发展的责任。问题在于这些看法与我的处境不怎么相似。我的宝宝似乎反对一切，又似乎令人惊讶地只反对自己；我的反应有些随意，不够恰当，一点儿也不神秘。很难相信宝宝会对我产生欲望，会焦躁不安地想让我成为她随意处置的奴隶；事实上，她很有可能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我有足够的想象力去想象她的世界里一片模糊，她自己是一团迷雾，无法辨别事物，她急着想要动弹，却毫无办法；我不相信她正变着花样来抗议我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我在通过这团迷雾时好像没能改善局面。

醒来后，我在旁边的床上发现宝宝身体通红且僵硬，发出的声音在房里回响。时间是早上9点半。昨晚我多次起床给她喂奶，显然，我俩出乎意料在某一刻一同进入了梦乡。我们睡觉时，别人都去上班和上学了：世界正自顾自忙着。我们陷入家庭主妇的泥潭之中，什么事都做不了—要么太早，要么太晚—只能抓狂和看早间电视。白天就在眼前，没有大事发生，如同大草原，又像人迹罕至的平原。宝宝在咆哮。那咆哮声要求你上一秒还沉沉入睡，下一秒就得活力满满。我一跃而起，抱起宝宝，几秒钟内，便在似乎不停旋转的房间里踱起步来。我依稀记得大概两小时前喂过她，但还是决定再喂她一次，顺便想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事。由于缺乏睡眠，我的思维能力变得如同老鼠，退化到凡事只能靠猜的程度。我在喂奶方面有些信心，并非因为我很清楚该何时喂奶、该怎么喂，只因我之前喂过很多次。可今早她就是不吃。突然间，仿佛我正试图给厨房电器或一只鞋喂奶，这种感觉奇怪且明显不妥。她身体僵直，张着的嘴如同满是噪声的熔炉，她的脸紫一块红一块，满是愤怒，没喝的奶汇成一条小溪，顺着她那受了委屈的脸颊流了下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喂奶。我们去了卫生间，我打算在那给她换尿布。这一策略之前奏效过，不过我不清楚原因。我把她平放在垫子上。哭声立即停了下来。能迅速让她消气我很欣慰，便在厕所里靠墙坐了下来。我高兴地跟她说话，她则躺在那里看着我。后来我给她换了尿布。我抱起她，她立刻咆哮起来。我放下，她停了下来。我刷好牙，走进浴室，然后走了出来。我穿好衣服。我试着再次抱起她，希望情况有变，可一切照旧。她又咆哮起来。我放下她，她又停了下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在卫生间耗上一整天。隔壁的电话响了，我跑去接电话。她又在卫生间里咆哮起来。我急忙转身回到卫生间。我抱起她。她停了下来。

在楼下的厨房，我一只手准备好并吃完早餐，另一只手抱着宝宝。我抱起她跳着华尔兹，从橱柜一直跳到桌旁，她则很开心地环顾着四周。我读了会儿报纸，继续用一只手收拾餐厅。抱着宝宝的那一只胳膊开始酸痛起来，可若换一只手抱她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随后我意识到该给她喂奶了。我早就放弃了将喂奶作为一种策略，所以不愿再用一次。可是，在某一刻，她总会饿得哭起来；不管怎样，我

只模糊记得她之前哭的样子。对一个反应慢半拍的母亲而言，主动出击之类的想法很有吸引力。我喂她，这一次她吃了。我们坐在安静的厨房里。宝宝一边吃，一边眨巴着明亮似珠的深邃眼睛看着我；我看着她，就好像看到一只从笼里放出来的珍禽异兽，好奇她接下来会干什么。我祈祷这种停滞继续下去，祈祷电话和门铃不要响起，祈祷整座城市忙它自己的，别来打扰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从宝宝身上涌出一滴闪亮的来自隐秘源泉的液体，慢慢地溅入了裂开的我身上。

宝宝的眼皮开始耷拉下来。看到这一幕，我知道她可能会睡着，并且睡上两三个小时。她之前有过这种表现。这让我感到兴奋，要知道，宝宝睡着时，我可以同原有的生活重建联系，仿佛见旧情人一样。这种联系虽令人兴奋，但往往太过仓促。我在家里四处乱跑，不知该做些什么：读书、工作，还是打电话给朋友？有时我与这种快乐无缘，最终只能闷闷不乐地打扫房子，或站在镜子前努力辨认自己。有时我想念宝宝，便在她睡觉时躺在她的小床旁。有时我经过努力，终于可以读书、工作或聊天，可正当我乐在其中时她会出乎意料地醒来，并哭了起来；这种生活状态的变化实在让人痛苦。虽说如此，可看着宝宝耷拉着的眼皮，我还是会兴奋得热血沸腾。我疯狂地开始列出并考虑我能做的事，排除某些可能性，青睐另一些。宝宝的眼皮再次耷拉下来，然后完全闭上。休息中的宝宝脸很纤弱，像贝壳般安宁。我看着她的脸，这时，某种警报似的颜色很快写满了她的脸。她的肤色变暗，预示着风暴将至。她的眼睛迅速瞪大，身体扭动着，小嘴张大，仿佛张着血盆大口的悲痛的无底洞。她咆哮着，怒吼着。她大声哭喊，满怀愤怒、痛苦、愤慨和恐惧。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捉奸在床，那些关于自由的想法躲了起来，四散而逃。我羞愤难当。

是我毒害了她吗？在这种时刻，我总会想到奶有问题。我曾见过这一说法被划上重点，用粗体印在许多我仔细读过的谈及肠绞痛的小册子和书上。这个说法很可怕。它让人心里充满绝望与忧郁，如同发生在上层的腐败故事。我哪儿知道呢？我该如何根除病原？人工喂养宝宝的母亲通常得到的建议是立即换掉配方奶粉的牌子，若怀疑奶粉有问题的话。像我这样的母乳喂养者则必须历经一个更为痛苦的补救过程。我得到的建议是，想一想过去二十四小时内自己吃过、喝过什

么。怀疑的对象很多，但很难证明它们有罪。所谓的“作案者”包括酒精、咖啡和巧克力、卷心菜、洋葱以及大蒜、柑橘类水果和辛辣的食物、豆类、茶，以及任何生食。有些母亲发现将乳制品完全排除在食谱之外能使情况有所改观。我听人说，有一位母亲，只要吃过东西，便会用吸乳器排出乳房内所有的奶。宝宝呼吸不畅，它抽搐着把膝盖顶到自己的胸部。我想象着自己开始腐烂，蔓延到她的地盘，直至她的血管和身体隐秘处。我希望将我的毒刺从她无辜的体内取出。我第一千次觉得自己如此痛恨母乳喂养。我想就此罢手。可是，每每忆及她出生太早，又非顺产，我便心软起来，稍加延长她租借我身体的期限。我无法判断母乳喂养的象征意义是否胜过下列假设：母乳喂养如同每隔三小时使用一次氯化物。

社区保健员家访了我们。在门厅，她用鼻子闻着空气，似乎正在调查家里是否有人吸烟的迹象。宝宝肠绞痛的小插曲现已告一段落：我花了两小时在楼梯上爬上爬下，直到宝宝偶然间在门厅的镜子里瞥见自己，我才终获胜利。保健员到达时，我们已在这面镜子前站了大约四十分钟。保健员的红爪子在宝宝羽毛般的头发里摸来摸去，让她有些畏惧。她长得真好看，保健员说。她身体好吗？是的，我仓促作答。然后我承认宝宝经常哭。承认这个事实让我怒不可遏，可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治疗肠绞痛的方法。保健员也许真有法子，我无法忽略这种可能性。她像鸟似的警惕地看着我。是你在喂她吗？她问我。我意识到她说的是母乳喂养。很显然，她不愿把“母乳”这样的字眼说出口。我说是的。她说，既然这样，你的乳汁肯定有问题。是吗，我说。她继续说，是的，她长得真好看；她边说边轻抚宝宝的头，直到我开始担心她会摸掉宝宝的某块头皮。她长得真好看，又小巧，是不是？她现在多重？我告诉了她。她要看宝宝的生长曲线表。我把表拿来给她看。她沉默地仔细看着表，然后告知我，你的宝宝发育得不好。她的红指甲匆匆滑过为我女儿绘制的那条短小的生命线条。我承认，线条的走向不是特别直，可毕竟没有掉头返回子宫。她得了肠绞痛，我说着，同时眼泪快掉下来了。她吃东西有些困难。你必须喂配方奶了，保健员提出要求。最开始，每次喂完母乳后给她一瓶，两周内她就会完全适应了。这建议让我很震惊，毕竟我之前那么努力，都

是因为坚信母乳喂养乃健康卫生服务所追求的目标，并且严格遵守着这一准则。通常你们不都是建议在宝宝体重偏轻时多喂奶吗？我问。撇开其他不谈，我还挺熟悉这方面的。你的宝宝发育得不好，保健员又说了一次。你这样可能会损伤她的大脑。你想要宝宝变成低能儿吗？我觉得没必要回答这问题。

保健员待了很久。我和宝宝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在她面前保持沉默。待她终于离开，我哭了起来。宝宝惊讶地盯着我看。我立即预约了一位医生。我的宝宝发育得不好，我冲进医生的办公室说道。医生回复宝宝完全健康。医生还说，事实上，她很可爱。我看了看宝宝，她正躺在医生的沙发上，边踢着腿，边迷人地微笑。我能给你看个情况吗？我说。我抱起宝宝。她立即咆哮起来。我再次放下宝宝，她停止了咆哮。确实很奇怪，医生说。

我遇到一位女士，她好心地告诉我，差不多三个月大的时候，宝宝的哭声会停止。说不准哪一天就不哭了，就是这样。现在，虽然没办法精确到小时，但我可以预测宝宝什么时候会哭，不过还是不知道原因。走路的时候她在育儿背巾里哭，在我想买东西时她在婴儿车里哭，她还在公交车、地铁，以及我的亲朋好友家里哭过，既在我怀里哭，也在别人怀里哭。她会从一个昏暗的下午哭到下一个下午—有时候只有她和我在家，并且无事可做，有时外面正下着雨，有时我累得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在她哭的时候坐在椅子上陪着她。我已放弃了用成人的正常思维和能力去阻止她哭泣。我曾怀抱着大声痛哭的宝宝跑着回家，在众目睽睽下发了狂地拉着我们身后的婴儿车。我曾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时跳下公交。我曾从咖啡馆突然跑出来。我曾不加解释便挂断电话。我曾独自哭泣。我曾大吼大叫，吓得她小小的身躯颤抖起来。我曾坐在漫漫长夜里，给抱着她在厨房踱步的她爸爸提建议。我会说，你之前那样摇晃宝宝更好；要不，试试前两天晚上的那个动作，就是让她脸朝下、另一只手放在她背上的那次。我曾把她放在安全的地方，并试着离开房间，可还没走到门口，她的哭声就把我唤了回去。我们甚至曾带她去了意大利，她在加尔达湖[15]哭了三天，小

船静静地在浅色水面上方的群山下滑过，温暖的空气里充斥着鸟儿的啁啾声和孩子们的喧闹声。

某晚，我坐在屋外暮色下的花园里，意识到已经过了三个月，夏天已来临。我女儿躺在毯子上，看着头顶上的树叶。她咯咯笑着，踢着腿，冲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笑。她一头红发，眼睛明亮。我知道，过去的几周内，我以一种无法言说的方式再次见证了她的出生；她因痛苦和绝望而发出的声音，其实是可怕且私密的创造过程所发出的。我发觉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也意识到哭声已停止，她已熬过了生存所带来的首次痛苦，并从中锤炼了自己。她也锤炼了我；我虽没帮她，也无法理解她，但一直陪着她。我突然确信，这便是母性；陪在她身边，这就够了。她每哭一次就折磨我一次，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我对她的喜爱，我逗她的蠢法子，我宠她的时刻，以及我在照顾她时试图展现出来的独特自我，这一切同我的怒火与绝望一样，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陪在她身边；“只”当然包含了一切，因为陪在她身边意味着不去别处，准备好放弃一切。做我自己并不能弥补无法陪在她身边所带来的缺憾。相应地，她的哭声卷走了人满为患的整个地表，也卷走了占据我生活的琐事。我将她不再哭泣当作一种暗示，表明她认为我训练有素，已获“母亲”之衔；这也是一个信号，说明眼下我们可以小心翼翼地继续生活在一起。

爱，离别

可怜的玛丽·伦诺克斯是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中的小主人公。她的父母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身为社会名流；她出生时，心不在焉的他们便不要她了；她在印度和一群仆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成长的历程很苦涩，无人关爱。若悲剧没有击倒她，没将她连根拔起、把她移植到更为友好的土壤中，她也许会继续过着之前那种生活。

> 霍乱以最致命的形式暴发，人们正像苍蝇一样死去……玛丽躲在儿童房里，被大家所遗忘。没人想起她，没人需要她，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她一无所知。她一会儿哭上几个小时，一会儿又睡上几个小时。她只知道人们病了，她听到了神秘且吓人的声音。有一次，她悄悄走进餐厅，发现那里空空荡荡，虽然桌上摆了一桌没吃完的饭菜，看着那些椅子和餐盘，好像用餐者突然因故起身，将它们匆忙摆回了原位。孩子吃了些水果和饼干，因为口渴又喝了几乎一满杯的酒。酒很甜，她不知道这酒有多烈。不一会儿，她就醉得厉害了，后来，因为害怕在小屋里听到的哭声以及匆忙的脚步声，她回到了儿童房，把自己关在了里面。酒让她困意十足，她几乎没办法让眼睛睁着，然后她躺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了意识。
>
> 醒来时她躺着盯着墙壁。房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以前从来不知道这房子可以如此安静。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或脚步声，好奇是否所有感染了霍乱的人都康复了，所有的麻烦都结束了。她还想知道，如今奶妈已经死了，到底谁会照顾她。也许会有一个新的奶妈，她也许知道一些新的故事……周围的噪声和忙乱，以及因霍乱而起的哭声吓坏了她；她生气了，因为似乎没人记得

> 她还活着。人人都过于惊慌失措，忘掉了一个不讨人欢心的小女孩。人感染霍乱时，似乎只记得自己。但如果他们再次恢复健康，肯定有人记得她并且会来找她。
>
> 但没有人来；她躺在那里等着，房里似乎愈发沉默……正是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玛丽发现自己父母都不在了；他们早就过世了，早就在晚上被抬走了；而且，少数还没死的当地仆人也已尽快离开了这座房子，甚至没人记得还有个小姐在房里。

我偶尔会过度关注小孩的人身安全问题，它充斥于任何有关怀孕、分娩和出生头几年的讨论中。从受孕的那一刻起，我女儿就受到了处方的青睐，并卷入各种争论之中：酒精含量，无烟区，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将来的乳制品与麸质过敏，室温以及睡姿，疫苗接种的时间安排与维生素。事实上，甚至在受孕之前，我女儿便已是如此，当时人们极力劝我，为了宝宝的将来，我得清洁和用力擦洗自己的身体，将我的身体由人们臆想中的藏污纳垢之地变成神殿。我发觉这种清教徒式的行为有些让人不快，仿佛这些黑暗的想法已走投无路了。有人说得给宝宝接触过的一切物品消毒。将物品放入沸水中至少十分钟，或将其放入消毒液里半小时，后用沸水冲洗，这两种方法均可。这些做法对环境有何影响却均被置之不理。首要任务是让宝宝、家中以及自己一直处于无菌环境中。细菌与有害物无处不在。我无意间听到人们聊起让橡胶奶嘴免受细菌侵害有多困难，毕竟奶嘴从蒸煮锅到宝宝嘴巴的过程中满是危险。虽然你眼睛看不见，但很明显，数以千计的细菌—或是E.内斯比特口中的德国人[16]—只需几秒钟的工夫便会出现在奶嘴上。在超市里，我看见了一些装着婴儿食物的小罐子，它们像是加工过的、变了质的、罐装的爱。经过真空包装和消毒处理的其实是爱。超市提供了充满浓郁香味的密封袋，以便用完后商品好处理。在这个受到污染的世界，爱与爱之间无法建立联系。

玛丽·伦诺克斯之所以被消毒，似乎是因为她缺乏爱。她的朋友迪肯让她去透透气，去外面看看万物生长，去弄脏自己。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强烈反对洁净的声明，该文章暗示，未接触过细菌的小孩实际上在细菌面前更脆弱。这文章压根就算不上强烈反对。它只是将问题

变得更加尖锐。它力劝人们在污垢中创造洁净，最终的目的不是消除污垢，而是将其纳入无菌环境之中，转换为无菌物质。糟糕的污垢、肮脏的污垢存在于爱的边缘地带。它表明关爱遭到忽略，未起作用，不够充分。如今看来，对污垢采取过度的防范措施，其实暗示着我们已靠近了这些边缘地带。拥有有益的“污垢”，实际上表明你的关怀与爱护要更胜一筹，它们无所畏惧、灵活多变、言行纯粹，且远离仇恨。

20世纪40年代，有一位名叫D.W.温尼科特[17]的古怪却可敬的儿科医师兼心理分析学家，他有过一个著名论断：所有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厌恶自己的宝宝。他的意思是，母亲并非不爱宝宝，只不过她们也厌恶宝宝。“称职的”母亲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厌恶的投影，通过消毒，她消除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和猛烈且别扭的情绪，并将自己想要放弃的冲动保存在真空密封的小罐子内。温尼科特还补充道：“在宝宝有能力意识到母亲厌恶他之前，母亲便已厌恶宝宝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因觉得残忍或后悔而颤抖不已。温尼科特还认为根本不存在宝宝这种东西。宝宝仅作为母亲的一部分而存在。宝宝没有个性，无法独立存在，既然如此，除了你自己，你还能去爱或恨什么呢？弗洛伊德则更为传统，他写道：“在（母亲生的）孩子身上，母亲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面对自己时如同对待某个与自己无关的客体，出于自恋，她们会给予这种物体完全的客体之爱。”下列情形在孕妇文化中的确比比皆是：很难优先考虑母亲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很片面，它孤独地幻想着带有花边的摇篮、雪白的小衣服、天使般的婴儿床、星星徽章和泰迪熊。就像一个青少年在自己那贴满海报的房间梦见了流行明星那样，一位初为人母者的爱存在于脑海之中，也存在于她用物质投入换来的华服之中。我从这种服饰的演变中看见了在未来某个时刻扭转局面的希望：在超市的下一个走道里，带有头盔、武器和锥形胸部的物品取代了天使和泰迪熊；含有添加剂而难以辨认的包装袋里装满了看似小型交通事故或小规模爆炸的物品，取代了那些小巧的完美罐子。那个无关的客体显然得到了他应得的。

面对这种彰显出我对女儿感情的强烈对比，我本不该惊讶，却还是吃了一惊。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这辈子为爱所困。我的这些爱首先

遵守了家族叙事的惯例，后又遵从了浪漫主义习俗。我从未试图去改写这些规则。我曾与它们的步调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可这份全新的爱明显由我负责。每当想到自己的孩子，我都会突然渴望为自己过去所有的无能为力做出补偿，用我希望别人爱我的方式去爱：满怀仁慈、彻彻底底、明明白白。眼下她对这份爱的体验还相当可疑与模糊。我希望把它记下来，放进抽屉里留给她，仿佛它是某种产权、契约书，如此一来，若我有不测、来不及向她解释我有多爱她，她至少还留有某种证据，某份遗产。几乎从一开始便很有必要去向她解释，并非因为她太小，无法理解她被人爱着，而是因为这份爱本身，或者至少是我对这份爱的经营，在初期遭遇了一些困难，鉴于这份爱由我负责，我觉得有必要做些说明。

女儿六周大时，某天早上我独自在家，试图让她入睡。我异常疲惫。前一晚充斥着激烈的言辞、超现实冒险和有关忍耐的惊人壮举，黎明已经到来，如同一场宿醉。她和我已好几小时未眠。十小时内，这也许是我第二十次喂她，并将她放入摇篮。我可没指望一下能休息多久：我只想要属于自己的几分钟时间，整理一下那张乱糟糟的脸，在镜子前大声说话，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此刻，我不是只想让她睡觉。她必须睡觉，不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处境突然变得合乎情理起来，非常绝望，且不容置喙。我把她稳稳放入摇篮，然后抽身去了卫生间并关上了门。很长一段时间内屋里没有任何声响，这让人既庆幸又害怕。这段时间由我来做主，同时也有如下可能：她的需求不会屈服于我的；她继续存在，让我失去耐心，让我无法去爱，让我无力拥有她。然后，她在隔壁哭了起来。我大叫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在叫些什么，大概是太不公平，显然不可理喻之类的话，就因为我想要属于自己的五分钟。睡觉去！我一边叫，一边站在她的摇篮前。我之所以大叫，不是因为我觉得她也许会听我的话，而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特别想把她扔到窗外。她异常惊恐地看着我。这是她这辈子头一次坦诚地带着情绪看我。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她终于睡了，静静地，乖乖地，同时谢绝了我的帮助。她从我身旁撤离，让我倍感羞愧；睡眠如此让人渴望，却也难以忍受。我想叫醒她，给她我的爱。由于她安静地一动不动，我的爱再次变得完美，

而她甚至都没有醒过来看一眼。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电话旁抽噎了起来。我朝她吼了，我忏悔道。最终，我向好几个人忏悔了我的行为，可他们都未给予我期待中的那种宽恕。他们说，天啊，宝贝真可怜。他们说的不是我。他们又说，别担心，我猜她会忘掉的。我明白，我只能靠自己来消化我那些过激情绪，我已经失去了爱的庇护。作为母亲，我无法得到他人的谅解。我意识到，这便是所谓的负责任。

久而久之，我越来越受“没人爱的孩子”这个想法的折磨。一听到遗弃和虐童的故事，我就很揪心。我会因有关孤儿、难民和战时儿童的新闻照片哭泣。一档每周专注报道需要手术的儿童的电视节目会让我疯狂地用指甲抓沙发。我的同情心，我那笼统的恻隐之心已浓缩成一个伤口，一块因知情和有能力伤害他人而产生的暗疮。我意识到，在爱里，我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是施害者；我认为自己很无辜，也相信我所谓的争执是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我看来，爱如同国家利益，人们对它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信念只是为了掩饰我对于自己可能没人爱的那种恐惧。在街上，我看见一位衣着光鲜的女子正呵斥一个难民，后者怀里抱着一个用一捆布裹起来的婴孩。你们靠的是政府施舍！那女子口齿清晰，说得缓慢且残忍。她的声音大而尖锐，因教养和愤怒而颤抖着。她希望别人能充分理解她。我痛恨她，然后堂而皇之给了那难民一些钱，只是为了侮辱她。在我看来，那女人似乎充满毫无爱心的人才有的那种自信，他们拥有一种拒绝别人的神秘能力，能把自身的无能作为武器去对付他人。稍晚回家时，那个难民又纠缠起我来，我有些困惑地打她身边走过。仿佛我突然意识到的不是去爱，而是爱的缺乏。事实上，我并没有变得更有爱、更慷慨，或更宽容。我只是变得更加害怕爱的界限，且更确定这种界限的确存在。

宝宝睡觉时，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奥利维娅·曼宁的《巨大的财富》[18]，这本小说似乎在跟我对话，这让人有些窘迫。新婚夫妇哈莉特·普林格尔和盖伊·普林格尔去了战时的罗马尼亚，盖伊在那儿的一所大学里做老师。普林格尔夫妇彼此不太了解，可很快他们便了解彼此了。盖伊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他博爱，不太在乎金钱，在社会和政治

上有责任心。哈莉特有些内向，挑剔，有鉴别力，自我保护意识强。两人对于婚姻的理解迥异，南辕北辙。盖伊希望爱所有人。哈莉特希望他爱她。盖伊希望爱兼收并蓄，向外看，受众广。哈莉特则希望爱具体，让人崇拜，有保护性。盖伊花了很多时间，却无法给他们弄来一套体面的公寓，只能在咖啡厅跟学生长篇大论，整晚东奔西跑去帮助那些痛苦的年轻女性。哈莉特则长时间板着脸，并变得非常依恋猫咪。最终她遇到了另一个男人，同他建立了深厚友谊。一天，空袭时他俩正好在一起，并一起躲进附近一个地下室，哈莉特在那里看见了一幅动人的景象：

> 另外两人在地下室的楼梯上：一位女士和一个小男孩。那位女士坐着，男孩坐在她腿上。她正将孩子的脸紧紧贴在胸前，自己的脸颊则靠着男孩的头顶。她闭着眼睛，哈莉特和查理出现时她也没睁眼。她眼里只有那孩子，热烈而又温柔地拥抱着他，仿佛努力用全身保护他。
>
> 哈莉特不愿打扰他们的亲昵，于是转过身去，可眼光还是朝向了他们。两个人被爱包裹着，这一幕让她异常激动，她吸了口气，双眼满是泪水。
>
> 她忘掉了查尔斯。他问“怎么了？”时，那稍显古怪的语气冒犯了她。她说“没什么”。他一只手碰了碰她的手肘，她挪了挪身子；可是传来了解除警报的声音，他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了。
>
> 地下室外的街道上，他再次问道：“怎么了？”然后尴尬地想要关心她：“你不开心吗？”
>
> “不知道。我没想过这个。人必须开心吗？”

我们发现，孩童时期的哈莉特没人爱。她的父母不太喜欢她；他们去世后她去投靠一位姑姑，那位姑姑也不太喜欢她。也许是因为她

误以为自己在感情方面无所期待，才促成了她与含蓄的盖伊之间的婚姻，这又导致她余生也认为没人爱自己。她正是被这种感觉，这种无人需要她的感觉所吸引，可她几乎不接受这一事实；正相反，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从盖伊身上探求他的确爱她的证据，并最终与更多愁善感的查尔斯调起情来，查尔斯爱她，更重要的是，他承认了这一点。这些坦白让哈莉特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争取到查尔斯的爱以后，她又与查尔斯保持起了距离，在言行方面皆是如此；她不情不愿，态度模糊地对待查尔斯，就如同她丈夫对待她一样。很明显，她不能自已。到目前为止，她瞥见楼梯上的那位女士和孩子的一幕乃《巨大的财富》中最动人的瞬间，它很短暂，很压抑，不够果断，如同悲剧一般。尽管如此，还是明显可以看出，那便是哈莉特所追逐的爱。对她来说，做母亲是逃离成人的情感迷宫的一条出路。突然间，查尔斯像一只蚊子那样惹恼了她，这是因为他有欲望，他只是个外人，而且他会从男性角度出发，问一些关于开心、幸福的愚蠢问题。她希望两个人相互依偎，不仅身体上纠缠，还能一起保持沉默。她希望自己的孤独最终能够得到缓解，得到救赎。她只能转过身去，“不愿打扰他们的亲昵”。

若父母的爱是一切爱的蓝图，那它也是一种对于自爱的重新演绎、修订和调查。照顾女儿时，我又再次想到了自己的脆弱和与生俱来的无助感。我目睹了自己想不起来的某个存在，早年的我生活在这个白色国度，这个世界里满是奶水、阴影与虚无。我能活下来，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也被人照顾着；可我一再体会着抛弃与缺爱的意象，于是我忍不住去探究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如果我离开宝宝，如果我白天外出，如果她哭的时候我没抱她或拒绝喂她，会发生些什么。在争吵不休且浪漫的爱的处境中高高在上地生活了许久以后，仿佛我突然被推下了地下室、地基。爱比我猜想中的更受尊敬，更实用，更努力，可它也含有巨大的破坏力。之前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拥有那股力量；如今这股力量萦绕在我心头，仿佛有把枪在手边的抽屉里。我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宝宝，不惜时间、心情和能力，从不止息养育着宝宝，这一切都被人忽视了。

女儿出生几天后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我几周前就买好了票，没

料到女儿会这么快出生。因为伤口的缘故，我走路有些困难，也还在摸索母乳喂养的方法，不过我还是决定去。怀孕时，我有大把时间去做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安排，以便在做妈妈后继续保持独立，继续做那些我感兴趣的事，我热切地想象着自己参加派对和盛会，在德国森林里滑雪，躺着欣赏地中海的落日，坐在桌前沉思，而宝宝则一直存在于我头顶上某种卡通对话气泡框之中。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我女儿出生后不久，仿佛悬崖上凸出的石头。我的婆婆会帮我照顾宝宝，她看上去很紧张。考虑到我身上带着已知的宝宝唯一的安抚与营养源，一旦事情出了差错，我婆婆的可用资源便很有限。我缩短了计划的外出时间，保证在音乐会的幕间休息时回来。在半路上一个电话亭里，我收到了婆婆略带犹豫却积极的汇报。在地铁站，情况似乎也很稳定，然后我上了车。车站一个个经过，我觉得有一点疯狂，愈发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仿佛我偷了东西。终于到站，我蹒跚地走上自动扶梯，扑向最近的电话亭，仿佛那是个氧气罩。电话接通以后，地铁站的大厅立即充满了我女儿的哭声，哭声很小，像小羊的叫声。我婆婆的声音穿过静电干扰与哭声，传到我耳旁时已很微弱了，她的声音紧张但有力，仿佛她正在战地打电话发新闻稿。我婆婆报告道，她十分钟前哭了起来，如果让她吃手指的话，也许能起点作用。地铁站外的街道上，车辆川流不息，兀自轰鸣。人们在我周围走来晃去，消失在伦敦的夜色之中。他们不仅不了解我如今所处的战乱地区，同时也远离那儿，仿佛它存在于世界的另一端。要我回家吗？我冲着听筒大喊道。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会儿后答道，你自己看着办吧，她最后会睡着的。我保证五分钟后会从音乐厅再打电话过来。等我真的打了电话，却收到了坏消息。我有些神志不清地坐出租车仓促地回了家，今晚外出就为了去拜访西区的电话亭，这实在有些奇怪。我婆婆的情况也不比我好。她大老远地来到伦敦，却只能坐在一旁陪着我那又哭又饿的孩子，而我则不停地给她打电话。

我离开宝宝时，让我烦恼的并不是爱，仿佛我不论去哪里，身后都连着一根绳子。真正让我烦恼的是当我离开她时，这世界还留有因我离去而带来的污点，于是不论我现在做什么，都必须减掉那些半途而废的部分。去电影院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不再纯粹，少了些乐

趣。我的存在似乎在一夜间有了物质价值，仿佛被装上了出租车的计价器，它密切反映了我所作所为的价值。外出时，我总会因为它的嘀嗒声而分神。我的朋友们虽然乐意见我，但不一定请得起我。我们在无法跨越的边界处见面，一边是自由世界，另一边是充满母爱的封闭政权。虽然眼下我已忘掉这些差异，但它们的确存在于我之前熟悉的生活中。我曾与这样一群人一同度过许多晚上，他们饱受种种困扰：工作未完成、感情不顺、缺钱花，以及日常的焦虑或悲伤。我感受过他们的不安与亢奋，也见过潜藏在他们眼里的东西。区别在于到底有多勇敢，要知道，虽然鼓励你的朋友勇敢地挣脱焦虑带来的束缚、忘掉她的烦恼、满怀希望并不难，可没人会为一位不再觉得应该对自己孩子负责的母亲叫好。相反，宝宝像某个难以捉摸的女神躺在家中，发着光，震动着，很奇特，象征着高尚的需求。作为她的信徒，我唯有以某种神秘方式皈依到她门下，因此疏远了我爱的人们。我必须回到她身边，他人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出于尊敬与关心，还是放我走了。

《包法利夫人》里，艾玛·包法利把她的小女儿送去和镇外的一个奶妈一起生活，让她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头几个月。艾玛的爱飘忽不定，躁动不安。这份爱拒绝受她孩子的束缚，也拒绝受家的束缚。年轻貌美的她只晓得家庭生活充满条条框框，法国乡下的无趣且孤独，父亲以及后来丈夫对她的爱不够成熟，但堪称宠溺。反过来，爱自己的宝宝就是承认自己受了限制。艾玛急于去体验，去成为主体，成为焦点，她的活力源自她对别人的意义。她完全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做妻子时她是一个幽灵，做母亲时她又缺席。谁又能怪她呢？她思索着。她的生母过世了，也无欠款。终其一生，她都在挖掘一条婚姻之下的隧道，她的孩子却威胁到了这项工作。如同重影一般，宝宝可以占据她母亲的爱，吸引多余的情感，打扰他人，在母亲不理别人时代她说话。对于艾玛·包法利而言，母性只是一个化名，在她的偷情生涯里，她偶尔也会冒充这一身份。她乃不称职母亲的集大成者：这女人执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她曾一度试着在扮演母亲角色时多一点真诚，也许觉得这么做可以自救，可她却突然地迅速走了

下坡路：

她从奶妈那里接回了贝尔特。有访客时，费莉西会把她带下楼来，然后包法利夫人会撩起她的衣服，让客人看她的腿。她爱慕孩子，她说：孩子是她的安慰，她的乐趣，她的癖好。她一边拥抱自己的女儿，一边抒发感情……艾玛瘦了，她的脸颊失去了光彩，她的面孔拉长了。仿佛她的生活里很少与尘世发生联系，仿佛她的额头上显露出了上天赐予的高贵印记……可她的心里充满了贪婪、狂暴和憎恨。

在这个貌似圣徒的人内心酝酿的暴力爆发之际，这暴力正好降临到她的孩子身上。

火熄灭了，时钟继续嘀嗒响着。她突然有些好奇地发现，整个人都处于动荡之中时，外界的事物居然可以如此冷静。在窗户和工作台之间，小贝尔特穿着针织小靴子，犹豫地挪了挪步，试图来到她母亲面前，抓住她的围裙带。

“别烦我！”艾玛大叫一声，把贝尔特推开。

可片刻之后，小女孩又回来了，这一次她靠在母亲膝上，抬起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母亲，一滴口水清晰可见，从她的下巴流到了母亲的丝质围裙上。

“别烦我！”这位年轻女子突然间烦躁起来，于是再次说道。

她的神情吓着了孩子，孩子哭了起来。

“哎，赶紧滚远点！”这位母亲一边大叫，一边用手肘把她女儿支开。

贝尔特踉踉跄跄地撞向衣柜的柜脚，她摔倒了，碰到了铜花饰上，划破了脸。血流了出来。

福楼拜告诉我们，穿着小小的针织靴、腿部供客人观赏的贝尔特在成长过程中无人关爱。双亲过世后，她被送往纺织厂谋生。她是她母亲饱受摧残的产品，是她母亲放弃掉的计划。她并不具备那样的特质，即颇具权威的母爱印记。她渐渐消失于黑暗之中。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女儿已开始了自己爱的生涯，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这也许会成为她这辈子最了不起的故事。她是何时开始的？她是如何学习的？爱何时忽略了她，留下了幽灵般的冰霜散发出的印记，发出了舞会的秘密请帖？一开始情感就存在于她体内，无法名状，难以抑制：我听见它的怒吼与尖叫声，因满足而发出的咕噜声。可当她的生命朝着文明的方向奋进，这种情感开始成形。她九个月大的时候，她父亲和我外出了一周，没有带她一起。等我们回来，她并没有表现出愉悦、惊讶或生气的样子，而是花了好几分钟时间默默地从她父亲的胳膊爬到了我的胳膊，然后又折返回去，就这样来来回回，仿佛水从一个瓶子倒进另一个瓶子里：我意识到，我们的离开让她走了样；由于我俩都不在身旁，她失掉了容纳自己的容器。等到1岁时，她已学会了去爱，就如同她正在学习行动和说话一样，这些行为虽然原始，但易于识别。她像蝴蝶或蜂鸟一样去爱，短暂地到处停留，在她所溺爱的世界里曲折行进，行事逻辑无可辩驳，全凭冲动。她学会了走路，因此也学会了取舍与讨好，跑向自己钟爱的事物，张开自己的小胳膊去拥抱自己想要的东西，将自己一动不动的小嘴唇到处凑来凑去模仿亲吻。此前爱着她的我们未得到她的回应，而现在却真的很高兴。她也学会了拒绝，有了自己的偏好。“巴！”如果我不合时宜地抱起她，她会演戏似的啜泣。“妈”，感到我的精神开始涣散时，她又会卖弄风情似的郑重提醒我。

在某些方面，她的喜好与脾气的养成，以及她性格—如同再次出

生—的慢慢形成都让人感到十足欣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自我如同一个我们一直试图解开的谜，又如同某个我们用猜测填满了的空间，如今从我们身边被夺走，就像令人担忧的指控被撤销。现在，她来要回自己，把自己从我们身边带走；这种分离标志着一种爱的结束，以及另一种爱的开始。她婴儿期片面的热情，那种恐惧与责任的骚动，那种无差别的情感的黑暗洪流，如今都已平息下来。这份爱曾是物质的，也曾是精神的，曾同时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我不再突然陷入笼统的恻隐之心或悲伤的浪潮之中，它们曾来回流动于我心中那毫无防备的平原。这份新的爱筑起了高高的堤坝。它带有墙壁与房间。它健谈、体贴、细心、礼貌。它更像是浪漫之爱，即成人之爱，甚至超出我的预料。我只好阻止自己谈论我女儿，阻止自己描述她的英勇事迹，叙述她与我的关系。如今我必须为她做的事变少了，她不像以前那样无助，这遮蔽了我照顾她时那段浑浑噩噩的历史。我羞愧地想象着她在我年老时照顾我，给我端便盆和夜壶；过去的几个月的确是场考验，我想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能得多少分，又能收获多少—数量并未公开—忠诚与爱呢？事实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都是考验。我忘了，她终有一天会青春焕发，她终有一天会走着，说着，告诉我她对我的看法。我想知道我是否因为自己的不乐意和暴怒而冒犯过她。我想知道自己是否折磨过她。我希望我曾是个灰姑娘似的好人，哪怕很难；我不想像灰姑娘那些丑陋的姐妹一样，她们的脚很大，脚趾长了厚茧；她们受到了惩罚，并未得到宽恕；她们也爱过，但为时已晚。

妈妈宝宝

一天，我注意到我女儿身上出现了一条模糊的线，它像一条接缝，从脑袋直接延伸到她身体中间。它看起来像她左右身体的黏合处，让她看起来如同人工制造的，让人担心。怀孕期间，我身上也长了这样一条线，它像接缝一样把我圆滚滚的肚子一分为二，仿佛准备等着手术刀准确地将我切成两半。这条线被称为妊娠线，是孕妇共有的特征：可以用医学知识来解释这条线的由来，但与这条线的象征意义所营造的氛围以及它的预言特质相比，医学解释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奇怪的是，我女儿身上的那条线如同在向我的那条线致意，仿佛我被拆散后又被重新组装成了两个人。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将母亲和她新出生的孩子视为两个独立的存在是不合适的：他们为一个整体，一个复合生物，最好将其称为“妈妈—与—宝宝”，或许也可以称其为“妈妈宝宝”。虽说这一称谓完美地描述了女儿出生后几周时间里我所体验到的生理反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我依旧觉得它让人感到紧张不安，甚至危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座扩建了的房子：原本是墙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新房间。我觉得我的光与热正令人目眩地流入那个新房间。

妈妈宝宝被设定成为一个完全可持续的部件。宝宝一生下来就配置了吸吮能力。与此同时，妈妈在怀孕期间就已经接到了“用法变更”的通知。她的乳房被征用并排毒：腺体和组织都开始了工作。等到宝宝出生，乳房就像是两个启动了红色预警的弹头。宝宝一吸吮，这台机器便突然活跃起来；乳汁神奇地产了出来。乳汁完全足以在宝宝生命的前六个月喂饱她，直到她能坐起来、吃东西。乳汁为宝宝提供了她可能需要的每一种营养。它没有细菌，温度刚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供应。宝宝成长的过程也是妈妈萎缩的过程。妈妈在怀孕期间所储存的脂肪为乳房的工作提供了燃料。她的子宫收缩，荷尔蒙流通并被排出。她的身体正在撰写生孩子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有着

舞蹈般的美与和谐。到最后，妈妈宝宝准备好以妈妈和宝宝的身份各自生活了。颜料干了，妈妈和宝宝身上的那条线已经消失。妙不可言，是吧？

你想不想试试喂她吃奶？我被人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助产士问道。我望着她，仿佛她是在叫我给她沏一杯茶，或整理某间屋子。我依旧栖息于另一个世界里，在那里，做完手术后，人们得到了同情与照顾，并留在那里康复。我女儿小小的身体被裹在毛毯里，然后被递到我手里；把她接过来的时候，我一时间感到思路异常清晰，几乎不太真实。这一刻，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存在，这人是我，但又不受困于我的身体。她看起来像是某种殖民地。在可预见的未来，她的需求和愿望将与我的需求和愿望竞争，而前者通常会得到优先考虑。我喂她吃奶。“自然而然”这个词以某种卡通对话框的形式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的确，我并不觉得这事儿非常自然而然。我觉得仿佛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吸我的乳房。

助产士赞扬我女儿很会吸奶。她很有领地意识，也很自信。她对如何吸奶的了解要多过我对如何被她吮吸的了解。奇怪的是，我想象着，眼前这个事实源自她出生前的一场阴谋，在这场阴谋中，我的身体被指定为集合点。奶会在乳房里。助产士会发信号。每三小时你必须取一次奶，否则就没了。我们的代理人很快就会联系你。他们会去做家访，并自称为“保健员”。吸了大概一刻钟后，我残存的那点自信随即浮出水面，仿佛从海难抢救出来的某件物品。我需要一杯茶，需要洗漱，需要休息。我意识到宝宝在吃奶时这些事我一件也做不了。我想知道她何时停下。最终，不知不觉我陷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等我醒来时，我发现某种超然状态已经来临。我女儿躺在我怀里，她张着嘴巴，闭上眼睛，什么秘密也没泄露。等到下次我喂她吃时，我发现自己已对“停止”这件事有所认识了。我干坐着，自认为坐了足够长的时间，然后干等着。我看着她用嘬着的粉色嘴唇，看着她的下巴上下移动，试图从这些行为中发掘一些决定性的线索。我故意走来走去。我环顾房间，希望回头时宝宝就会莫名其妙地停止吸奶。又过了15分钟，然后过了30分钟。终于，不知何故，她镇定地“砰”的一声放开了乳头。在我看来，这“砰”的一声强调了某个我未曾参与的决定。

第二天，我告诉助产士我喂了宝宝一个小时，并确信自己的腿已深度麻痹了。这时候，她高兴地说，你只需要把小指放进她的嘴里让她张开牙龈就行了。听到这个建议我很高兴，我把它视作让我留任的指令。似乎我获得了活着的许可。我女儿的眼睛紧闭。我把手指放进她的嘴角，悄悄撬开了她的嘴，仿佛一个囚犯试图越狱。

回到家后，妈妈宝宝这个缓慢移动的大块头在脆弱的房间里走动，像恐龙那样愚蠢与笨拙。乳汁自发从我的乳房溢出，打湿了我的衣服。疼痛如同小匕首一般刺痛了我的身体。我不安地与自己，与那个曾经的我同居。我看着这人的衣服，看着她的东西。我重温了她的回忆，像一个好色且略感丢脸的冒牌货。她的自我投入和脆弱的感情让我惊恐。我占据了她的爱，她的关心，我就像理清家族史的某个后代那样超然，不同的是这些关心依旧存在：我被它们所纠缠；它们要求我参与进来。爱、期待、愤怒和憎恨通过它们熟悉的渠道流向我，尽管它们让我满怀奇怪的厌恶感，我依旧努力容忍它们，以避免灾难。我像个间谍，专心于打理自己的外表；同时，我的生活则偷偷地以我女儿的秘密为中心。我渴望与其他间谍聊一聊，向他们吐露我的心声。当我遇见有孩子的女士时，真相便轻率地从我口中流露出来。我不在乎自己，我说。我没有主体性。他们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反正我不在乎。

联系之线悬挂在我身上—仿佛我正散开—将自己卷入世界的弱点之中。我看见老人、坐轮椅的人、讨钱的人和在街上哭的人，他们牵动着我的神经：我觉得自己应该供养他们，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喂奶。医院的小册子提醒我，母乳喂养的母亲务必记得好好照顾自己，每日应多喝一升液体，其中至少一部分应该是奶。我喝不了。我已告别了提要求的时代。我相信自己有了已死之物的免疫力，对曾经深有感触的一切都已免疫。可是，我却变成了一个应答部件，一台发报机。我读到，因为我的乳汁，我女儿正在获取我的抗体与免疫力，我有时想象着自己能感受到乳汁像一条光之河一样从我体内流出。我想象着它勾勒出女儿身体里的小溪谷的轮廓，加固了她的内壁。我想象着自己的强健体魄转移到了她那里，让我没了实体，只剩一股魄力，如同后天形成的瘴气，像光晕那样包围着我女儿。

喂奶持续了数小时。我听说，以前的女人用母乳喂孩子时，将喂奶时间严格控制为每四小时一次，每次20分钟。她们说，她们不被“允许”做其他事。在我的设想中，那些遵守这一规矩的人应该对这一虚构的禁令感到很高兴。它有某种马克思主义似的吸引力，因此被人怀疑。现代制度则只与供需有关。它建议宝宝一旦饿了就得喂她，通过这一方式，乳房将产出宝宝所需的奶量。你也许会惊讶于宝宝有多饿；你可能不自觉地在24小时内喂她20到30次，不过别担心！母乳喂养的宝宝绝不会吃得太撑。最后这句表明喂奶毫无意义。每天我都必须束缚着双臂坐在扶手椅上20到30次，这时我会匆匆翻阅涉及这一主题的书籍，搜寻其中提及我自己的地方和一些关心我的线索，可是什么也没有。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块未受保护的荒野，充斥着电锯的尖叫声与油井的钻孔声。甚至连我在医院获取的那一线希望也被夺走了。尽管助产士向我保证过，我却得知人们不赞成对喂奶进行计时与控制。若由你自行结束喂奶，那你怎么知道宝宝到底吃够了没？看起来顾客总是对的。这一套学问中有些东西让我很不安。另一位助产士来我家时，我问她我该多久喂宝宝一次。她答道，只要她饿了就得喂。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饿？很快你就会知道，她一边回答，一边使了个让我感觉有阴谋的眼色。可与此同时，我还是执意问道，我怎么知道呢？那助产士看起来很担心。很明显我遇到了问题。她给了我一家由医院经营的专攻母乳喂养问题的诊所的详细信息。她的字迹圆润且颇具喜感，如同小孩写的。

诊所在医院顶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开门时，我被一阵声浪击中。房间很拥挤。女人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桌上，还有两人挤在一把椅子上。宝宝的哭泣声像塞壬刺耳的合唱，盖过了女人们激动的谈话声。空气很湿热，充满了等待与噪声。一位拿着写字夹板的女士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取走了我的详细资料。见到助产士前不要喂宝宝，她说。我有些惊慌，于是问她到底要多久。她仁慈地笑了笑，说我也看得出来她们今天特别忙。她们诊所出现的那些紧急情况有望推翻妈妈宝宝变化无常的这一规律，可她看起来却并不在意。我找了一块空地坐了下来，把我女儿放在腿上。

其他女人大声谈笑着。她们的脸因房里的高温而发红。她们心烦

意乱地糊弄自己的宝宝，一边把他们转过来转过去，一边把手指或奶嘴放进他们的嘴里。宝宝们用力地胡乱挥动着手，啜泣着，他们红色的小脸蛋上写满了愤怒，如同老人的脸。小帽子、小靴子，以及带绳的小手套飞离了激动的四肢。宝宝们像一排生气的水壶。他们哭的时候，妈妈们的说话声更大了。一个女人冲着她的手机大喊大叫。房间远端的门时不时地打开，随后某个名字便会被叫到。我女儿睁着大大的圆眼睛看着。有这么多同类聚集在一起，她似乎消了气。我想知道我们为何全都在这里，然后记起来这是因为我们在喂奶方面遇到了问题。我有点难以相信：房间里愉快热闹的氛围居然让喂奶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宝宝们哭闹抱怨，可女人们却把她们自己紧紧绑在一起，造起了友谊的筏子。她们高兴地航行在一片水域上，若各自行动，这片水域可能早就淹死她们。我开始觉得我的问题出在孤立无援上，出在疏远了这个世界上。等到叫我名字时，我已无法清楚地想象并描述这些问题了。

诊室小而安静。五六位女士整齐地坐成一行，她们把腿放在摞起来的电话簿上喂宝宝吃奶。宝宝们像君王一般躺在母亲大腿上的白色枕头上。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士沿着那坐成一行的女士巡视，时而调整枕头，时而增加或拿掉一本电话簿。她们偶尔会低声与其中一位母亲说话，其他母亲便抬起头，脸如同月亮一样无辜与无知。有人轻声问我要不要来杯咖啡。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士过来坐到我身旁。她一头灰色的长发，戴了一副圆眼镜。在她的白大褂之下，我瞥见了她华丽多彩的裙子。突然间我充满希望，觉得我的情况还算有救，也觉得之前自认为无法表达的一些东西可以具体表达出来。我病了，这位女士会治好我。她让我告诉她哪里出了问题。所有事情，我想说却没说。我发现自己无法确定到底该跟她具体说点什么。然后我告诉她宝宝似乎吃奶时间太长了。她含糊地点了点头。我感觉她没听我说话。她把枕头和电话簿给我，让我开始喂奶。与此同时，她从我身边走开，去查看她负责的那一排的其他妈妈宝宝。等她回到我身边，她挪了挪我女儿的脑袋，让我把宝宝的下半身举高一点，这样一来宝宝就能向后倾斜了。她的同事看到了这些调整。还挺新鲜的，她一边大叫，一边开心地笑。可不是吗，我的医生一边愉快地回答她，一边夸张地做着

手势。她俩在穿过房间时擦身而过，像小女孩似的在房里转来转去。我开始意识到我不会被治愈，除非这些女人全都是女巫，可枕头和电话簿却妨碍了她们施法。我女儿睡了。没人注意的时候，我用小指掰开了她的嘴。我离开时，那两位女士像女主人似的挥着手、装腔作势地说，欢迎随时再来啊；我快步走过拥挤的候诊室，通过记忆中医院那可怕的回廊，走完一段又一段发出回响的台阶，摆脱了这些让人窒息的台阶，渴望呼吸到外界的空气。

日子过得很慢。它们的惯常构造已不复存在。一次次的喂奶在日子里留下了痕迹，就像把木桩打入未开垦的土地。等到我女儿三周大时，我已从喂奶中悟出了一点门道。她每三小时哭一次，准时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意识到，自己所理解的头一次喂完奶到下一次开始喂奶的时间，对讨厌“停止”这个概念的她而言，相当于头一次开始喂奶到下一次开始喂奶。我发现，即使我自行停止喂她，事实也是如此；喂奶这一行为会暂时撤退，就像某种东西被驯服，又像某种危险的东西被戴上了口套、蹲在我生命里的某个角落。时间再次流动，流经它干涸的支流。虽然我依旧不相信从我乳房里出来的东西合情合理，并足以在没喂奶时让她活下来，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学和医疗专家到我家来干涉我喂奶。她有时至少有两小时未摄取我身体的养分，此时，我出于本能，开始有点为她感到焦虑，仿佛她正在走钢丝，而且走得太远了，又仿佛她无法在时间中，在重力下，在远离我的情况下存活太久。某一天，她在我最后一次喂完她后哭了一个小时；这证明了她有需求，印证了我对她能自给自足的怀疑。我喂了她。接下来的几天她哭得多了，然后越来越多。哭声似乎能自我分裂，如同中央沟[19]上的裂纹，在沉默中修了一条锯齿状的路，直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表面被其覆盖。我将乳汁倒入这些裂缝之中，好像要填满它们：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喂她，希望能让我们回到一体，回到不用喂奶的状态。有一次我喂了她差不多两小时。这回应该够了吧，我想。五分钟后她又哭了起来，我便盯着她嘴巴那个红色洞穴发起呆来。

女儿哭了起来，这时别人说，我觉得她饿了，把她还给了我。我就像一头奶牛，闷闷不乐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坐在餐馆里，抑或坐在车的后排，我衬衣的纽扣没扣。看样子我是无

法摆脱让宝宝挨饿的谴责了。有时候宝宝会边吃奶边哭，这时候，我像庆祝胜利似的迫切想要召开一场研讨会。你们瞧瞧！我会告诉每个人。你们倒是说说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位女士某天来到我家。她正在做一项有关新妈妈的感受的大学研究，她想问我一些问题。宝宝正在哭，我得起身去开门，所以没喂她。天啊，那位女士说。我等着她告诉我宝宝饿了，可她没说。她问我是否筋疲力尽。我说是的。我没把握地向她讲述起自己的生活已变成一场乱糟糟的梦，梦里全是喂奶与哭声。她同情地聆听着。快看，不久后她一边说，一边向宝宝点着头，我暂时忘了宝宝，眼下她正躺在我怀里，她睡着了。我俩一起盯着睡着了的宝宝看。最终我起身把宝宝放进了婴儿车，并确信某种魔法出现了，确信这个有着一头烫过的银色头发和一张好看却模糊的面孔—我几乎没注意过这张面孔—的陌生人实际上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这个幽灵不费吹灰之力就推开了挡在我生命入口前的石头。宝宝睡了三个小时。那位女士和我聊着天。离开时她告诉我，不论宝宝什么时候哭，记得在为她做点什么之前为自己做点什么。我点点头向她致谢，然后关了门。

我试图解开这团满是哭声与哺育的乱麻，宝宝和我被紧紧缠在其中。如今，没吃奶的时候她一直在哭；从生理上来讲，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我们貌似已经接近临界质量了。喂奶已走入可想而知的极限了。我默默告诉宝宝，喂奶并不能替代生活。喂奶就像是过载的灯泡，通过的电压逐日增加，那灯泡会变得愈发炽热，愈发危险。

尽管如此，她的体重还是增长缓慢。诚然，一个用母乳喂养的宝宝似乎不可能吃撑，我也的确这么试过。我试着从她的角度去看事物。每当她哭起来，我的乳房看起来就像是调查骚乱的监狱守卫：这两个傻傻的圆脸帮凶把她围住，让她住嘴，给她派发鸦片制剂。她哭有时候是因为累了或很痛苦，有时候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天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她哭过了头，想重回满意与满足的安静状态。我开始怀疑自己要对之负责的专横愚蠢行为，喂奶成了惩罚哭泣的方式，从而导致了更多哭泣。又或许这问题有某种更深层的根源，某种困扰妈妈宝宝这个有机体的秘密痼疾。我的乳汁是否因为流经我那不

洁的自我而遭到污染？乳汁是否携带了某种信息？我女儿的哭声是否正在传播我那混乱的阴郁情绪？我怀疑，在我的虚无感与她愈发愤怒和绝望的主张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我知道，这一奇特的功能本是为了让身心进入一种和谐状态，这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我知道其他女性从母乳喂养中收获了满足与幸福。难道我就不能像她们一样吗？

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奶瓶，这些想法很原始，不可更改，满是卡路里。借着这些想法，我想象着自己可以造出一个诱饵，这个第三者将打破妈妈宝宝这一牢不可破的整体。我想象着自己当着这个胖胖的第三者的面偷偷溜了出去。我想象着宝宝和我结盟一起对抗她，这头奶牛，这个奶瓶，与此同时，我们也一起无拘无束地肆意狂欢。这些感受并不值得称赞，但它们也有些解释得通的优点。它们表达了我对于摆脱母亲角色的渴望，若要好好扮演这一角色，我似乎必须伤害被我称为“自我”的某个存在。我记得读到过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大脑里面有至少两种不同人格的人，这些人格在某一日就这样出现，带着自己的想法、记忆和冲动，在人的脑海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主人与房客之间可能出现长期的争论，若是人够多，也可能办派对。我猜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发疯。那么，我发疯了吗？若真是如此，那么这疯病源于孕期。让我神志不清的，实际上是整个生殖行为，并非只是该行为对于母乳喂养的补充说明。可我已准备好去忍受这件怪事，就像人们忍受痛苦那样，并相信女儿出生的那天它便会结束。就像知道自己在做梦，因此明白自己不会永远做梦的梦想家一样，我一直很确定，让我失去自我的那个生理过程也会让我回归自我。我会穿越边界往回走，回到我的故乡；我知道自己肯定这么干过，就像梦想家知道自己肯定醒来了一样。现在开始让我焦虑的是，梦一直做个不停，日复一日地看似愈发接近真实。

我偷偷摸摸地去商店买了奶瓶、餐具消毒剂和罐装配方奶。到家以后，我把这些东西铺开，仿佛准备组装炸弹。宝宝三个月了：很快她将突然停止哭泣，仿佛有人轻轻按下了开关，可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也永远不会知道她之所以会迈出这一步，到底是因为缓慢且庄重的天性起了作用，还是我粗暴干预的结果。夜晚到来时，我准备好了奶瓶。孩子她爸会把奶瓶给她，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这一“背叛行

为”不应该由背叛者自己完成，而应该由一名雇佣的刺客完成。我看着他轻轻将她的嘴巴推向奶嘴。她乖乖咬住了奶嘴，却还是皱了皱鼻子。过了一会儿，她明白了他如此坚持的真正含义。这不像她最初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奇怪的新游戏。她盯着奶瓶看，我发现她有恍然大悟的迹象。她突然摇头晃脑起来，然后眼睛锁定了我的眼睛。她的眼神惊讶且受伤。她意识到我是这一罪行的主使。她哭了起来。我动了起来，想要放弃我的计划，也想安抚她。我的手不自觉地去摸衬衫的纽扣。孩子她爸让我上楼去，于是我上了楼。我坐在床上，含着泪，胃有些痛。几分钟后，我偷偷下楼，在转角处盯着看。宝宝和孩子她爸正沐浴在灯光之中。房间温暖且安静。宝宝正吮着奶瓶。我匆匆跑上了楼，仿佛我刚才目睹了一出不忠行为。

后来我回忆起这件事来，觉得有点像跟恶魔签署了一份协议。随着母乳喂养告一段落，我也适时地回归了正常，可在一段时间内，每当我把女儿抱起来，或将她放到我腿上，她总会转过头看着我空荡荡的乳房，我会因为她的失落感到一阵痛苦。我内疚于自己过早地让她接受了人生苦短、所爱消逝、不复回归的永恒教义的训导。就我自己而言，那个分泌着乳汁的肥胖幽灵，那个我如此惧怕的母亲形象已经离去，正好由我取而代之。我不像她，没她丰满，没她有占有欲，也没她那样必不可少。在我的双乳背后，我看到了怀疑、犹豫以及不可靠。几周时间内，我注意到宝宝越来越亲近爸爸，如同一株植物不断接近新的光源。我失掉了某种权威，但也许另一个人会取代这一位置。我已背叛了母亲的王座，不过我乐于认为自己将进化出属于自己的总统似的作风。在某些下午，我有时会上床同她一起小睡一会儿，她会躺在我身边吮着她的奶瓶，她的眼睛入迷地盯着我的身体看。最初的困意向我们袭来，让人感到温暖。我能感到我们正一起下落，通过了我们的意识。尽管我已进入了睡眠状态，但我感觉到她也是如此。我感觉到她已入睡，就像我还是小孩时，曾感觉到雪落在窗外一样。后来，我睁开眼，发现她头靠在我肚子上睡着了，她身体蜷曲，像归家似的靠在我身旁；我非常安静地躺着，知道如果动一下她就会醒过来。

额外的狐狸

就像绝大多数话题都有相关书籍一样，也有一些书谈论为母之道。你若想要找这些书，必须跑遍几乎整个图书世界，其中包括由小说与诗歌构成的文明世界以及由字典与课本构成的郊区，一直走到谈论如何修摩托车或种秋海棠的旧书和谈论如何自行填报税表的书籍处。育儿手册位于人类体验纪实类书籍的最远端，正好排在减肥类书籍之后，占星术类书籍之前。

我意识到，专门研究任一东西，并因此瓦解你的研究对象与生俱来的信心是有可能的。我读的越多，我女儿便离我越远，并变成某种我必须重新学习使用方法的物体；它是否与像她一样的其他物体相一致？这个问题几乎不会让人感到焦虑。大多数此类书籍的开头都像科幻小说，有一个世界末日似的场景，在其中，我们熟知的世界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必须接受教育，学习其中的基本原理。消逝的世界归母亲所有。它是她童年的世界，她的母亲则是这个世界最后一位活着的居民。在这些日子里，故事继续，母亲在她们的母亲的指导下做事。世界末日—具体原因未知，但普遍认为发生在最近—结束了那一切。如同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那样，知识的世界被毁于一旦。控制链已被打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母亲对女儿悄悄说了些什么，这些年来她们流传下来哪些秘密。我们想，大概是些把宝宝留在花园尽头的婴儿车里之类的事。但重要的是，这是个全新—在很多方面也更好—的世界。你是这世界的首位母亲。这是这世界的第一本书。

我母亲没告诉我太多做妈妈的道理，这是事实。她说她记不得了。你们全都没哭过，她含糊地说，又补充说她也许搞错了。她似乎也听说过这个世界末日。如今你们所有人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了，她说。她给我带了一本育儿手册，封面上有一张图，画的是一个丑陋的宝宝吐着舌头。每次我看到那张图就会想起没生孩子时自己对孩子的

看法，以及他们对我的看法。回忆让人震惊，仿佛不经意间朝镜子里瞥了一眼。手册里的文字理直气壮，稍显盛气凌人。其中满是清单与重点，还有感叹号，貌似幽默：它们在我面前旋转，像眉毛一样愚蠢，像政客的笑话一样尴尬。它们欢乐的风格无法掩盖育儿专家的专制欲。作者规定了一种强制执行、不分青红皂白，也许还是终身制的母乳喂养制度。书中还有女性裸着身子，在床上、在浴室、跟一群人以及独自喂奶的图片。其中一张图片里的那位女子在用母乳喂养一个至少6岁大的女孩。两人衣着相同，都有一头秀丽的金色长发。该书声称，用母乳喂养的孩子不仅比用其他方式喂养的孩子更健康长寿，更不容易得病，也许还更聪明。我把最后一项声明读了好几次，还是无法理解它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我本人就并非母乳喂养，这也许能解释这个问题。狂热的火焰留给了那些经不起诱惑、想用奶瓶犯罪的人。书中有一些清单和助记符号，它们都带有类似“母乳喂养好处”以及“母乳喂养的问题”之类的标题，像是女学生的涂鸦。我发现，母乳喂养若出现了问题几乎总是母亲的错。

1.宝宝吃完奶会哭。可能将宝宝放在了胸前错误的位置。喂奶前，请检查你是否将宝宝固定在合适的位置。回顾一下过去24小时内你吃过或喝过的一切，试着找出其中可能让宝宝不高兴的东西。

2.宝宝吃得太频繁。也许你过早将宝宝抱离胸前。每次都应该由她来决定何时停止喂奶，而不是你。

3.喂奶太久。你为什么要催宝宝呢？也许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日程表，想想自己为何急着结束宝宝这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我觉得自己被人讨厌，受人谴责。我觉得招致了这些乳房下垂的裸体女子的反感。关于人工喂养的那个章节，基调很阴郁，营造出一种斥责的气氛，像是某个女校长的书房。这本书毫无诚意地号称支持

所有母亲，而非只支持那些用母乳喂养宝宝的母亲。如果你真觉得自己必须人工喂养，那么至少得确定你的宝宝别错过太多。喂奶时请紧紧抱着宝宝，也许你可以将她紧贴在你裸露的那个乳房上，或使用饲管。饲管是一个小管子，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乳房上，宝宝可以用它吸奶。饲管对于领养宝宝和因为错失母乳喂养的经历而感到悲伤的母亲极其有用。诡异的是，我发现自己在那一刻真的在考虑使用饲管，可我还没回过神，我们已经进入了“重回工作岗位”的章节。突然间，似乎所有人都回到了办公室，除我以外。母乳喂养得到了充分重视。你要做的，就是带着吸奶器去工作，在宝宝通常吃奶的时间，你得把乳房里的奶挤出来。我意识到，在工作的时间吸奶并不仅是因为念旧。一天结束之际，你把挤出来的奶带回家，要么把它冻起来，要么把它储存在冰箱里。第二天你上班的时候，别人会把奶给宝宝喝。对我来说，这简直太麻烦了。当我仍旧穿着睡袍试图理清头绪时，他们却卷土重来，要收取最后一个章节“再生一个宝宝”的费用。

一位朋友给了我另一本书，那本书很旧，似乎可以追溯到天启之前。该书未提及母乳喂养。它建议在生孩子前先试用消毒设备，生好孩子后立马化上全套妆。作者讲述了她生完头胎（她有四个孩子，全都是高大健壮的男孩）后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她和丈夫在厨房竭尽全力忙了整整40分钟，才为饥饿的宝宝准备好他的第一瓶奶！这本书里没有裸体女人的图片。取而代之的是宝宝的图片，宝宝非常干净，用洁白的毛巾布裹着，仿佛送子鸟刚把他们送过来。书中详述了洗澡、消毒、擦洗和换尿布的方式。作者带我们参观了一尘不染的婴儿房。她还列出了育儿设备，并对其进行说明。宝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他洁白宽敞的摇篮里，就像云朵或小盒子里的某个东西，宝宝的母亲在旁边的房间里把上过浆的尿布叠成不同的形状。这些宝宝不哭，又或许你离育儿室太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罪恶、凌乱且温暖的成人床铺及其情欲与秘密被老练地拒之门外。作者轻快地建议我们，若想保住婚姻，千万别让宝宝上大人的床；否则我们就得拼了老命把他弄下床了！夜间喂奶似乎只发生在育儿室，像不忠行为那样偷偷摸摸，丈夫们则出人意料地继续睡着，不过很快这种不忠便会杜绝。这本书的结

尾来得很突然，出现了一系列悬念与未解的谜团：宝宝会被抱出摇篮吗？还是说他会一直安静地待在摇篮里，直到有一天起身去上学？妈妈在夜晚喂奶时也化着一整套妆吗？她的老公—最后一次见到他还是在头一天，那时他正在厨房里卖力工作—到底是死了，还是在睡觉？

我母亲又给了我一本书，这次的效果更好。她把斯波克医生的《育儿经》（*Baby and Child Care*）给了我。斯波克医生专注于疹子这个问题。可事实上，他就像个信息库一样，涉猎绝大多数话题，并自封为传教士类的人物，去帮助沼泽、矿山和石油钻井平台上的常住居民，这些人颇为神秘地超出了医疗界的范围。他的文字里充满危险与紧急情况："若你没法看医生""若你处于必须消毒的处境""若你的产奶量正迅速减少，你又没办法找医生、保健护士或其他医疗人士"。斯波克热情地倡导医生乃家庭与全面核危机之间的唯一事物。斯波克笔下的医生们只想了解你的孩子的体温是否接近了三位数[20]，她是否不愿吃晚餐，是否长了大量的斑点—斑点的直径约三毫米，三天后突起并结了干草色的痂。斯波克希望医生与家长能一道告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环境灾害，要知道，社会变革只能始于家中，这些家庭的父母反抗传统的性别角色，倡导家庭平等，他们不让自己的孩子玩玩具枪或看暴力电影，他们说明这么做的原因，他们为人仁慈且为他人树立榜样；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辨认脓疱疹，一个红色的感染区域，三天后会起水疱，并结出干草色的痂，且极易传染。尽管饱受发烧、肠胃炎和慢性皮肤赘疣的折磨，尽管笼罩在全球毁灭的阴影之下，但斯波克笔下的宝宝都很快乐。他们喜欢吃奶，时机成熟时他们也喜欢芜菁。他们需要比正常情况更多的新鲜空气。他们不喜欢总被他们怀着内疚工作的父母打扰，不论是充满着被压抑的怒火的父亲，还是希望他们比邻居家宝宝更早走路的母亲。在焦虑专横的心里，他们想知道谁是老大，因为软弱驱使他们去奴役和主宰，去愚弄他们的父母。有些父母拿着装有孩子不吃的食物的碗，追着孩子到处走；有些父母充当了学步的小孩的人体齐默助行架[21]；有些父母像玩偶盒[22]一样，整个晚上一会儿上床，一会儿下床，要么取奶，要么摇晃或安慰着宝宝；这些斯波克都见过。宝宝天性精力充沛且叛逆，这一点再正常不过：重要的是，你得把这种天性塑造成体面和正直的性

格，文明的性格。

我想象着一天临到结束时，斯波克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黑色的皮椅上，外面的世界则天色渐暗。他看起来有些像伏尔甘[23]。他摘掉眼镜，揉揉鼻子。他脑子里充满了克制，他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地好奇为何自己可以既被接受又被误解，既有影响力又无能为力。他不带成见，看问题很全面，可似乎还是无法完全理解这种生殖文明传达的信息。在他的脑海中，他的理念完美、合理且完整，但在纸面上，他被误解为既宽容又压抑，马上成了逃兵役的一代人的创造者和某种神秘的顶级儿科专家，是医治无助的婴孩在夜间痛苦症状的权威。他们都生他的气，但他除了尽力帮忙，还做过些什么呢？没人还对医学界怀有一丝敬意，这才是问题所在；全都毁了，炸弹、枪支和燃油机车比以往都要多，被宠坏的宝宝也变多了……

我自己去了书店，买了佩内洛普·利奇[24]的《你的宝宝和孩子》（*Your Baby and Child*）。如今我不仅寻找答案，也在寻找一种描述我女儿的世界的叙事，并再次向我解释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介入似乎把她弄糊涂了；她变得更为复杂，少了一些条理，于是我像个困惑的情人，寻找着某种可以重新组织我们、让我们回归早先那种纯洁状态的东西。利奇女士似乎正是我所寻找的这个人。她的行文风格很聪明，也充满同情。她如同教师一样，对弗洛伊德和温尼科特，以及依恋[25]理论和育儿趋势的理解中规中矩。像玛丽·波宾丝[26]或某个童话人物那样，她站在孩子这一边。宝宝也是人啊，她一边清楚地声明，一边驱散面前的人。要是人们想让你一直睡觉却从不跟你讲话，你会作何感想？要是他们希望你整晚独自一人待在黑暗中，你会作何感想？要是你哭了、再也不想玩了，这时他们却生气了，还一直抱怨着想给自己留点时间，你又会作何感想？可怜的宝宝！佩内洛普·利奇为痛苦开出的药方是快乐：她说，让宝宝更快乐就是让自己更快乐。跟宝宝说说话！让她看看花，看看太阳，看看天空！别让她老待在婴儿护栏里，你自己也得进去啊！她通过案例分析了夜醒的烦心之处。艾莉森的宝宝在凌晨2点醒来，此时艾莉森大声叹息，愤怒地把自己的脑袋埋在了枕头下面。看起来，作为母亲的艾莉森就如同西部片中戴黑帽子的人[27]，是自作自受。她的宝宝哭得越来越厉害，等到艾

莉森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起床喂宝宝的时候，宝宝的心情很差，吃奶时呛到了自己，因此再也无法入睡。与之相反，比拉的宝宝在凌晨2点斯文地召唤她的时候，她却轻轻地从床上跃起。比拉把宝宝从婴儿床上抱了起来，这时宝宝笑了。宝宝感激地吃着奶，很快便重新睡着。艾莉森耗时多久？一个半小时，她一开始甚至都不想起床。比拉呢？二十分钟。嘿！

我试着跟我女儿说话。我给她唱歌，漫无边际地唱着谱了曲的叙事诗，她是这些诗的中心人物。她开心地扭动着，并发出各种声响作为回应。有一天她笑了起来，笑声很特别，从她口中飞了出来，就像一只鸽子从魔术师的帽子里变了出来。我们一起努力再次制造那种笑声，每次都会在无意中发现唤起这种笑声的不同方法。宝宝被我们从婴儿车里移到了一把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的她靠着一堆靠垫，就像个坏脾气的君主；我们这些朝臣则努力取悦她。她在夜里醒得愈发频繁。白天，我在宝宝面前如同女招待一般，感到了社交焦虑给我带来的压力。世界变成了她的剧院，我们等着她来评论。她睡着时，我又读起那些书，直到能把其中一些段落背下来；由于我女儿一直在变而这些书的内容不变，所以它们从未打动过我，它们一直与现实脱节。如同功课一般，它们的内容一点也不生动活泼，所以学习时我只能死记硬背，靠作弊来应付某些只有我会担心和害怕的测验。

有人给我女儿买了一本书，是用布做的，其中一部分像玩具；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她眼前一亮。我向她展示书中的图片。她明显着了迷。我又给她买了一些书。如今她能坐直身子了，这些书堆成了堆，把她围了起来。她独自仔细查看着那些书，没有一点怨言，一看就是好几小时—这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与此同时，我则在与她相邻的一把椅子上读着育儿手册。最终，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安排有些问题。我让她坐在我腿上，我们一起看她的书；我指给她看羊、鸭子和奶牛。我意识到我脑子里全是各种各样的准则，来自斯波克、利奇以及他们的同行那令人发狂的警句。他们的口头禅困扰着我，侵入了我的语言。如今我像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一样尖声发出了动物似的噪音。不久后，文字开始出现在我女儿的书中，而一种新的语言病毒和这些文字一道困扰起我来。奇怪的是，我并不是太在意这种病毒。它空洞、奇

异且让人联想到疯狂的行为。埃尔默在空中飞。我必须制止这种话在不恰当的时间从我嘴里冒出来。桌子下面有什么，斯波特？她开始喜欢上一本对她来说太过古旧的书，书的作者是苏斯博士[28]。这是本关于字母表的书。

O的用处很大。

你说下面这个句子时会用到它，

Oscar’s only ostrich oiled an orange owl today.（奥斯卡唯一的鸵鸟在今天用油浸透了一只橙色猫头鹰。）

这段话配了一张图，里面有一只艳丽的鸵鸟，它正举着一个油壶，油壶下面是一只橙色猫头鹰的头顶。我已经分不清斯波克医生与苏斯博士了。在我的想象中，两人互换了身份，这几行诗让我突然心生同情，如同头脑混乱的敏感之人在胡言乱语，又像来自边缘的明信片[29]。

如果你叫尼克茜·诺克斯（Nixie Knox），X的用处便很大。

它迟早会派上用场

用在拼“axe”（斧子）和“extra fox”（额外的狐狸）上。

额外的狐狸穿了一件漂亮的黄夹克。它常在我梦里出现，在我醒着的时候又华丽地一闪而过。

我开始飞快地重新体验自己在学习语言与理解故事方面的成长。

给女儿读故事让我重新对表达这件事充满了渴望。仿佛许久之后再度造访过去常去的地方，我读了之前读过的书，那些我爱的书。重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发现它们有了些变化：它们包含了我此后学习的一切。我开始发现它们无处不在，在我自认为熟悉的书页中也能找到它们：关于将来的预言，我现在所站之处的照片—可如今我再来看这些照片，却认不出来了。我很好奇自己怎么可能读了这么多却学得这么少。我盯着这些文字，好像它们是坛坛罐罐，又好像它们是之前某个文明所储藏、而今存放在博物馆的玻璃牢笼里的黄金。必须经历才能懂得，难道这是真的？我一直否认这一说法，可是在做母亲这件事上，至少对我来说，确实是这么回事。我犹如读死者来信一样阅读，这些信都是写给我的，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拆开它们。仿佛通过阅读，我正忆起如烟的往事，并用我自己乐意的方式、完美且毫无误解地把过去重来一遍。

“一开始，”D.H.劳伦斯在《虹》中写道，

> 这婴孩就在年轻的父亲心里激起了一种他几乎不敢承认的深刻且强烈的情感；它如此强烈，源于他的阴暗面。听到孩子哭的时候，他心里某个深不可测的幽暗处便荡起回声，让他感到一阵恐慌。难道他非得知道自己心里有这么一个凶险的幽暗处吗？
>
> 他抱着婴儿，来回踱步，为自己血肉的哭声所困扰。这可是他的亲生骨肉在哭啊！他的灵魂起来反抗着这突然从他身上、从他内心幽暗处爆发出来的声音。
>
> 有时，在夜色正浓、他昏昏欲睡之际，这孩子会哭个不停。半梦半醒的他伸手盖在孩子脸上，想止住她的哭声。可有什么东西让他动不了手：孩子的哭声连续不断，无法忍受；这种毫无人性的特质阻止了他。哭声如此无情，毫无原因和目的。可他直接与之产生了共鸣，他的灵魂回应了这种疯狂。这哭声让他满是恐

惧，几乎让他发狂……

他和孩子熟悉起来，也知道该如何举起她那小小的身体并使之保持平衡。这孩子有一颗漂亮的圆脑袋，这让他动情不已。为了保护这颗精巧完美的圆脑袋，他会奋战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

他学着去了解孩子的小手小脚，她那奇特且视而不见的金黄色眼睛，以及她的嘴巴，她一张嘴要么想哭，要么想吃奶，或是展示她那奇特的没有牙齿的笑容。他几乎都谅解了她总是晃来晃去的双腿，最初这让他反感。双腿以略显奇怪的方式踢来踢去，自有其软柔之处。

一天晚上，突然间，他看见这个小东西光着身子在妈妈的大腿上滚着；他有些不适，这小东西如此无助，脆弱且格格不入。在这个表面坚硬、凹凸不平的世界上，这小东西赤身裸体，身体每一处都易受伤害。然而她依旧快乐无忧。她盲目可怕的哭声里，没有那种由于自身的脆弱和裸露而产生的盲目且遥远的恐惧，那是一种彻底被抛弃，全身都无助所产生的恐惧。他不忍心听她哭。他心里很紧张，提防着全宇宙……

她虽拥有独立的生命，但依旧是他的孩子。他的血肉同她产生共鸣。他满怀激情，哈哈大笑地把孩子揽在怀中。这孩子也认出了他。

地狱厨房

一天，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两篇文章，均由男士所写。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最近刚做了爸爸。他的文章像葬礼上的道别辞。文章的主题为自由之死，自由过早遭到谋杀，凶手是为人父母这种状态。从形式上来看，文章有一种奇妙的诗意：它向读者简要地介绍了那男人对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的爱—啊，宝宝，你有着珍珠般的四肢，你有着珠宝般明亮的双眼！等等—文章接着很快写到—可为时已晚，为时已晚—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抚养这块宝石，这给他周末的纽约之旅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要知道，他习惯在每年这个时候进行圣诞采购。新生活像书信炸弹[30]一样到来，信里只有一则消息：好日子到头了。在某个段落中，他想象着自己试图和妻子与孩子一起去美国，这段旅途当然很糟心。他们晚上的时候不能外出，去商店与博物馆又太困难，在飞机上度过数小时纯粹是煎熬。他悲痛地宣称，我就不该自讨苦吃去纽约。他意识到他以后还得这样过18年。纽约的圣诞彩灯熠熠生辉。商店因为各式珍宝而闪闪发光，散发出一股幽香，这味道来自过去，来自短暂而无法挽回的快乐。他的愤怒、怀疑、遭受不公正感显而易见。就像是他少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又像是他被人指控犯了莫须有的罪名。我想象着他和他的宝宝一起坐在时髦的豪华公寓里，宝宝像锁链一样环绕在他的脚踝处，他的四周全是以前买的贵重物品，一滴悔恨的泪水从他的面颊上流了下来。人们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如果可能的话，他会马上把宝宝还回去。结束了！他在最后的令人绝望的两行诗中咆哮道。结束了。你的青春，你的魅力，你的罗曼司在何方？纽约在何方？

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有三个孩子，所以他的观点更超然，也更冷静。他很诙谐，但这种诙谐有些枯燥。他冷酷无情：他出拳比别人要慢，但一旦出拳，却比别人更不留情面。他正在谈论周末。他依依不舍地描述着在周六睡懒觉。半睡半醒，做爱，在床上吃早餐。终于起床喝咖啡，然后翻阅报纸。好好洗个澡。然后得做很多选择：是去购

物，好好散个步，还是晚点吃午餐？下午去看电影，还是去美术馆？或者多睡一会儿？剪头发，或是去健身房？读小说。和朋友吃晚餐，去听歌剧，去参加派对。周日早上，跟周六差不多。他很想知道没有孩子的人能否认识到对于有孩子的人而言，周末到底是什么样子。事实是，他们没有周末。对于为人父母者而言，外界所谓的“周末”实际上意味着去第九层地狱[31]来一场往返旅行。周末就是孩子不去上学的时候。周末就是帮忙看孩子的人以及保姆放假的时候。某个周六早上的6点或7点钟，你被爬上你的床的人吵醒。他们在你耳旁哭闹或大喊大叫。他们踢你的肚子，踢你的脸。很快你便忙于对付屎—实在是无词可换—屎、尿和呕吐，忙着冰冻母乳。休想给你妻子一个拥抱。你得起床去对付屎。楼下的厨房，玉米片撒了一地，孩子流着泪，电视嗡嗡响，如同暴风雨一样肆虐。耳边的叫声还没停。外面正下着雨。过了一段时间，你和他们似乎都受够了—该吃饭了吧，该小睡一会儿了吧，该睡觉了吧？你看了看表—才7：15。像其他人一样，你整周都在工作。像其他人一样，你心里也挺难受：也许你昨晚在外面，像往常一样努力装作自己很正常。这个世界逼你像隐瞒罪恶的秘密似的隐瞒这些周六的早晨。到了8：45，形势变得明朗起来，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了。问题在于，你到底是努力直面家中的情形，并且希望自己的孩子突然间变得像小说里那些长时间地玩着不需要你参与的虚拟游戏，还是马上放弃，钻进车里？你钻进了车里。店铺之类的都还没开门，于是你开车到处转悠，转了一圈又一圈，如同正在搜寻猎物的捕猎者。天下着雨。你播放了一盘磁带，一盘孩子听的磁带，里面全是叮当作响的音乐和动物的叫声。对你来说，这样的磁带可谓地狱里的配乐。孩子们在后排打闹。堵车的时候，他们哭了起来。某个孩子病了。某个孩子尿了裤子。你在后视镜里瞥见了自己：你没刮胡子，没梳头。你散发着臭味，脏兮兮的，如同满水池的未洗餐具。你和你妻子身处战争之中，努力驾驶着一辆坦克在枪林弹雨中前行。你们对彼此下简单粗暴的命令，两人都侧着脸。你俩中的一个偶尔会失控而狂叫起来，这种情况发生时，另一个人则无动于衷。他或她早已熟视无睹。过去的五年里，你俩从未睡过整觉。你模糊地觉得，事情之所以如此，肯定有其原因。别人会说路是你自己选的，也是你自己走的；可是，如果这是真的，你肯定不记得自己选过或走过这条路。

你就像个含冤入狱的人，也像卡夫卡小说中的某个人物，面对惩罚时却不知自己何罪之有。

我想到了人们和他们的孩子共度的日子，它们已过去很久，曾危机四伏，随后便逝去了，如同世界另一端发生灾难的那些日子。这些日子似乎没有引起国际上的重视与关注，而很明显，它们值得被重视与关注。甚至很难给那些把自己的困境公之于众的父母提供建议。虽然饱受困扰，但他们通常不会表露出相反的愿望；从他们的态度来看—如果有的话—他们稍微有些不齿于过一帆风顺的日子。他们也会抱怨，然而若有人提出永久地让他们免于照顾自己孩子之苦，他们几乎肯定会拒绝这个提议：他们吐露着自己的沮丧，却把他们的爱当成秘密似的紧紧守护着。如此这般的家庭生活实在让我很费解。我无法苟同他们所描绘的地狱式的生活。我不同意并不是因为我不承认它的存在，而是因为做父母的确很难，难到让人持续震惊的地步，我觉得有必要去深挖这种难处的意义及其原因。最糟糕的时候，做父母的确像是下地狱一样，因为所受的折磨永无止境，也因为做父母要履行的职责与子女的意愿正好相反，还因为这样一场闹剧发生时，自由的天堂也尽收眼底。人们热切地渴望着进入这个天堂，为人父母者通常会自愿被驱逐出去。区别在于美德的潜在价值，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会更好地理解这群人，他们会让你相信他们的宝宝不会哭，他们的宝宝只会给他们带来快乐，他们一家子围坐在一起读小说，安静地讨论环境问题，或是忙于玩建构游戏[32]：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明白这一局面是自己出于自尊或诚实而造成的，是因为莫名其妙地忠于自己而造成的，所以他们想充分利用这一局面。

话说回来，令人惊讶的是，反对的声音来自男性。他们的愤怒让人感到新鲜，这是来自新手或新人的反抗。他们的反对意见有些让人蒙羞，初入育儿世界的他们满怀革命者似的热情，对所见之事感到恶心与绝望；他们的抗议，他们为改革而发出的呼声激起了无言的批评，来自长期生活在育儿世界却不发出反对声音的那些人：无期徒刑犯，常住居民，女性。的确，人们通常不会听到某个女人带着怀疑抱怨她的宝宝似乎不会离开，甚至连离开一晚上、让她睡一会儿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她不会去这么想，不会总这么想。我常

觉得，人们若知道有孩子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不会要孩子了；我想知道，作为一种性别，我们体内是否存在某种进化论似的停止机制，去遏制我们表达的力量以及我们描绘这一话题的真相的能力。没有孩子的人似乎不会对那些有孩子的人必须谈论的话题特别感兴趣：他们无忧无虑地做了父母，仿佛他们是第一对父母，如同堕落之前的亚当与夏娃一样天真。看样子，男性的大声反对正要揭穿我们的伪装。

据说，女性在讨论如何做母亲的方法上发现了分娩上的种族隔离政策，没有子女的女性朋友鼓励她们谈论如何做母亲时，她们会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冷漠，可一旦回到同为人母者的聚会的安全环境中去，她们又会自信爆棚，令人感到不快。我好几次都观察到初为人母者的脸上露出有礼貌且受惊的表情，仿佛她们刚刚打开了一份不合适的圣诞礼物：她们明显没有做好准备。夜间喂奶这种小事肯定不会对外公开。我女儿在她来到世上的第一个夜晚醒来并哭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冒犯，丝毫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我很晚才意识到有“喂奶”这种说法，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把什么东西放进她的嘴里，也许就能成功让她停止哭泣。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在未来的一年里必须夜以继日地每隔三小时就得喂一次奶。

事实上，没有言语可以表达从女人或男人变为母亲或父亲所经历的变化有多么巨大；由于缺乏明确声明，这一话题充斥着妄想与幻象、误解、夸张与低估，从人类会话的总体趋势中分离出来，于是为人父母这件事并非一种转型，而是一种叛逃，一种政治行为。它开始时以婴儿为目标，如同希区柯克电影中未爆炸的炸弹，单是它那残忍的存在，马上就能带来戏剧性，并让那些做了父母的人的世界朝着做父母的方向发展。为人父母很像是一种社会实验，某种科学家会做的事：把一个宝宝和两个成人留在一个房间里，然后观察会发生些什么。宝宝哭了。哭声大而急，类似于火警报警器发出的声音。女人抱起宝宝。哭声停了下来。她试图放下宝宝，这时它又哭了。她长时间地抱着它。男人有些不耐烦了，女人试着放下它，可它哭了。女人累了，这时她把宝宝给了男人。宝宝哭了。男人抱着宝宝走来走去，宝宝不哭了。男人累了。男人和女人都坐了下来，焦虑地看着宝宝。他

们太累了，说不出话来，可至少他们止住了宝宝的哭声。他们觉得仿佛自己取得了些许成就。宝宝又哭起来了。它哭得太多了，他们讨厌它。每次它不哭时，他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很喜欢这感觉。这种情况不断发生，可实验表明，越来越难找到止住婴儿哭声的方法。很快，他们费尽心思，耗尽所有气力才能搞定这件事。他们不能休息，不能借助外界的力量。这项实验日夜不停地进行。这对夫妇必须安排好睡觉的次序与时间，这是导致他们争论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人外出，另一个人便觉得不公平，甚至连外出工作都被认为是简单且吸引人的选项。实验可以做得更大，方法是引入更多宝宝，以及改变实验条件。后者需用到下列全部或任意因素：宝宝的发育进程，包括哭泣、滚下桌子、爬出窗、咳嗽、摔倒和其他危险且引人注目的行为，这些行为需要父母费心全天候关注；让房间出现灰尘，把它弄得一团糟，出现一些家里常见的脏乱差现象，人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根除这些问题；工作拍档的谈话里出现了没有孩子且有魅力的异性；外界的成员会不定期打来让人感到焦虑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里讨论自己的社交生活，提议先过来待上半小时，再去参加明显在你家隔壁举办的一个派对，他们还会发表一些你不再明白的议论，例如“我感冒了，在床上待了三天”，显然不会说“要不我来抱一会儿宝宝，这样你就能休息一会儿了”。

不论我多么努力地去保持自我，保持身材，在这场考验的范围内，这件事就好像试图让某个打了麻醉药而睡着的病人保持清醒。我相信我的意志力可以让我一直浮在水面上，不被淹没；可意识本身会被生殖过程革职、暗中破坏。由于有了孩子，我创造了一个敌对意识，因为我的责任感，它轻易控制了我，并让我越来越弱，只剩了一点点。我女儿很快取代了我的位置，成了我首要关心的对象。我变成了一项未完成的任务，一个我似乎拨不出去的电话，一份我没空支付的账单。如同无人看管的花园一样，我的生活有了一种火热气氛。奇怪的是，这种忽视在最为肤浅处最为折磨我：随着宝宝的出生，虚荣的一生也幻灭了。我有打扮自己的习惯，当它消失，我才开始珍视起它来，就像突然不再表达爱意一样：这个习惯证明我在乎过，如果没了它，私底下我会觉得自己只能无奈地顺从，这让我感到悲哀，仿佛

我生命中故作乐观的一面被拆穿了。我有时回想起那段不断要操心的日子—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孩子，一个焦虑的少女，一个试图变得时尚的女子，会惊讶地发现，它本可能猛然画上句号，因为它是一种温和的文明，一座由我的日常生活建立的城市。这段历史的最后一个章节—孕期—与其他章节一样生动：没有迹象表明它会结束，也没有线索表明事情会如何变化。仿佛某种灾难已经出现，已将我消灭，例如地震、流星坠落等。我看着自己的旧照片，发现它们看起来像是庞贝的铸造模具，像是那些被冻结在时间中微不足道的死者。我常去我身体的那片废墟，它是个悲哀且不安的灵魂；我觉得自己暴露在外，饱受日晒雨淋，处在他人监视之下。我知道对我来说，未来确实存在，可由于计划出了问题，管理上积压了一些待办事务，才因此止步不前。不管怎样，我对未来也没抱太大希望。我女儿那活泼的小小身躯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它像一座新房，又像一个新项目。若我能抽空远行、回归自我，回到那片废墟，在中世纪的寒冬袭来之前用力地在上面刷上一层涂料，就很幸运了。

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力气才能一直让我的女儿活得纯粹且闪亮。一开始，我同这种生活的关系类似我同肾脏的关系。我得处理它的排泄物。每三小时，我将奶倒入女儿的嘴里。它经过一系列管道后再次排出。我把它处理掉。每24小时，我将她浸入水中给她洗澡。我给她换衣服。若她在室内待了一段时间，我会把她带到室外。若她在室外待了一段时间，我又把她带回室内。她睡觉时我把她放下。她醒来时我把她抱起来。她哭闹时我抱着她走来走去，直到她止住哭声。我给她添衣服，又脱衣服。我用爱灌溉着她，时而担心给她过多的爱，时而又担心给她的爱不够。照料她就像是负责天气，又像是负责种草：我同时间的特殊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这些工作还不算繁重，但它们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上的农奴制或奴隶制，因为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这种变化让人感到卑微。同时，它也象征着我对于昔日自由的思索，以及对逃避责任的思索。做母亲的日常工作磨损了我的皮肤，可我偶尔也会在其中发现某种可预见的完整，某种别样的自由：源于复杂性与选择，也源于由无须底稿的时间构成的纸，我曾在上面记录我的生活，并肩负着身为这些文字的作者的责任。我无法逃避的是，处在最

后这种感情之中的我轻易告别了自己的性别。做母亲时的状态证实了我天生害怕有所作为。它是一种降职，一种撤职，一次放弃的机会。我坐在历史这把奢华的椅子上，饶有兴味地看着我对这种降职做出反应，这让我有种历经沧桑的感觉。我会优雅且感激地让步，同时归还我的生活，就像它是借来的一样吗？我会奋起抗争吗？仿佛你从城市搬回你出生的那座小镇，还没来得及对沉闷的小镇生活表示惊讶，就有人劝你记住还有别人住在这里，一直都住在这里。男人们拜访时，不会管这些条条框框似的人情世故。可是，人们之所以不承认做母亲很难，并不仅仅是因为禁止抱怨：如同所有的爱，这份爱的核心充满了矛盾，这一点痛苦擦亮了快乐的珍珠；与其他的爱不同，这种矛盾没有解决的可能。

宝宝实际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这与旅行者需要带着帆布大背包没什么不同。地铁里，人们看到我们行动不便的身躯和狼狈不堪的样子，发出了啧啧声和叹气声，然后他们在车站一哄而散，留下我和宝宝在站台与背带和满地的垃圾搏斗。我们猛地撞上餐店里的桌子，把商店展架上的易碎品撞了下来，我们呆头呆脑、笨手笨脚，可奇怪的是，我们居然被忽视了。因为我就是宝宝的家，所以我没法把她留在哪里；很快，我开始观察起那些四处走动、轻松自由且毫无负担的人来，仿佛他们属于另一个物种。我偶尔也会不带她出门，这时我觉得自己毫无遮掩，像是没了外壳。不论在几点钟，什么季节，或什么地点，宝宝都喋喋不休地提着要求；由于她的偏好与成人不同，我们逍遥法外的时候，无聊的生活变得混乱，平添了一种别样的滋味。她在安静的地方不由自主地尖叫，在我无法喂她的地方变得饥肠辘辘，在干净的地方排泄：仿佛我自己回到了某种不体面的原始状态，在高档商店里呕吐，在公交上大哭，而别人则保持冷漠，毫无恻隐之心。我女儿在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发布未经处理的人类需求：一开始我也在那里—最近我刚离开，并努力想要控制和压制她，可很快，像为数众多的妈妈那样，我发现文明中也有一些不人道的东西，一些无用且致命的东西。我讨厌它那矫揉造作且脆弱的廉价小饰品，讨厌它的贪婪，也讨厌它缺乏怜悯。我慢慢有了同情心：不过，这到底是一时用情，是我对女儿的爱的附加物，还是一种本质上的变化呢？我还真说不清

楚。

我被困在一间房里，这一变化象征着投降，象征着战败。我女儿变得愈发复杂，也愈发危险，我对她愈发尊重，其他人则愈发不屑。保护她与成人世界不受彼此伤害的前景变得暗淡且缺乏吸引力。我再也不能拖着她走来走去。她现在会爬了，也有了自己的好恶。她从帆布背包变成了逃出动物园的动物。在容不下她的地方，我得做她的驯兽师。我待在家里陪她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开始只有楼梯存在潜在的危险，后来抽屉、书柜和咖啡桌也加入了此列，我们因此把自己逼入并困在了一个安全空间：厨房。我女儿在厨房里曲折行进，因为受困而感到愤怒。正值冬天，花园太湿冷，不适合她在那里爬。她用拳头不断敲打着门，不顾一切地想要出逃。地板上满是她的玩具，足以将脚踝淹没。如同蜗牛的爬行轨，墙上与地表上出现了一些由无法辨认的物质勾勒出的路径。房间有了一层皮肤，一个由奶粉构成的外壳，食物的残渣成了这层外壳的一部分，如同某种湿疹。厨房被我女儿所能接触到的每一种物质授粉：混乱的局面蔓延开来，如同自然的力量那样无法阻挡。我的衣服因为沾上了这些东西而变得脏兮兮的，我在自己的头发和鞋子上发现了块状物。我清洗、冲刷以及用力擦洗，可一股因无序状态而引起的强劲暗流似乎控制了这个温度过高的小小空间，混乱就在眼前，不断侵蚀着我们的领地。对我们来说，时间过得很缓慢。我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一边等她的日子过去，一边努力达到生活的基本要求—对她来说，就是继续存在于时间里。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我的确不自由：这厨房是一间小牢房，一个没有可能性的地方。我已放弃了我曾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会员资格。有时我会听音乐或读书，如同一束光从外面射了进来，它们明亮且痛苦，让我眯起了眼睛。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在街上看见一位年轻女子，她美丽且无忧无虑，此时，我为某种失去的遮遮掩掩的自我感到一阵哀痛，这又让我感到揪心。我低头，看见女儿正在她的手推车里睡觉，她睫毛的阴影在她白皙的皮肤上形成了道道弧线，接着，一阵爱的逆风向我吹来。一段时间内我就是这副模样，被这阵风吹来吹去，撞来撞去，如同一个疯狂且狂热的测量仪正在努力找到方向。

某段时期内，我对做母亲这份工作的喜爱堪比我对于普通档案管

理员的工作的喜爱，同时，爱与痛让我陷入一场拉锯战，外面的世界则闪烁着往昔以及遥不可及之物的光芒，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我重读了柯勒律治的诗歌《午夜霜寒》[33]：

寒霜施展着神秘的功能，没有风

给它鼓劲。猫头鹰尖厉地叫了；

听呵，又叫了一声，还那样尖厉。

我住的小屋里，人们都已歇息了，

留下我一个，孤单清净，正好

专注于默想冥思；身边就只有

摇篮里的婴儿，睡得安安稳稳。

多么幽静呵！幽静得这样出奇，

这样古怪，连沉思也受到牵掣，

也为之忐忑不安了。大海，山林，

这人烟密集的村落！大海，山林，

芸芸众生数不尽的营营扰扰，

都悄然入梦乡。

这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诗歌之一，可重读时，我惊讶地意识到，如同许多没有孩子的读者那样，我以前从未注意到诗中的宝宝。必须承认这宝宝很乖：即使如此，它的存在也让如今的我感到愤恨与畏怯。

虽然有些勉强，我还是很惊讶，没想到柯勒律治居然能在房间里有一个婴儿的情况下成功写出一首诗，更何况他还声称环境太过安静。我开始觉得我的窘境是因为自己太不敏感，自己的灵魂太过卑劣。记得有一次，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一家渔场发布的暑期招聘广告，渔场位于遥远的格陵兰岛的一片冰川上。你坐飞机去那里，在那待三个月，轮班工作16小时，乘坐巴士穿梭于简易房舍与工厂之间；与外界的交流会异常困难。快到三个月的时候—你震惊，发狂，散发着鱼腥味—你带着钱，被丢到了飞机跑道上，获准回家继续过原有的生活。我做母亲的经历开始变得与这则广告有几分相似了，这让我感到担忧。我意识到自己一直等着卷土归来，重获头脑、美丽与价值；读到《午夜霜寒》时，我略感痛苦，仿佛血液正重回麻木的肢体。

这首诗写的是安静地坐着，写的是孩子如何像锚一样拴住身体，最终拴住心灵。诗中的父亲为这种安静感到焦虑，如同对监禁带来的安静感到焦虑：他正留神倾听世界，听得很仔细，以至于能听见外面的霜降。不一会儿，他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心深处，进一步探究他所占据的这一刻。他记起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在一家寄宿学校，那时的他很孤独，老师很严厉，他怀着希望，特别希望在某一刻，教室的门会打开，某人，某个他所爱的人会进来。这些记忆唤起了他对孩子最深沉的疼爱之情，仿佛他在生活中曾忍受过的每一次别离之苦都可通过他与孩子的这一亲密时刻来弥补。

身边，摇篮里婴儿正在安睡，

寂静中，听得见他轻柔的呼吸：

这声息仿佛填补了我的思绪里

那些零散的空隙和短暂的间歇！

玲珑姣好的婴儿！当我看着你，

心魂便因愉悦的柔情而震颤，

想到：你会在截然不同的场景中，

学到截然不同的知识！因为我

在都城长大，被关进幽暗的庵堂，

除了天空和星星，没什么可看的。

这份爱是一种补偿。它就像一处新地方，在那里一定看得见故乡和不快的过去。对于作家而言，这样的爱表明，在叙述生活本身方面，作家享有权威。他想象着自己的宝宝长大成人，云游四海，见证奇迹。束缚变成了自由，丑陋变成了美丽：为人父母这件事带有救赎性质，具有革新力与创造力。借助这种手段，自我的极限被打开，并且找到了通往更加壮丽的景致的大门。柯勒律治没有提到尿布、噪声和变质的食物。我不认为这只是夜班的缘故。他的诗用现在时写成：它描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被隐含意义，被其他时刻，被噪声与混乱所围绕。也许在眼下，只存在各种各样的时刻。可他把自己的礼物—语言—带给了这一刻，他可以在这一刻表达自己的爱。这一刻，他心怀整个世界，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一刻，他体验到了一种内在的伟大。

那么，对于你，所有的季节都美妙：

要么是盛夏，大地一片绿茸茸；

要么是早春，积雪的丛林灌莽里，

知更鸟歌唱在青苔斑驳的苹果树

光秃的枝头，旁边的茅屋顶上，

晴雪初融，蒸发着水汽；檐溜
要么滴沥着，在风势暂息的时候
声声入耳，要么，凭借着寒霜的
神秘功能而凝成无声的冰柱，
静静闪耀着，迎着静静的月光。

帮手

夏天到来时，我开始觉得自己遇到了瓶颈期。我女儿五个月大了，她无处不在，就像某种甜滋滋但黏在我生活里的东西一样，如同蜜酱和胶水。这不是她的错：我在书中读到，依附是她的天性，仿佛我是一面墙，她是沿墙生长的葡萄藤。我想让她的目光瞄准其他什么东西，这样一来，她就能时不时地站立一会儿，而我则能短暂地脱身。在我孩童时期读到的故事中，父母是离我很遥远的浪漫人物，他们常外出从事某些神秘工作，或晚睡晚起，在楼下举办盛大派对，孩子们则冒着危险靠着楼梯的扶栏偷听。通常这些父母都注定早亡，且死因悲惨：他们的轮船也许会沉没，又或许他们的汽车从圣特罗佩[34]的某处悬崖坠落—坠落时皮草与烟斗还在空中飞舞，留下了明显未受影响的孩子去自由自在地展开华丽的冒险。这些故事的背后通常有个保姆之类的人物，她得是个热心肠，让人觉得舒服，如同长毛绒地毯一样保护着家里每一寸地盘；后来她老了的时候，这张地毯又被卷了起来，存放在楼上的房间里：她既缓解了独孤与凄凉感，又神奇地解决了父母不在的问题。

我的父母总是自己照顾我们。有一次他们出门旅行，把我们留给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在早餐时给我们吃前一天晚饭我们拒绝吃的那些东西；不过，他们通常和好几家人建立一个互信体系。我们常去那些人的家里，那些人也常来我们家。如今，我们这些有孩子的朋友似乎在压力下工作，压力源自视情况而定的混乱安排，它不仅没解除，反而加剧了他们的束缚：全速冲出房子，把孩子丢在某个照看孩子的人那里，下班后全速赶回来，把孩子接回来，并花好几分钟时间跟帮忙照顾孩子的人或保姆疯狂地讨价还价；恐慌地针对威胁—时间一到就不干了—进行谈判，仿佛6点一到奶妈就会化成一阵烟消失，或者照看孩子的人会让宝宝在外面淋雨。丝毫没有懈怠或缓冲期。我背地里希望赎回的正是这种难得的享受时光，它们将不同事件联系起来，让人觉得自在快活。随着我女儿的出生，这些时光已经消失，预计在接

下来的几年内也不会回来。她出生几个月后，我依旧觉得下列事实冒犯了我并引起了我的疑虑，就好像它们是某种陌生且卑劣的司法制度：我再也不能睡懒觉、看电影、在周六早读，我无法无拘无束地在温暖的夏日夜晚散步，无法游泳或漫步到酒吧喝上一杯。我失去了这一切，仿佛它们是我为换取做母亲的特权所必须付出的太过高昂的代价。虽然因为女儿的出现，我也得到了很多补偿，但这些补偿都并非实物，甚至连支付币种也不同，所以事实上也算不上补偿。我的得与失并不相关，也并未带着最后需要平衡得失的目的来计算它们。

我发现，那个长绒地毯似的奶妈，那个为缓和做父母带来的冲击而存在的奶妈是富人们的独有特权。其他的育儿方式似乎全都按照公共电话亭的原理工作。你将硬币投入投币口，如果钱用完了，通话就会突然被粗鲁地切断。我认识的人当中，这种最基本的自由仿制品被用于精确覆盖父母上班的那段时间。临时保姆被请来覆盖不重要的时间段—夜间—此时，孩子已睡着，大人则被困在房里。这两个时段的间歇期似乎归你自己负责。我只认识一对夫妇将托管孩子的时段也扩展到了周末：他们富有且冷淡。

到目前为止，我同临时保姆打交道的经历可谓悲喜交加。我女儿睡着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正在调兵遣将，找来一个冒牌货偷偷顶替我几小时，这时候临时保姆便上场了。通常我会跟这位保姆坐在一起聊一聊我的女儿，聊一聊她醒来的时候该做些什么，再聊一聊照顾她的方方面面。这些预防措施如同飞机上例行公事给出的安全常识演示一样，明显毫无意义：基本可以确定它们派上用场的情况不会出现；若真的出现了，那意味着灾难发生，超出了它们的救援能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乐于跟保姆聊天。聊天可以缓解孤独，仿佛在临时保姆的内心，我邂逅了一个与我志趣相投之人，在照顾孩子的这几个小时中，这人可以理解扮演我这个角色到底是种什么滋味。我有时候似乎特别享受聊天，以至于压根儿就不打算外出。“她会没事的。”保姆常这么说，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这句话充分渗透到我的意识中，提醒我该离开了。离开后，我会反复打电话。“她很好。”保姆说。我发誓半小时后会再打电话，会早点回家。回到家后，我跑去凝视着在婴儿车中熟睡的她；在我看来，睡着的她像是知晓了一切，很神秘，又像

受了点轻伤，经历了很多我未参与其中的事情，仿佛她刚从大学回来，或是从环球旅行中回来。

有时候，与临时保姆的会面让我觉得在我女儿醒着的时候找个人照顾她一段时间也是有可能的。想到这一点，我满是解脱与愉悦之情，也有点怀疑：首先，我不相信存在这种可能性；其次，我不相信自己之前没利用过这一点，也不相信自己眼下没在利用它。我本能地走向电话—仿佛某个善人正等在电话的那一边，她会主动派一个人过来—傻傻地站在电话旁，手里还拿着听筒。我该打给谁？我该如何开始我的搜索？我考虑的人选不会出现在电话号码簿里，而是身处天使组成的唱诗班之中，或是儿童故事书中。她聪明、能干、善良、忠诚。她的薪水不高，符合行业标准，工作时间很灵活。她不存在于尘世间，可每天早晨却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一边安慰我，一边从我手中把宝宝接过去，擦去我的眼泪，然后说：你放心地走吧，好好玩，我们会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对吧？她是我那矛盾自我的投射。我从不想离开我的女儿，但令人悲哀的是：若不离开女儿，那我就永远没法做别的事了。因此她解决了这个问题。唯一让这个不幸的事实被人接受的办法就是掩饰其本质。把孩子交给别人并非玩忽职守，而是礼貌且合乎逻辑的让步，是心甘情愿的投降。

我有个朋友认识一个叫罗莎的女人，那女人有时帮忙打扫她的房间。罗莎来自西班牙，正在攒钱，准备移民去美国，所以需要工作。我问那个朋友，罗莎能不能照顾我女儿。她谨慎地回应，说她觉得罗莎不行。她承认有一两次曾把自己的孩子留给罗莎，却对罗莎感到失望。她老练地未列出自己感到失望的具体原因，我对她所说的印象很模糊，并不具体，我的热情轻而易举地压倒了这个印象。罗莎是个矮个子女人，像小鸟一样小巧且紧张。她说，她骑自行车在伦敦到处转悠，踏板踩得飞快，是为了信守承诺，这些承诺日复一日地在一座不稳固的塔里堆积起来，因为她最近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存款，差不多有1万镑，这些钱被一个似乎是骗子的人拿走了，这骗子主动要帮她投资。如今为了弥补这笔损失，她被迫承担了比她实际能承受的负荷还要大的工作。她告诉我，她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农场长大，和自己的兄弟姐妹肆意妄为。在这段无忧无虑的时期，她过得很开心。从那以

后，她似乎发现了这世界很是令人失望。她和一个男人在瑞士生活了好些年。如今她和她一个做美发师的妹妹住在伦敦东南部的一间政府廉租公寓里。

我为罗莎感到难过，同时觉得我的需求与她的需求有相同之处：她对钱的需求和我对时间的需求一样无止境，而且很明显，这两者完美匹配。我同她就工作时间安排达成了协议。约好的那一天下着雨，天色很暗。女儿和我等待着罗莎，紧张得像那些在机场接机的人。一个小时后，电话铃响了起来。是罗莎打来的，她在雨中周旋了很久，就是找不到我们的房子。我给她指路。她在电话里向我道歉，可到达时却很愤怒。她咒骂着英国的天气。她也咒骂着我们的房子，说它太难找了。她没有跟我女儿打招呼，我女儿躺在我怀里，眼里满是惊恐。一个死结卡在了我胸中，让我觉得不适，我有强烈的预感，觉得自己有了麻烦，做错了事。我给罗莎倒了咖啡和茶，接过她淋湿的衣物；可在这些帮助的背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被囚禁在了自己的房里，被一个陌生人挟持做了人质，而我必须想办法说服她离开我家。我女儿哭了起来。我同她一起坐了下来，喂了她一瓶奶。罗莎问我她能否在房子里到处看看，无助的我只能同意。她消失了很久。我听见她上了楼，慢慢地走来走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恐惧感，以至于我的思绪飘散，大脑陷入空白。这一插曲让我若有所思，因此罗莎突然再次出现在门口时，我吓了一跳，仿佛我忘记了她在房里似的。真不错，她温和地说。我开始说话，没头没脑地胡说八道，问她问题。她告诉我，她和兄弟姐妹以前经常用杀死家中花园的蜂巢里的蜜蜂来打发时间，用小刀把它们碾碎。她还跟我聊到了她的雇主，他们脏兮兮的家，他们令人讨厌的习惯。她问我是否赚了很多钱。我女儿睡得很熟，非常踏实，于是我把她放进了婴儿车。我尖声说道，罗莎，很抱歉，我们改变计划了。我告诉她我们准备搬家，准备出国，突然被派到别处去了。我主动提出把她今天的工资结了。我不断道歉。令我惊讶的是，她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说法，然后离开了。

失败过一次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再次力求获得解脱。不久后，一个朋友推荐了西莉亚，这个巴西女人目前每天下午在接受教师资格培训，希望早上工作。西莉亚满载赞誉而来。她曾照料过我朋友的孩

子，而且照料得很好。她同小宝宝相处得很好，也能善待大一些的孩子。带孩子出去散步时，她会把写着孩子住址和电话号码的小纸条放在他们兜里，以防他们走丢。这种预防措施让我有些不安，但我还是决定相信我朋友的话。西莉亚个头很大，很温柔，有一头长长的黑发。为了跟男友在一起，她十年前来到了英格兰，两人关系破裂后，她留了下来。她热切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她梦想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她一直怀有这个梦想，但因为根深蒂固的口音而难以实现，不论上多少课，她都没办法抹掉口音。西莉亚的口中满是自己为了生存而做的斗争：她是人们无情说起的受害者，既受自己之害，也受他人之害。噩运对她纠缠不清，她的路上总有陷阱。她头痛还患有抑郁症，对恶劣天气与黑暗的反应剧烈。兼职工作不太体面，使她饱受打击。有个雇主曾不停地让她用吸尘器清扫楼梯，导致她后背受伤。另一个雇主则非让她花好几个小时去熨他一大堆的花衬衫，监督她检查衬衣的褶边和袖口部分，然后让她再熨。她在一家小商店里上过班，被人指控行窃，并威胁要把她送交给警察。她有些不自信，沮丧地倾向于认命，这让她无法让人相信自己是清白的。西莉亚来到我家，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她愿意，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比方说她要回巴西，比方说她找到了一份当老师的工作，又比方说她的电脑课程出乎意料地效果显著。与此同时，她把我女儿放在厨房地上的一张小地毯上，用葡萄牙语轻声对她说话，在她眼前晃动着一个玩具，如同催眠师用的挂件一样。

在楼上，我与自由重逢，虽然我异常渴望这场重逢，但它依旧让人感到恐慌与不满，这不仅因为我那在楼下毯子上的女儿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每隔几分钟，我就会走出书房，坐在楼梯上留神听着她是否表现出痛苦的迹象。我们的分开有些残忍，这种氛围让我想起了过去一些身不由己的不快经历：周日晚上将要返回寄宿学校的氛围，考试，打针，手术，被拒绝，不受人喜欢，受到惩罚。还有新近忆起的一些痛苦，这些成人之痛源于不快乐，也源于某些你不希望却还是发生的事。曾几何时，我有一部分生活不包含女儿，与她也无直接关系，而如今，它注定充满了这种我既熟悉又痛恨的黑暗时刻；这种时刻注定会增多，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仿佛给我的幸福挖了一个

地下坟墓，而我已宣誓将幸福永远拒之门外。这件事让我既惊讶又沮丧。我有时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下楼去厨房，我女儿看到我以后有时候会哭，她的眼里满是困惑与哀求。我对自己能结束我们两人共同痛苦的能力感到困扰。我没能这么做，对此我很是苦恼，鉴于我把大多数昂贵的时间都花在了担心楼下的情况上。

西莉亚没通过英语考试，因此陷入了低谷。她开始迟到，或者干脆不来，并且打电话编造一些借口，例如头疼或错过了公交。我已经接了一些工作，某一次，西莉亚再次在最后关头放了我的鸽子，有一份稿子的交稿时间只剩下45分钟，我只好坐在电脑前疯狂地打字，而我女儿则躺在书房的地板上哭着。她后来还是来了，但沉默且郁闷，她走路的样子仿佛每走一步都会觉得疼，她两眼闪烁，满是不快。她承认与她有密切关系的某个男子对她很不好。我女儿也看穿了我们的小诡计。她从西莉亚的满脸愁容中读到她即将被抛弃的预兆，因此挣扎着想要阻止此事发生。我从楼上都能听到她那塞壬女妖般的哭声，偶尔我会从西莉亚悦耳的说话声中听出紧张、绝望的音符来，也能听到她疯狂地把婴儿车的铰链弄得嘎吱作响，那是因为她急着想哄我女儿入睡。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准备修一门新课程，因此一周只能来两小时。我们达成共识，我不得不找个人来替她。

一天晚上，我无所事事地快速换着台，突然间，我发现自己专注地看起了一个放了一半的纪录片，它讲的是富有的美国家庭主妇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个脸晒得黝黑、做了一个看起来很贵的头发的女人坐在一张皮沙发上，她正诉说着她孩子保姆的种种毛病。观众可以在背景处瞥见那个保姆，能模糊地看见她深色的皮肤，她低着头，正把玩具放进盒子里。观众发现她是个秘鲁人，离开了她的四个孩子来到美国，想要赚足够的钱来抚养他们。她一年见孩子一到两次。那女人说，我跟你说，玛丽亚对我的孩子们特别好，可我有时候有种感觉，觉得她，怎么说呢，对他们有点太好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也许她很想自己的孩子，我也知道你不能，呃，不能阻止她去碰我的孩子，可他们终归不是她的孩子，你懂吧？比方说，几天前我在泳池里，玛丽亚和我女儿在热水浴缸里，她把我女儿放在腿上，我跟你说，当时我就在想，把她放下来，她知道怎么坐在浴缸里！她生气地捋了捋她

那完美无缺的头发。

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一个男人打来了电话，对此我感到很惊讶。他叫斯蒂芬。斯洛文尼亚人。他20岁，曾在伦敦花了一年时间帮别人做家务活以换取食宿。目前他正在大学念博士，可还是需要一份兼职工作。我请他来我家聊一聊。他很瘦小，人很机灵，打扮和举止像一个会计。他提着一个公文包，说起英语来有贵族派头，其中掺杂着大量刺耳的东欧元素。我给他倒了一杯酒，又递给他一根烟，他都接受了，然后我们坐到了花园里。他很享受自己帮别人做家务活以换取食宿的经历。他喜欢做饭和收拾房子。他热爱他工作过的那个家庭：他告诉我，那一家的孩子很可爱。他仍然会跟那一家的父母见面，他们甚至在会面的晚上会顺便共进晚餐。他出示了一份他们写的推荐信：信写得非常热情洋溢。斯蒂芬去那一家工作时，他们最小的孩子才四个月大。斯蒂芬说，那孩子很特别，很聪明。他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仿佛无法用语言去形容那孩子的魅力。我问了问他读博士的情况。听起来他正在研究通往伦敦机场的运输路线。这个过程中，我女儿牢牢地坐在我腿上。跟她相处时，斯蒂芬很礼貌，但也不动声色，仿佛他俩是生意上的伙伴。不管怎样，她看起来对斯蒂芬的行为没什么感觉。我们商量好他下周起开始照顾我女儿。

接下来的几天，电话响了又响。每次我拿起电话都能听到不同女人的声音，它们有的年轻，有的沧桑；有的显得苦楚，有的满怀希望，有的绝望，有的则既快乐又迷糊，仿佛她们不知道打电话是为了应聘某个职位还是为了买一块二手熨衣板，而且她们也不在乎。我不断地说我们已经有了人选了，很抱歉。这些会谈很不公正，让人感到内疚，缺乏爱与关怀。它们的表象之下有一种残酷，事关金钱与生存。对我来说，我以这种方式来换取我女儿的生活，这实在不可思议；同样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出生，她制造了一个问题，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太过随意，又因害怕而太过无能为力。斯蒂芬如期而至，熨起衣服来。他问我是否能够晚点去采购，以及我们晚餐想吃什么。我们想吃卷心菜吗？他有一叠食谱，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说话时电话响了，于是我把女儿交给了他。他的表情有些恐慌。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个小型炸弹。我放下电话时，他把女儿又交给了我。我觉

得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我无所事事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必须去工作。我把女儿放在沙发上，离斯蒂芬两英尺远，他站着，手上拿着熨斗，然后离开了房间。我在楼梯上偷听，只听见楼下沉默了好久。不久后，我听到了某种咯咯声，就像人们赶马的时候会发出的那种声音一样。我女儿嘟囔起来，咯咯声也随即变大。不久后她哭了起来。别哭，我听到斯蒂芬活泼地说着，别哭嘛，宝宝。我回到楼下。我女儿还躺在我把她放在沙发上的位置，她正在尖声大叫，斯蒂芬正在她头顶上安慰性地手舞足蹈，仿佛她释放出来的热量很强，让他没办法靠得太近。你得把她抱起来，我解释道。我感到极度疲惫。

斯蒂芬很快便卓有成效地整理出了一系列料理家务的办法：他给家具打蜡，除尘，把食品柜塞满。他有种豪宅管家的风范，既细心，又谨慎。厨房里弥漫着一股衣服煮熟后的卷心菜味。他偶尔会推着婴儿车带我女儿去散步。我嘱咐他，要是我女儿哭了就带她回家，他谨遵我的嘱咐，很快便回来了。女儿又完整地交到了我手里，仿佛她体型过于庞大，无法送出，又仿佛她很难对付。我明显觉得她所受的待遇远不如斯蒂芬先前照料的那个很讨他喜爱的孩子。我告诉斯蒂芬，非常抱歉，可我们必须找一个能照看孩子的人。他颇有风度地接受了被解雇的事实。第二天他又来了，按下了门铃。他跟我说，他的室友让他相信他被炒鱿鱼这件事不公平，应该获得补偿。我冷冷地问他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他说，通常是补一个月的工资。我给了他一个星期的工资。他拿了钱就走了，很明显他觉得很难跟我继续聊下去。

最近几周时间里，我女儿的眼睛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双眼睛乌黑且明亮，一直盯着我不放，在此过程中，照管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他们有不同故事，特定的身材与气息，以及难以形容的气质。她隔着一条鸿沟看着我，它源自我的生活，我亲手将它置于我和她之间。我从她的眼里看到了困惑，以及认可和证明她很勇敢的某种证据。她曾稍做努力，想让这一安排见效。我知道，如果我逼她，她会接受我给她的一切，可是我从没有耐心，也没做出最大的牺牲，这牺牲源自我真诚地保证过这种做法会产生预期效果。我也发现，我曾赎回的那些时间遭到了损坏，成了二手货。它们受了限制，让人不太满意；这些时间疯狂地嘀嗒作响，响声会被人听到。度过这些时间就如

同生活在出租车里。在这些时间里工作已然足够困难，享乐，或连休息都毫无可能。我无法让我的世界与用我女儿肉体深深印上的空间——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融为一体。此外，我清楚地告诉她一个事实：我认为抛弃她不可理喻，她的种种抗议合乎情理。如此看来，我并未做好准备让她去爱别人。

某日深夜，电话响了。是罗莎打来的。她打电话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待她有多差。她说，你们这种人哪，开的工资简直像在打发奴隶一样。明明你们这么有钱，明明我们干的活就像奴隶干的一样，你们居然还只给我们这么点工资。你太恶心了。你的房子也恶心。她要求我用钱来补偿她。参观我的房子时，她在我桌上看到了一张大额支票。我做过什么，凭什么就能拿这么多钱？成天像奴隶一样工作的可是她啊。她像连珠炮似的不断抱怨着，语言很粗俗，也很歇斯底里。她咒骂，责难。我把电话听筒拿得离耳朵远远的，透过深色的窗玻璃看着外面的伦敦，看着夜色。我再次拿起电话时，她还在说着。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她说。然后她挂掉了电话。

请别忘了大声叫

我们从城里搬到了某个大学城，人们住在那里是为了忘掉世界上还存在着别的地方。这里几乎没有犯罪，没有混乱，没有汽车，没有噪声，没有尘埃，也没有区别。这座大学城与外界保持着安全距离，仿佛它处在某个魔法阵，某条环形公路的庇护之中，以外是一片苔原，那里是没人想要的东西，加油站、交通环岛、工厂、散乱分布的大都市，以及成片的伤痕累累的红土地，那土地上正在新修很多房子。环形公路上不分昼夜地充斥着小汽车和大卡车，它们如同捕食者一般，围绕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不论身处何地，你都能听到环形公路发出的压抑的吼声，仿佛是大海的怒吼。

我们的房子位于一个住宅区，那里给人一种郊区或草原的感觉。正是从此处，市中心那成排的大房子开始—我倒希望是每隔几英尺—自行分成了诸多房屋，这些房屋很狭窄，让人凭空想到了牧场和城堡。街上满是栅栏的边缘和花园的大门。我们要走的那条路是一条主干道，通往当地的商店，路上的车辆很谨慎，却相当多。很多五十多岁的女性像犁地似的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来来往往，她们身体结实，穿着厚凉鞋和花裙子。留着胡子、有着女人般宽阔臀部的男人穿着一身米色衣服，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经过我家的窗户，遛着条叫个不停的小狗。那些男人沉默，痛苦，与人偶遇会感到局促不安；而那些女人则像责难的暴风雨和旋风那样突袭了那条路，她们在经过时刮起了一阵谴责之风，它呼啸着穿过了门窗的裂缝。她们迅速地看了看我家门前那杂草丛生的草坪和家门外那装着空酒瓶的大货箱。她们踩着自行车，车篮嘎吱作响，穿着夏装，露出她们长着雀斑、白嫩的粗壮胳膊，还向偶尔出现的骑摩托车的人、狗主人或随地乱扔垃圾的人抗议。她们那种女人毫不惧怕嘲笑与非难。她们统治着这块有着宽敞且顺从的街道的古怪飞地，她们的精神主导着那种压抑且适合中年人的艰苦生活。

我见到的其他妈妈似乎都比我老得多。我在伦敦很少在外面遇到带着孩子的人，可这里的商业街上满是这种人。我们的折叠式婴儿车在人行道上闪转腾挪，像跳着小步舞似的。我偶尔会发现自己像个过分拘谨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一头灰发还挺着个大肚子的女人，还有那些带着一大群小孩、年纪大到足以当奶奶的妈妈。诚然，我之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也感受不到性别差异，几乎见不到这些孩子的父亲。餐馆和咖啡馆满是女人，商店和公园也满是女人。偶尔可以在周日一大清早看到男人，他们不自在地推着婴儿车，在空荡荡的街上转来转去，可到了午餐时间，他们又消失了。到处都充满了战争、实验室实验或过去的气氛。骑着自行车的女人维持这里的大街—它们让人感受不到性别差异—的治安，她们穿着粗短的花裙子，胳膊很白也很结实，具有一种奇特且令人不安的少女气质：让人想到尼姑、老处女和未结婚的女儿。她们的精神之母都是一些瘦而结实的女人，她们青筋暴露，一头白发，穿着浅口高跟鞋与深蓝色的百褶裙，长着如同鸟一般瘦削的脸；她们聚集在银行或杂货店外面，一本正经地冷酷地聊着天。

我相信，若我的生活还属于自己，我绝对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虽然住在这种地方就是为了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让你失去对生活的掌控，并保障不危及公众，我不得不承担起撤离伦敦、放弃过去几年里我那不受约束的欲望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的责任。我无法告诉你这份责任到底有多重：我无暇，也没有机会去确定它到底有多重。我只知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这份责任感开始在我心中与日俱增：仿佛因为不满和时不时的痛苦，我再度怀孕。一种被剥夺感与无根感将我控制住，在我心中滋生，这感觉虽只是一种推测，却充满力量；只有我停止庇护并让它苏醒，我才发现这感觉只不过是个幻影，是人造出来的。我再也没办法过以前那种生活了，这个事实让我感到悲痛，我似乎已具体地表达出了这种悲痛之情。我离开是因为觉得我不再属于自己曾经所在的地方。

我一离开，便发现自己的恢复效果很显著。因为做了母亲，一些东西曾遥不可及，而如今，这一切仅受地理因素的阻隔。在家和宝宝共处几小时所带来的孤独同搬到一个没有朋友、不友好的新住处所带

来的孤独合并到一起。做母亲很无趣，很单调，受很多限制，会失去很多享受，我们周围就有它的化身。我的生活摆脱了它的重负，将其传递了出去。一天，我不由自主地对我的伴侣说道，想象一下，如果没被困在这个无聊的地方，如果朋友都在你身边，晚上有地方可去，周末有事可做，照顾孩子就会轻松多了。你说的是伦敦吧，他说。

于是，我们在外省的生活很快便有了一种在监狱服刑的感觉，无法确定刑期，因为我们很难向自己承认，也很难向他人承认我们真的犯了错。我认为，犯这种错误也需要讲规矩：得慢慢来，尽管我们的确有一个朋友，他搬出伦敦之后在几天时间内又搬了回来。他会在周六打网球双打，设法将家迁到了英格兰北部，后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没有错过一场球赛的情况下举家搬了回来。话说回来，一开始，虽说我们的生活哪怕不至于完全没问题，但至少要比错误的生活好忍受得多。正值夏末，在让人怠惰的热浪中，我们每日都在附近的一条河里游泳，那条河很宽阔，像静止不动的丝带，河水蜿蜒地缓慢流经一片大草原，草原上有奶牛和野马在吃草。人们泛舟河上：年长者坐汽艇，喧闹者凑在一起，坐狭长的小船来此处度假，还有人驾驶着小舢板，航行在这条古雅且颇具田园风情的大海般的水道上。有一些男人穿着航行服—时髦的帽子和系在脖子上的手帕，看起来更适合旧金山的夜店。有一些情侣待在装着玻璃窗的密封船舱，你可以瞥见那毫无隐私的船上生活，男子表情严肃地坐着驾驶船只，女子则快速地在船舱里走来走去，要么手里拿着抹布，要么正在喝一杯别人泡好的茶。在河的另一段中，人们正在浓密的绿色水域里用竿撑着方头平底船。人群中大多数是学生和游客，不论是他们爽朗的笑声还是沉默都表明他们的自我意识很强，这一切就像一首毫无新意的田园诗，如同展示一种从《旧地重游》[35]的书页中获取的特权。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学生在一艘平底船上，男孩们穿着白色的法兰绒衣服，戴着平顶硬草帽，女生们穿着薄得几乎透明的裙子，戴着草帽。有人甚至拿着一只泰迪熊。船上有一个野餐篮，还有一个留声机，从留声机里传来了埃迪特·皮亚芙[36]的歌声，歌声很响亮，曲调有些失真。他们举着香槟杯。从其他平底船旁边经过时，一个男孩向其他的船只晃了晃酒瓶。他们这群人真奇怪，不太适合他们那种不自然的享乐主义：男孩

脸上很多粉刺，鼻子很尖，女孩又矮又胖，戴着眼镜。他们的狂欢有种不确定性，看起来不太得当，近似于误用。我为他们感到难为情，可一连好几个月，他们那做作的郊游都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如同一个无法消除的警告。

时光缓缓流逝，夏天过了是秋天。当白昼渐渐变短，开始下起雨来，我女儿学会了爬行，后来又学会了站立。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她的成长并未呈现出一种令人欣喜的形式，并未愉快地从婴儿时代四肢无力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反，她成长缓慢，让人感到沮丧。看她就像是看一部倒放的电影。她的身体受到一股无形力量的折磨，让她不断地爬起后又跌倒，并且让她如同溺水者那样挣扎着，竭尽所能地去扶住椅腿或桌面。仿佛她正努力摆脱流沙。她所做的努力让我紧张到头疼。在无保护的情况下，即使离开她一分钟也很危险，她体内的冲动，就像深不可测的沙漏里流出的沙，又像是时间：它如溪流般从她身上流出，不断流淌，我们必须努力去引导与控制，当打电话或有人敲门时，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溪流就会危险地溢出。我想起来，我曾不经意间听到别的父母说她动个不停或是她一直在动之类的话，并仔细思考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瞬间的分心就会导致我女儿慢慢地爬到楼梯顶上，拉扯着有可能让水壶或是电熨斗砸到她的电线，或钻进垃圾堆里。她以农民收割庄稼的速度扯开唱片套，把装在信封里的信件撕成碎片。她把自己对准装了漂白剂的瓶子或是装着热茶的杯子，在房间里滚来滚去，就像一个缓慢但致命的导弹，只有在有人走过去挡在她和她的目标中间时，她才会改变自己的路线。突然间，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出紧张的戏剧，身处其中的我们争分夺秒地拆掉这颗炸弹。我们一下子成了时间的奴隶，我们把女儿留在厨房，以便更有效地阻止她发出嘀嗒声，压制住她的破坏力。只有在睡眠将她击败、让她无法正常运作时，那嘀嗒声才会停止。快速且无声流过的间歇期如同洪水一样冲刷着我们，在我们刚来得及读书和聊天时这些乐趣就被迅速夺走了。

照料孩子这件事的核心是不守规矩，它也有一种持续性危机的特质。我发现自己做母亲时缺乏军事化管理，凭借这种方式，可以接近这一核心。我可不是随便用的“军事化”这个词：若你想征召加入正统

的父母世界，你要懂得自我克制，要有服从精神，要喜欢单调划一的生活，这些都是这个词必需的。在我们如今居住的这座小镇上，人们深谙此道。这座小镇的居住空间正好与好妈妈“相配”。我开始明白，这就是这么多妈妈住在这儿的原因。你在这里可以摆脱外界生活的种种折磨与诱惑，摆脱酒吧、电影院和售卖不实用鞋子的商店。这里的餐馆里有轻便椅和更衣室，公交车的车门宽敞，车上有婴儿车放置点。大学静默，这块飞地享有特权，被男性统治，这个崇高的场所将平静地继续存在下去。等级制度恰如其分，规定了从低到高的方方面面。

一位社区保健员在家里战场般的厨房里拜访了我们。她拿出一捆宣传单页，周到地将它们摆在桌上以方便我学习，与此同时，宝宝在她身后抢劫了她的手提包，她却没发现。你带她去过婴儿学步小组吗？保健员问。没有。如同接种疫苗和母婴诊所一样，这一概念给我灌输了一种与管理有关的深深的恐惧。我把宝宝带到商店去，我在那里试衣服；我也把宝宝带到中心区的咖啡馆去，那里坐满了学生，因为抽烟而烟雾缭绕；我带她去崎岖不平的田野间散步，婴儿车在那陷入了泥泞；我带她去伦敦，她在那里嘈杂的餐馆里和堵车的时候都哭得声嘶力竭。保健员拿出一张打印出来的名单，上面列出了我们附近的学步小组。她说，跟其他妈妈见面有好处。你可以聊天，你愿意的话，甚至还能来上一杯咖啡。我感到自己应该为这种低级建议感恩戴德。事实上，我独自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浓咖啡，在我女儿睡觉时在花园里抽烟。我会考虑的，我说。我猜，让她去见见其他宝宝对她会有好处。据我所知，我女儿认为自己独一无二。我担心她知道真相后会很震惊。

厨房的瓷砖地面很硬。我们铺了地毯，可就算如此，我女儿的头每天都会磕上好几次。她常费力地站起来，一般站上10或15分钟，然后直挺挺地慢慢向后倒，像一棵被砍倒的树。这一过程会持续好几秒钟，在此期间，不论谁跟她在一起，都会向她冲过去，偶尔还会像棒球手一样，做出俯冲或侧滑的动作，猛冲向垒包，甚至还会拿着垫子，冲向她头部即将触地的位置。在她着地的那一刻，在场者会愣住，因为听到她的头盖骨撞击地面的声音而保持一种震惊或抗议的姿

势。她的冒险故事在我们生活的背景中不断上演，如同一出广播节目。我们有时会留意这些故事，有时则不会，可某种小型探索一直进行着，楼梯被攀登，橱柜遭到仔细检查，物体的性质得到了科学分析。疼痛让她有了一些韧劲，让她领略到故作勇敢的精髓，这让她不愿承认失败或悲痛。我偶尔会留意到家里过于安静，于是抬起头，发现她正坚强地抓着橱柜的门或椅子的横档—她的脚被卡在了横档之中。物质世界是她永不停息的敌人，是她的荒野。这世界不够稳定，不可预测，她得冒一些风险。一天，她费力地站到了她那把笨重的木质高脚餐椅的横档上，餐椅直接砸到了她身上。她后背硬生生地摔在了地面上，高塔般的餐椅直接压在了她身上，我在门口目睹了这一幕，但由于离得太远而无能为力。她的头猛地磕在了地面上。几秒钟之后，高脚餐椅上突出来的木托盘如重锤一般猛地撞到了她的额头。我抱起她冲到了街上。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仿佛我准备放弃她，或向外界呼吁去保障她的安全。她额头中间有一处压痕，因为擦伤有些发黄，我每次看到它都感到惭愧。

一天早上，我在厨房的桌子下面找到了保健员的那张清单。那份单子告诉我，15分钟后某个婴儿学步小组将在几条街之外的某个教堂的大厅集合。我们穿上大衣，沿着低矮的灰色天空下正刮着风的人行道走，在周中早上急匆匆地通过某个不可预测的郊区中心地带，穿过无足轻重以及无人居住的平坦地带，对全世界人而言，我们似乎急着赶火车，或是急着要赴一场令人兴奋的约会。那个大厅只有一层，装修得很现代，靠着一座哥特式教堂的一侧而建。大厅里，空椅子被有条不紊地摆成了一个圈，围绕在一个由玩具组成的整洁的微型景观周围。我们到得最早。一个忙碌且紧张、脖子上戴着银色十字架的女人让我们把名字写在贴纸上，然后贴在我们的衣服上。我们无所事事地站着，既害羞又痛苦，仿佛参加派对的人。那女人问我是否第一次来，我说是的。我女儿果断动身去拿那些玩具，并挪开了其中一把椅子。她拿起一顶塑料的消防员头盔戴到了自己头上。我不知道她们会不会都来，那个女人焦虑地向我吐露。我不该指望她们会来的。你也知道，已经放假了。我问是什么假。她提到了一个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名字，那学校修剪整齐的运动场与我们的花园相邻。我很好奇这些假

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随后意识到与我无关。她说，所以你看，这周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好吧，我说。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是否在这里住了很久。只住了几周时间，我答道。你先生在这里的大学工作吗？她问。

其他女士陆续抵达。透过窗子，我看到她们推着折叠式婴儿车走了过来。组织者用真假嗓音交替着说“你—好”，一边热情地微笑，“你—好”。她四处奔走，派发贴纸。我女儿帽子下的那张脸显得有些阴沉，她的行为举止看起来有些自命不凡。她像个权威似的照看着那些玩具。不久，看到我独自一人坐着，她便过来将一只带着轮子、眼睛疯狂旋转的塑料龟舒适地放在了我腿上。一旦从婴儿车里解放，其他孩子便走向了放玩具的区域，就像那些到达工作场所开始忙个不停的人。一个小男孩走近了我女儿并沉默地站在了她的面前，直到她放弃了手中那只蓝色的玩具泰迪熊。她貌似非常清楚正在发生些什么，比我所了解得还要清楚。我有好几周都没跟家人以外的人聊过天了，我现在貌似正饱受图雷特氏综合征[37]的折磨。一位女士问我觉得我们住的这片地区怎么样，我不由自主地开始连篇累牍地斥责起这个地区来，而且很明显，我没办法长话短说，这让我感到担忧。我看见了她那张忧虑的脸和那双难以置信的眼睛，仿佛我们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那，你是干什么的？我突然问道。这貌似只会让局面更加糟糕。茱莉亚的蛋糕特别棒，在她旁边的另一位女士顿了顿，然后告诉我。是吗？我过于欢快地问了问。我总觉得自己很想做个糕点师。你做这个赚到过钱吗？那两位女士面面相觑，像女学生一样。你老公是做什么的？有人问我。接着我看了看我女儿，这时我发现一个头发散乱、有一双斗鸡眼的孩子正抓着她那厚厚的红色卷发，把她的脑袋不断往地板撞去。科迪莉亚！那孩子的母亲心烦意乱地用颤音喊道。科迪莉亚！组织者这时正端着杯子和盘子，它们在她颤抖的手中发出了巨大的碰撞声。壶里的水开了，冒着蒸汽。她在房间内四处走动，小心谨慎转向谈话的人群，向她们走去。咖啡，她看起来像是在冲着每个人说悄悄话，却又故意让旁人听到，仿佛她打搅了重要的会面。不远处，科迪莉亚的母亲正在讨论她的坏习惯。她怜爱地说，每当看到黑人，她女儿就会突然大哭起来！这真是太尴尬了，她压过别人的笑声

补充了一句。很明显，她，有点吓着了。她们同情地点点头，一边笑一边把手放在嘴前。要咖啡吗？组织者在我耳旁悄悄问道。

在咖啡桌旁，一个上围异常丰满，有着头盔一样、野兽一般的灰色头发的大块头女子问我有几个孩子。一个，我说。她貌似对这个数量感到失望。好吧，她说，我肯定你还会生的。我很快便意识到她也是典型的当地人，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在诊所、商店耳闻目睹过无数次这种人。住到这里前，我们在找房子时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女人，我们去看过她那栋衰败的房子。我们按响门铃时，她突然出现，穿得像一个女居士一样，肆意地环顾着四周。他们在哪儿？她大声问道。谁们？我们有些困惑地问道。孩子们啊！她答道。孩子们在哪儿？我有五个孩子，正站在我面前的那个女人实事求是地陈述着。你会发现这事儿越变越简单。她告诉我她8岁的女儿准备去法国参加一个交换项目。天啊，这么小就一个人外出吗？我说。她要去多久？一年，那女人轻松活泼地说。所以少了一个要操心的。她担心地看着我。我说“这事儿的确越变越简单”时，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看我女儿正一个人站在房间中间。她看起来有些困惑。组织者用她的勺子敲了敲她的咖啡杯。女士们！她大声说道。女士们！我想是时候唱几首歌了，你们意下如何？我这时才头一次意识到房间里有个男人。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狂野地竖了起来，仿佛正被处以电刑。他自个儿坐着。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安静地紧紧抓着他的膝盖。

我们都坐在椅子上，坐成了一个圈，孩子坐在我们腿上。组织者将自己置于中心。她手里拿着一只玩具泰迪熊，这泰迪熊不像我最初想象的是用来替代孩子的，而是作为一种女童子军式领导力的象征。跟几乎不认识的人一起唱歌，这件事似乎相当亲密，可至少比聊天更合我意。我们一开始唱的是《车轮转啊转》，这是一首赞美公共交通的歌曲，除我之外，人人都知道歌词和与之相配合的手部动作。接下来是《一闪一闪小星星》。我唱得很开心，同时发现幼稚的歌词里有些深奥且宽恕人的东西。我紧紧抱着女儿温暖的小身躯。在这样的时刻，她与世界有时会忘掉他们的纷争，聚集在一起让我确信自己能保护她、把她据为己有、照顾她。她在我怀里挣扎，我把她放下来。她专心致志、东倒西歪地走过地板，从组织者手中夺走了那只玩具泰迪

熊。我四处寻找着那个男人，发现他已经走了。划呀划呀？组织者对人群说道。大家和声表示认可。我知道这首歌的调子，可我很快发现，歌词变了。

划呀划呀划小船

顺着溪流缓缓漂

若你看见了鳄鱼

请别忘了大声叫

最后一句歌词唱完之后，大家一起尖叫了起来，音调不至于高到吓着孩子。我们不久便离开那座小镇搬到了别处去。很快，我们在那儿的记忆便渐渐消失了，只留下一种如梦似的奇特体验。虽然她从未学会那首歌，但我女儿很爱伴随着歌曲的那声尖叫。虽然她发出的吹笛子似的声音不太合群，我还是很欣赏她在理解歌词的点睛之处以及事物的核心上的能力。每当唱那些歌词，喜悦便会出现在她脸上，她总会记起那一幕，并尖叫起来。

和睡眠说再见

我女儿的生日和另一个纪念日是同一天：我已经有一年没睡过一个不被打扰的觉了。我仔细思考这一事实，就像因为某种令人费解的官僚主义的阴谋而一直流亡他国的人，官方再三承诺，明天或下周就会下发护照、车票和公文，届时他们就能回家了；要知道，那一年的每一晚，我都由衷地相信自己将重获睡眠。我的希望化为泡影，不堪一击。我渴望隐私与独处，渴望呼吸来自白日的肺部—黑夜—的氧气。可事与愿违，黑夜是白日那令人绝望的必然结果，是无人居住的连续统一体，我在此处值勤，如同一个保安看守着一座其居民早已离开的建筑。

我确信此事绝不寻常。我怀疑自己出了问题：力量、身份、意图上。我记得做妈妈之前，我听说过“支离破碎的夜晚”这种现象，也记得提到有关婴儿专横暴虐的种种例子时，我能感受到青春活力顺从自己的意志展示出的那股子耀武扬威劲儿。我曾对—我希望我只对—自己说，若我有了孩子，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当听说孩子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种种法子时，我渴望粉碎这种特权，拒绝孩子的要求，这种奇怪的渴望困扰着我。如今在讲述自己晚上的遭遇时，我偶尔也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渴望。他们的愿望很原始，希望如我一样残酷，希望我能够打破那些小家伙的控制，继而粉碎他们的希望、乐观和喧闹的纯真。也许孩子们期待做一些我们自己再也不敢做的事；又或许，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却深信自己那些寂寞而漫长的夜晚从未得到如此满怀爱意的关怀；正如当时的文学忠告的那样，我们无所依靠，只能哭泣。

我记得睡眠离我而去的那一晚。那是在医院。当时我没有任何疑虑。几小时前我生了一个宝宝。人们来来往往，有人送来了花。黑夜降临。一会儿就差不多10点半了，该睡觉了。我用毯子把宝宝裹了起来，仿佛它是我刚买来的，是一件我在早上会拆开包装再看一眼的礼

物。我睡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了过来，惊讶地发现持续响彻病房里的可怕哭声来自“我”，就像人们如今谈论自己的手机时一样。在夜深人静中，我新买的这个宝贝突然发出巨响，如同某个我不知如何关掉的闹钟。其他女性神秘的身体开始在床上辗转反侧，像被拴在睡眠港湾里的小船，在噪声的波浪中晃荡。不久后，有人发出了指责的啧啧声。前一晚，就在同一间病房，在同样的环境中，我也发出了啧啧声。这会儿我并没这么做。我头一次感到处在责任的聚光灯下着实让人难堪，这刺眼的光在黑暗中令人不快。从那时起，我一闭上眼便能料到，再次睁眼时我还会看到那道光，那不是幸福的白昼之光，而是一次显灵，一个鬼怪，一张传唤你去不受法律约束的秘密黑夜世界的传票。睡眠像一只大熊，柔软且温暖，警惕地守卫着无意识，它打着呵欠翻滚而去，轻快地离开，似乎再也不会回来。我把玩具熊和其他东西放到女儿的婴儿床里，仿佛暗示着我知道一些她不知道的，与舒适、安全和睡眠有关的东西，可玩具熊那缺乏情感的玻璃眼睛却对我们晚上的大戏视而不见。没有睡眠的献祭，黑暗被自己神秘的恐惧重新武装起来。我无法装作自己感受不到这种恐惧，事到如今，若我女儿确实在睡着时没看见这些处于白昼之间的凶险深渊，我会感到惊讶；我儿时便恐惧这些深渊，如今这种恐惧又被我女儿的恐惧再度激发。我们家不得安宁，我也不知如何、不知去哪儿找回这种安宁。

在我女儿出生的头几个月，我觉得自己的疲惫是一种身体上的休克。活力的弹簧若没有机会在夜晚回弹，就会觉得它在我胸中越拧越紧，让我那些自然的紧张情绪偏离正轨，将它们集中到一起，使得压力陡增，让人愈发疲惫。早上，我会从床上坐起来，觉得房间摇晃不定、斜向一侧，然后把一只手放在脸上，搜寻自己毁容的证据：也许有一条眉毛从我脸颊上滑落了下来，有一只疯狂的耳朵胡乱堆在了我额头上，又或是我头盖骨背后的一条缝裂开了。白昼有时是黏糊糊的泥潭，需要费时费力才能跨越它，空气成了不适合呼吸的胶水。它有时又是未受束缚、快速穿越天空的狂暴云朵，我永远无法立足。宝宝有一两次连着睡了五六个小时，这时我总是醒着，觉得仿佛自己被拳头猛击过。我开始用一种古怪的咬舌方式说话，每天好几次用手捂着嘴，确保舌头没从嘴里伸出来。

渐渐地，白昼与黑夜的差别完全消失。我深受白日梦以及幻觉的折磨，有时会想起一些从未发生的对话，有时则会透过窗子或在角落里看到奇怪的生物，我脑子里一直嗡嗡作响，这可恨的声音离我很远，仿佛有人打开了隔壁房间的电视机却一直没关上。在夜里，我有了一次特别凶险的接待访客的体验：我有了第二个孩子，它占据我的梦境，难以伺候，让我无暇顾及第一个。第二个孩子哭了起来，然后我喂它；第一个孩子也哭了起来，这时，我在黑暗中口齿不清地告知世人，我无法喂第一个孩子，因为我忙着喂第二个孩子。醒来时我吓了一跳，确信自己翻身压在了第二个孩子身上，让它透不过气，或疯狂地用一只手去彻底搜查床旁边的地上，确信它离开了，而真实存在的宝宝则在她的摇篮里继续睡着。

时间继续流逝，这种充满细节的恐惧感逐渐消失，混乱的夜晚开始因为失眠而变得清晰起来。我的内心更加勇敢，神经更加敏锐。宝宝继续每晚醒来三到四次，每一次我都做好准备，士兵一样训练有素且保持警惕。我似乎已不再在间歇期睡觉，只是安静地休息着，如同某个四处流浪、勇敢强悍、远离故乡的传奇人物。我这辈子所积攒的睡眠存量已被耗尽。我靠空气与肾上腺素过日子。水银流过我的血管。我想知道，自从很久以前与人类的过去断绝了联系之后，这个干渴且顽强的幽灵是否实际上就是那个行走于儿童的世界之中、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的悲观的陌生人：某位父母。

关于睡眠的教训也是关于孤独的教训。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简那残忍的里德姨妈将她锁在了红房子里过夜，一心想教训简的姨妈特别想给已经成为孤儿的简上一课，提醒她不要自以为有人会爱她。简被留在了那个可怕的房间里，手里连一支蜡烛都没有，她很快便意识到没人爱自己。她的恐惧很快让她顾不上这个可怜的事实。黑暗中的她孤身一人，心里老是惦记着死亡。她怀疑她的里德姨父就是死在那间房里。处在极度恐惧中的她出现了幻觉，或者真的遇见了一个鬼魂。她尖叫着哭了起来，使劲敲门想要别人放她出去。最终佣人们来了。

“她是故意尖叫的，”阿伯特有些厌恶地宣称，“声音可真大啊！如果她真的很痛苦，那还情有可原，可她只是想把我们都叫过来。她这点调皮的鬼把戏我还是知道的。”

里德姨妈要求把简送回房里并把她关起来。

“我痛恨骗人的行为，”她说，“尤其是孩子们做出这种事来；我有义务让你知道鬼把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你给我在这里待一个小时，你得非常听话，非常安静，只有这样我才会放了你。”

简因为害怕而晕了过去；等终于恢复过来时，她有些精神错乱，而且病得很厉害。

很久以后，简回来看望弥留之际的里德姨妈时，这段经历依旧在她心中。这些年来，她学会了将黑夜理解为真理显现之地，正好与白昼这个伪善者相对。在黑夜之中，寄宿学校里年幼的女孩死于饥饿和漠视；在黑夜之中，神秘的疯癫妻子在走廊里徘徊；在黑夜之中，无家可归且无依无靠的人乞求人类的仁慈，却无济于事。简小心应付着黑夜，变得令人敬畏起来。

“我决心要让她屈服，”一天晚上，坐在姨妈的床边，她谈到了自己对即将去世的姨妈的看法，“不管她天性与意志如何，我都要做她的主人。”里德姨妈漫无目的地说起话来。她询问简·爱所经历的一切。

“他们在罗沃德对她做了些什么？那里暴发了伤寒，死了很多学生。可是，她却没死：可要我说的话她已经死了—我希望她早就死了！”

“这个愿望真奇怪，里德夫人；你为什么会这么恨她呢？”

里德姨妈回应说自己这么做是出于嫉妒。她的亡夫很喜欢还是小宝宝的简，尽管“它会在烛光中整夜号啕大哭—不像其他小孩那样起劲儿地尖叫，而是抽泣与呻吟”。他让她保证，当他死后，她得照顾简，可她却违背了诺言。简大方地表示要原谅她的姨妈，可那女人太讨厌简了，拒绝了简的原谅。那晚稍晚时候，她死了。第二天一早，简和里德姨妈的女儿伊莉莎一起去向遗体告别。“我俩都没有，”简在她们离开时说道，“掉一滴泪。”

我想知道自己是否在建造一座堡垒，以抵御无助和放弃这两种观念。我不仅怀有这两种观念，也反驳它们，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在晚上，我孩子的肉体与我分开，这一事实折磨着我，前一分钟我想隐瞒它，后一分钟我又想公开它。我不太确定我们彼此间的不同，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白昼与黑夜的差异之中。我想知道我女儿是否留意到，在她生活的一半时间里，我们小心翼翼地喂养她、欣赏她、服侍她、逗她乐、陪她玩，对她十分殷勤，而在另一半时间里，我们把她独自留在了黑暗之中。在白天，她一哭，我们就会干脆利落甚至焦急地去服侍她。在黑夜，哪怕她成功地制造了某种噪声—那噪声听起来与她把头硬塞进自己小床的护栏中所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并慢慢让自己窒息，这一切也会被逐渐忽略。

父母的秘密生活如同恋人的秘密生活一样，到了夜间才会热闹，并且满是奇怪的协定与妥协，以及激烈又无意义的争吵与和解。我们很快意识到，难以将寻找爱的极限与寻找孤独的极限区分开来。如此说来，黑夜展现在独身一人的面前，如同一大片城市绿化带展现在开发商眼前，那种原始的空旷感引诱他们去填满与掠夺它。孩子很快质疑起黑暗的正统性来，表达了自己受到“情绪只能出现在白天”这个说法的冒犯。我试图回忆自己在何时接受了这一习俗，又是怎样接受了这一习俗，我怀疑此事发生在最近，也许发生在我意识到应该将这一

习俗从大量稍显失真的表象世界的形式中挑选出来并传授给我女儿之时。不得安宁的夜晚贯穿于我全部的记忆之中，如同一条可怕大街，住户只有我一人：某些夜晚里，我很害怕，却不敢打扰父母；后来的某些夜晚，我不开心，却不敢打扰令我不开心的人；又或者我敢于打扰，却发现爱的终点是不让你爱的人睡觉。实施酷刑的集中营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他父母通常会迫切地把它告诉刚做父母的人；它也是一部频繁地以紧急呼救的方式来叙述的伪书，又是一种急迫的呼吁，呼吁人们去实施酷刑的家庭集中营里开展营救工作，而自由世界丝毫不关心这个集中营的存在。我想让女儿明白，如果你一直缠着别人，他们会冷淡下来，然后转身离开；我也想让她明白，自信常常被摧毁在最需要自信的地方；可与此同时，为了她，我也想改变这个糟糕的事实，让它变得不真实。我有时有能力去爱她，就好像我有能力变错为对，变黑夜为白昼。

我遇到一位女士，她告诉我，她的孩子—如今他们已经长大并去了外地—晚上从来不睡觉。她和她的丈夫那时候轮流起床，一夜又一夜地陪着孩子们，带着他们下楼去玩耍，直到孩子累得想上床为止。他们还是不怎么睡，她说。她的儿子熬夜听音乐，如今只有他一人独占这些寂寞的时刻。我突然意识到，睡眠就像餐桌礼仪，是一种你必须学习的东西。比较方便的是，有一些探讨这一话题的书。这类书的作者大都是医生和治疗专家，因此书里有很多过往案例分析，我像窥淫癖那样喜欢读这些案例：一位女士在她宝宝的婴儿床边一坐好几小时，还一边打着鼓；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每两小时就要喝完一整瓶奶，她的父母在刚入夜时会把这些奶瓶在窗台上整齐地码成一排，然后自觉地在固定的间歇期走到窗台，把奶瓶递给小孩；一个小孩只会在他父母坐在楼下的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睡觉，他夜里会醒来几次，迫使他父母起床去看电视。在《解决孩子的睡眠问题》一书中，理查德·费伯医生谈及了贝斯蒂的案例，她是个十个月大的宝宝。

> 晚上，贝斯蒂的妈妈或爸爸必须摇晃她，给她揉背，直到她睡着，这通常得花20分钟。他们说，贝斯蒂似乎一直努力保持清

醒，而不是让自己睡着。通常，她先是打起瞌睡来，接着突然睁开眼、环顾四周，然后再次犯起困来。直到她熟睡了15分钟，他们才能把她放到婴儿床上，否则她会醒过来，然后哭起来。很难判断她何时睡得足够沉，足以成功将她放到床上。若她的妈妈或爸爸过早离开摇椅，她可能会醒过来，然后他们只能从头来过……贝斯蒂在午夜12点至凌晨4点间会醒来好几次。每醒来一次，她都会大声哭闹，而且不会自己安静下来。在这样的时刻，她似乎并不痛苦，事实上，每当她的妈妈或爸爸进入房间，把她抱起来并开始摇晃她，她都会迅速安静下来，然后快速入睡……有一次，他们听从了一位医生的建议，打算让她哭到自己睡着。贝斯蒂却哭得越来越厉害，一个半小时以后，她的父母觉得自己太残忍了。

贝斯蒂的父母让我觉得很温暖，哪怕贝斯蒂本人并未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到安心，使我相信，在那些爱出风头、声称自己要么从未要么一直放任自己孩子大哭的人群之中，也存在一个由犹豫不决、愚笨不堪的人组成的联盟，而我正好是其中一员。夜幕降临，如同渺无人迹的大海上起了暴风雨，我们航行在其中，船上没有船长，只好轮流施展自己的手段，这些手段时而极端，时而感性。我们英勇且残酷，一开始很有权威，后来很恭顺，我们既不明白我们在做些什么，也不明白怎么做才合适，因此全靠猜测、灵感和奇怪的习惯。一个朋友来我家过夜，到了早上，透过我们卧室的门缝，她慢慢地朝卧室里面瞄了一眼，显得有些难以置信。我们上一次见她是前一晚，自那以后，我们跑了一场马拉松，进行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8]式的谈判，还扑灭了数起森林大火。我们的女儿坐在床上，坐在遍体鳞伤的我们之间，如同某个凯旋的迷你拿破仑，挥舞着她的拨浪鼓庆祝着胜利。那个朋友在她的房间里无意中听到了我们的夜间冒险所发出的动静，离开时，她觉得—情况基本属实—没有人睡着过。你得做些什么，她说。你这是自找麻烦。我突然特别想哭，想忏悔，想得到一个不带偏见、能使我心情放松的拥抱。突然我觉得有了精神创伤的体验。有将近一年时间，我在晚上上床时，都觉得大门敞开着，

觉得炉子里有什么东西，觉得闹钟被设置成每小时响一次、一直持续到黎明，每次还得想出一个法子来让它安静下来。我像其他人起床上班那样上床，保持警惕，高度紧张，做好准备以迎接大战。

我请教了费伯医生，他向我保证，他从业多年，除开那些重度残疾者，还从未遇到过最后没成为睡觉好手的孩子。想到那些残疾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我便无法继续读下去。费伯医生如此漫不经心地提及这个群体实在是明智之举。我接着读下去，同时明白了我所体验的并非精神创伤，只能算不适。别给孩子服用镇静剂，费伯医生继续说道，药物最后会让问题变得更糟。事实上，我之前从未想过这么做。原来还能这么做，现在我算是知道了。费伯医生显然认为孩子的睡眠问题是父母造成的。他说，你可以让他们一直哭下去，但无法让他们一直睡下去。在精神上，我把自己赶走，就像赶走一只孜孜不倦地夺人睡眠的苍蝇。我意识到，睡眠大战似乎确实会出现在最前线，即父母忍耐的临界点。《我的孩子不睡觉》的作者赞成这一理论：他们说，如果父母决定去解决某个问题，通常这个决定本身就能解决问题。我开始将女儿想象成某种古怪的睡魔，有着小小血肉之躯的她化身为我的梦魇。我明白自己必须把她驱逐出我的梦境—可我该怎么做呢？

费伯医生并不完全相信让孩子一直哭下去那一套。他说，让孩子一直哭下去会导致孩子经常哭。我渐渐觉得费伯的理论虽然复杂，但很有趣。宝宝难免有时会哭，他补充道。一开始，宝宝的期待得不到满足，这会让她哭；不过她很快就会知道你们到底能做些什么了。有迹象表明，她会弄清楚我们能做些什么，并且认同我们能做的一切，而不是向当局控告我们。话说回来，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呢？费伯医生邀我翻到第74页，看一看他的时间表。该表由成列的数字构成，它们精确地代表着不同的间歇期，在这些时候，你暂时获准可以看一看你那正在哭泣的宝宝。我的目光游弋到了反面，上面印了另一个时间表，表上也有成列的数字，并印有“帮助你的孩子学会卧床休息：若你的孩子不想卧床休息，你应该让门关闭多长时间”。我提心吊胆地翻回了第一个时间表。某个脚注告诉我，我们的目标是让宝宝在婴儿床里待上一整晚，不去画蛇添足地摇晃、按摩、轻拍或喂她，大概也

不能突然怒气冲天，也不能让宝宝觉得我们不在或外出旅游了。费伯说，她哭的时候你该去看看她，这样一来，你会引导她做选择，而不是放弃希望。选择如下：睡觉要好过让某人每隔七分钟风风火火地冲进你的房间，用一种又蠢又惨的表情盯着你看，然后离开。《我的孩子不睡觉》推荐了一种类似的做法，它叫“检查法”。“检查法”比“探视法”更加以父母为导向，旨在让你放心，告诉你宝宝哭不是因为受伤，也不是因为某个胆大妄为的邻居从卧室的窗子爬了进来，企图谋杀她。可是，“探视法”之所以异常科学，是因为宝宝哭得越多，两次探视之间的间歇期便会逐渐增长。宝宝因此一直处在不利局面中。费伯医生给了你一份供你填写的表格—它指出了你孩子的作息习惯—好让你在等待过程中继续忙碌着。

现在才下午3点钟左右，可我突然可怜起自己来，于是立即把表填好。表里面有方块状的阴影部分，它代表着宝宝的睡眠时段，空着的部分代表着她醒着和哭着的时段。填好后，它像是一个钢琴键盘或一块墓地。费伯接下来详细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案例，她的丈夫执意让她起夜好几次去给孩子喂母乳，因为这是让孩子重新睡觉的唯一办法。很快她便对丈夫和孩子感到了不满，然而，她没有拖着自己的身子和乳房去别处咨询，而是明智地拜访了费伯医生。我意识到自己太过自负，没一丝不苟地听从他的建议。可某天晚上，我确实尝试着去大致照他的建议去做。只需要一口，她便不屑地榨取和耗尽了那些早期的两次探视之间的间歇期。8分钟？13分钟？她咆哮着，怎么着，你觉得我很胆小吗？这个间歇期持续了35分钟才结束。在黑暗中，我们沉默地躺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如同坟墓里的宫廷人物。宝宝在隔壁发怒、咆哮，她哽咽着，看起来一次能好几分钟都不用呼吸。我在想她是不是真的病了。我确信自己能从她的哭声里听出某个痛苦的音符，这哀伤之声夹杂在她那出离愤怒的和弦之中。我觉得她有些不对劲，我一边说，一边一跃而起。片刻之后，她到了我们床上，一边用勺子大声吃着药，一边咯咯地笑。第二晚我们又试了一次。我已狠下心来。我仓促地跑去看她，态度很冷淡，然后，她那婴儿式的愤怒如一阵狂风一般把我吹出了房间。到了凌晨2点，她不仅专心致志地完成了费伯的时间表上的安排，还附带了一个插曲、不间断地连哭了

3小时15分钟：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费伯医生计划里所设想的时间极限。如今我们得全靠自己在这块未知领域闯荡，高明的医生也不敢在此漫步，这里充斥着虚构出来的残忍怪物，虐童行为，也许甚至还有与哭声相关的脑损伤；知道这些以后，我们感到忧心忡忡。哭声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我努力地听着，听到了一阵又一阵柔和的啜泣声。我感到很内疚，同时也预见了可怕的未来，于是我走进了宝宝的房间，在那，我发现她虽然站着，但明显睡着了，她的身体靠着婴儿床的一边，拳头紧紧抓着婴儿床的护栏，那张小脸蛋塞进了护栏的间隙中。她的脸上一阵抽搐，嘴里发出了呜咽与叹气声。我轻轻地让她身体放松，把她放下来，盖上毯子，我悲哀地做着这一切，就好像在埋葬她。

我回到床上。黑漆漆的屋子里非常安静。我觉得自己以一种粗暴、非法的方式换取了这种安静，如同一份死亡契约。我记得曾在某处读到，原始社会里的人们全都睡在一起，成群结队地和他们的宝宝挤在一起。他们也许会围绕在火堆旁，生火是为了防范野生动物。他们不会在凌晨3点坐在他们孩子的卧室外，手里还拿着秒表和育儿手册。我知道，尽管在过去，所谓的“共眠”与贫穷和乱伦有关，但在某些地区和大床上，人们却狂热地坚持着这种做法。在夜晚这片遥远的地区，我有些内疚地思考起共眠的哲学意义来。我再次体验了一番我女儿的哭声，现在我听着这哭声，觉得它很合乎情理，仿佛我女儿马上要上绞刑架，正在竭力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们不该独自睡在不同的房间里！她恳求道。在原始社会里，他们围着漂亮的篝火睡在一起，跟动物一起！质疑在不同房间里分床而睡这一基本命题就像是质疑警察是否正直，或者医生知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世界变了颜色。一个因努力、决心和判断而产生的令人生畏的新领域显现了出来。

虽然如此，我还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并愈发确定我做错了些什么。我考虑去房间里叫醒女儿，补偿她一点儿什么。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不久后，从宝宝的房间传来一阵噪声，这噪声最初时断断续续，然后持续稳定，一直传到正因为沉思而受到折磨的我身边来。一开始是沙沙声，后来是嘎吱声，再后来是砰的一声。安静。沙沙，嘎

吱，砰。沙沙，嘎吱，砰。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并非是哭声，而是某种说话声。沙沙，嘎吱，砰。然后是开心的笑声，如同某人在参加鸡尾酒派对。我默默起身走进了她的房间。在黑暗中，我能辨认出宝宝的婴儿床上有一个奇怪的模糊影像，像是某种被毯子覆盖的金字塔。伴随着一阵嘎吱声，这金字塔倒向了一侧，重重地落在了床垫上。再次响起孤零零的笑声。在毯子下面，宝宝再次把屁股翘得高高的，手脚并用来保持平衡，形成了一个人形三角形。砰的一声，她又落在了床垫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感到既困惑，又有些害怕。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完成了一次夜间旅行，它持续了一年之久，旅途中我只使用了两种情感工具：愤怒与懊悔。面对这种新局面，我既不愤怒，也不懊悔。她没哭，也没有不开心，甚至都没向我提出任何要求。可是，尽管她能够自给自足，她那古怪的行为却在挑衅和折磨我。与此同时，依据我们的睡眠战争中的条款，我无权去干涉她这种行为。她似乎早早地就理解了青春期的本质。

“一个人睡着时，”普鲁斯特在《在斯万家那边》写道，“周围萦绕着时间之丝，岁岁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他的身边。”有没有可能违背自己所在位置的地理规律，使自己无法在时间的地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呢？不睡觉即不让你的创造力得到喘息，让自己困在不断扩展的活动范围之中。可是，我所记得的睡眠，那曾经的睡眠，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一种过时的，类似于某个阿尔卑斯山村的田园生活吗？也许它甚至从未存在过，尽管我着迷于“找回睡眠”这个想法，也确实记得睡觉时那种空荡荡的滋味。没了睡眠，那些无处藏身的夜晚漫长且荒凉，如同山峦般无情；或者说，夜晚变得忙碌且琐碎，带着令人头痛的霓虹灯光，如同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我曾梦想着自己重回睡眠的怀抱；如今我梦想着女儿重回睡眠的怀抱。仿佛我已放弃了睡觉的希望，或是害怕对它感到失望；无论如何，对我来说，睡眠似乎变成了一个闹鬼的地方。如今，我会因为想起她的哭声而醒来，这让我的作息时间与原来一样。有时候，若我长时间地躺着睡不着，她也会醒来哭泣，仿佛是我让她醒来的。我常怀疑确实如此。总之，大多数的夜晚里，我依旧因为她而至少起一次床；而另外

一些时候，我会自己默默醒来，就好像某个忠实的老人，虽然无处可去，但依旧获准保留过苦日子时的习惯。我希望我女儿能睡觉。至于我自己，我会等待清晨的到来。“我划亮一根火柴看了看表，”普鲁斯特继续写道：

> 时近子夜。这正是病羁异乡的游子独宿在陌生的客舍，被一阵疼痛惊醒的时刻。看到门下透进一丝光芒，他感到宽慰。谢天谢地，总算天亮了！旅馆的听差就要起床了；待会儿，他只要拉铃，就有人会来支应。偏偏这时他还仿佛听到了脚步声，自远而近，旋而又渐渐远去。门下的那一丝光亮也随之消失。正是午夜时分。来人把煤气灯捻灭了；最后值班的听差都走了。他只得独自煎熬整整一宿，别无他法。[39]

呼吸

我的朋友米兰达告诉我，她在夜里醒着听她宝宝的呼吸声。米兰达的宝宝叫亚历山大，比我的宝宝大三周。他的头大脸白，一张小脸轮廓分明。他的额头巨大无比，如同地球仪上的辽阔大海，因为凸了起来，离他眉毛的那一部分很远，与他那头帽子似的秀发的“北极点”相接。他很健谈，做起手势双臂挥来舞去，仿佛他正热心地用一种我不理解的语言跟人说话。米兰达和我怀孕时，我以为我们情况相同，处在同一战线上。亚历山大出生后，我给她打了电话，我马上就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合谋怀孕之后，生孩子几乎等同于背叛。她的丈夫叫她来接电话时，她花了很久才来到电话跟前，很明显，她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独自一人去的，她回来以后已经变了个样。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也许情况就是这样。她把生孩子和宝宝的点点滴滴都讲给我听，我觉得她对我说这番话的语气同对所有人说这番话的语气一模一样。对啦，你过得怎么样？她最后说道。她说这话的语气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就像独自在派对中站着的某个人，受到了她的怜悯。仿佛她被选举担任某种要职，被挑中成为高我一等的角色。话说回来，不论在我看来她是否需要我，我依然差不多每周都跟她打电话。对我来说，单单我们相同的窘境就足以把我们绑在一起。在我看来，我们如同来自同一个遥远小岛的移民，注定会彼此联系密切。

她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差点去问她为什么，在我看来，听亚历山大呼吸这个想法真的很奇怪。在夜晚，我有时会把枕头盖在我脸前，以此来隔绝宝宝发出的声音，她的呼吸声里包含的曲折故事，充斥着她夜间生活的奇怪尖叫声和吱吱声，还有那些停顿的时刻。不这么做我睡不着。出于某种原因，我想象着亚历山大的呼吸更加有规律，他用力地大口呼气与吸气，在黑暗中，米兰达像医院的监视器那样警惕地待在他身边，她做好了准备，如果呼吸停止，她会像闹钟一样突然发出声响。我并非故意觉得她对宝宝的关心有些荒谬，只不过是因为我在这方面太简单粗暴，太缺乏经验，太专注。亚历山大的身形、气

味和存在并不能让我生出爱意来。只有将其转换为我做母亲时所用的语言，我才能理解米兰达为何如此警惕。

她说自己可以一小时接一小时毫无睡意地躺着，记录她儿子的呼吸，收集这些信息。有时候儿子醒了，在饥饿的驱使下结结巴巴地说着话，恢复了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在帮儿子逃过睡眠的死亡视差之后，她自己终于可以沉浸在睡眠中。考虑到这时她还必须起床喂儿子，所以说这么做也很不方便。她未来生活的场景在我面前展开，形势急转直下，颇具戏剧性，且无可反驳。我曾认为没有人跟我一样累，没有人跟我一样因为夜晚所遭受的伤害而伤痕累累。那你什么时候睡觉呢？我问。啊，睡觉，她以一种奇怪的口吻说道。没觉可睡了。睡觉像垫肩那样，已经过时了。她是在电话里说的这番话，所以我看不到她的脸。我很好奇她现在看起来怎么样，她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想知道，她曾精心修饰过的那种美是否已变得一片凌乱。人们说我看起来气色不错，可我觉得自己遭人骚扰，被人窃听，就像一个微型芯片遭到了入侵。

我问，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会停止呼吸吗？我曾听说有人不分昼夜地冲到宝宝的婴儿床前，看他们是否还活着，可我自己却从没有这么做的欲望。我强行夺走了我女儿的睡眠，如同一件我想要的礼物，赠予人却闪烁其词。我知道这很可笑，米兰达说。我想其他人也会说一模一样的话，可它还是很有道理，让我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东西，某种重要的东西，某种推测能力。我没想过去研究呼吸那纷繁复杂的运作体系。它让我吃了不少苦头，我觉得它也会让我的孩子吃不少苦头。好吧，我说，他必须得呼吸。为了他自己，他必须得这么做。我说这番话的样子让我想到了某位我厌恶的气势汹汹的保守人士。我知道，米兰达说。然后她说自己读过一本书，书中写到了一些睡觉时死去的宝宝，他们像没上发条的钟那样停了下来，人们找不出他们的死因，如今她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

她这番话其实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它仅仅为我最近几周来对米兰达产生的某种感觉提供了依据，我觉得她就像出自某本书，某本教科书，某本手册，我之所以开始读这种书，是因为生孩子让我首次有了

一种貌似正常却完全莫名其妙的经历。总之，这些书里所说的一切，米兰达似乎都能感受得到。她的生活与书里所写的一致，而我的生活则并非如此。她说的那些事与书中随处可见的所谓母亲的言论一道，渐渐融入了我心中。我之前觉得自己生孩子时得打麻醉药，可真到生孩子时，我在产前培训课里做的呼吸练习就足以让我把孩子生下来了。或者，一开始母乳喂养确实有点棘手，可后来我和宝宝都乐在其中！又或者，一开始做爱确实需要些技巧，可一旦我们掌握了其中的诀窍，那感觉甚至比之前还棒！甚至连米兰达的弱点和恐惧之中也有些让我觉得既冠冕堂皇又得到认可的东西，而我自身的焦虑却回避光明，害怕被公开。不过，这些书我读得够多，所以我还能和米兰达聊得下去，而且其他人也乐在其中。

亚历山大不会停止呼吸的，我说。我知道，米兰达说。这种事情真的、真的非常罕见，我说。我当然知道，米兰达大声说道，我实在是没办法不去想那一幕！原来米兰达读过的那本书是某个女人的作品，她在某天早上发现她那四个月大的儿子死在了婴儿床里。那“一幕”实际上有好多幕：其中一幕发生在她发现他的那个早上，当时的夏日景色非常美丽；另一幕发生在她抬起他的胳膊时，他僵硬的小身躯完全离开了床垫；还有一幕发生在几小时后、人们发现他有一瓶奶还在加温锅里凝结着，那时他的死已成为既定事实，他的生命已成为一段记忆。米兰达说，当然，那个宝宝的父母让宝宝自个儿脸朝下地睡在房间里，那天晚上很热。而且他吃的是奶粉，她补充道。吃奶粉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说。呃，如今他们觉得母乳喂养有助于防止婴儿猝死，她说。我提到我女儿睡觉时也是脸朝下，而且她的腿在身体下蜷缩着，她的脸紧贴着旋转着的地球。这是正在成长的生物做依附动作时的基本姿势。真的吗？米兰达说。她的语气既惊讶又礼貌。

那次谈话后不久，米兰达带着亚历山大来看我。或许不是来看我：也许是因为她必须来，因为我曾好几次带着我女儿长途跋涉地去她家，而她却从来没有看过我，因为虽然她一直保持沉默，但我还是坚持打电话给她，邀请她来我家。于是乎，她终于在某一天来了，她到的时候长舒了一口气，并为自己的经历感到非常骄傲—她坐巴士经过城镇而来，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与她预计的正好相反，亚历

山大没哭，没把尿布弄脏，也没在公共区域像炸弹一样突然爆发。我发现她并非鄙视和我在一起，而是因为她很害怕：她害怕城市，害怕城市的噪声、有毒的空气和种种危险，害怕迈步走入无法预知的地方；她也害怕亚历山大，害怕一旦离开了家的范围，脱离了她的控制，走出了她关爱他的那个熟悉的世界，亚历山大没准会做出些什么来。我发现她对他的掌控还太过粗心，处于初级阶段。亚历山大如同一台她不懂如何操作的复杂机器，他对她做的某些事会做出一些反应，而她却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她只能继续做那些事，不敢尝试其他的事。事实上，我也能在我自己的宝宝身上感受到同样的恐惧，可这种恐惧在我心中激发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让我带着她乘坐地铁或火车进行长途旅行，带着她露营或参加派对。在这些场合，我总是苦不堪言，责任与担心让我无法放松，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以至于忘记了呼吸。我开始头痛，疼痛感在我胸中蔓延。后来我记了起来，吸了好几大口滚烫的空气，它们涌入了我干渴的肺部，让我的喉咙发烫。仿佛在这些场合，我由于忙于照顾别人，居然顾不上让自己活下去了。

整个下午，亚历山大都在哭嚷和啜泣。米兰达说，这是因为他正在长牙，因为他需要小睡一会儿，因为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不在乎这些。她把亚历山大从她的乳房上拔了又插，插了又拔，这让他非常愤怒，他的四肢胡乱摆动着，衣服在他那胖乎乎的小小身躯上走了样，让他很不舒服。他们俩缠斗在一起时，奶从亚历山大的嘴里流了出来，溢到了她的衣服上，然后她用他的针织帽擦掉了衣服上的奶。我说，别用帽子擦，我去找块布来。我主动提出帮她抱着亚历山大，希望她能放松一些；她把亚历山大递给我，仿佛是出于礼貌不得不这么做。我不太熟悉他，他比我女儿重得多，气味也不一样。他的身体有些不协调，很强壮，肌肉发达，因为紧张而有些抓狂。把他牢牢抓住就像努力去营救一个溺水者。我太熟悉抱着我女儿的感觉了，所以抱着亚历山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背叛了我女儿。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一直在跟米兰达聊天。米兰达温顺地同意我所说的一切，这让我说得更多了。我谈到了这一切有多么艰难，谈到了夜晚多么混乱，白昼多么迷茫，谈到了没有朋友，被过去放逐、遭到排斥，谈到了宝

宝无言的专政，以及独自陪着他们一整天这项奇怪的让人着迷的任务，还谈到了我觉得自己患了幽闭恐惧症，觉得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盒子里，觉得自己无法呼吸。对呀，对呀，米兰达一边说，一边矜持地点着头。我一直说到我觉得她没在听我说话，这时候她开始说起话来。不过这也很棒呀，她说。你不能忽略所有那些美好的事物。她特别坚定地说着，可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分钟的时间。仿佛我又在读那些书。我差点说，没有任何美好的事物。这时候她已经把亚历山大抱了过去，她又在喂他吃奶，所以他非常安静。我很好奇，她这么说是不是因为她必须这么说。我想问她那些美好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她回家时说她玩得很高兴，能够顺利出门还真算得上是一项成就。我相信她说的话。

某一天，我在书店里发现了米兰达谈到过的那本书。我女儿在婴儿车里睡觉，于是我把婴儿车停在了书柜旁，然后在书店里读起那本书来。我读得很快，大致浏览了一下所有章节，认真读了我觉得会出现重要内容的部分。书里有一些图片，我仔细看了看。那个死掉的宝宝看起来比我预想中的要更大，更加活泼。我不相信他死了。我也不相信米兰达真的买了一本如此残忍且伤感的书。我翻到了写她母亲发现他的那个早上的那一页，这时泪水从我眼里涌了出来，这股力量如此强大，让人感到痛苦。我擦了擦眼镜后面的眼睛。作者写道，她抱着那僵硬的小身体，孩子的双手交叉着。我也想举起我那睡着的女儿，就这么抱着她。我意识到，我可以一直拥有我女儿，留住她，这个想法在爱的驱使下，以无法控制的感情将我吞噬。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写到了与家人去度假—等到一切都烟消云散后—他们去了宝宝活着时去过的最后一个地方。一天早上，她起床后穿了一条背心裙，她很久没穿那条裙子了。在裙兜里，她找到了宝宝的一只小袜子；她闻了闻袜子，闻到了宝宝的味道，之后泪如雨下。

炉火

我女儿摔倒后在一块锋利的石头上磕破了脑袋，我把她抱起来，正准备安慰她的时候，她却努力想挣脱我的怀抱，她那张恐慌的脸因为眼泪和鼻涕而变得一片模糊。她想要她的爸爸，疯狂且盲目地想要摆脱我。甚至在她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都能更敏锐地感受到我自己的痛。我继续惊讶于做母亲的这种神话居然如此接近事实。我需要做她的母亲，与此相比，她没那么需要我的照顾。我想全身心地关注我的女儿，这种关注扎根在我身上，我无法切断与它的联系。我发现，虽然我希望她能够独立自主，而实际上我所希望的，是自己不去依赖她，而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你可是从我身体里出来的！我想说。我为她提供的是我在生活中常渴望的东西：另一副让你专注、拥抱你、包围你的身体，或是另一种让你再次与其融为一体的环境，可她不想要这些。这一刻，未来的景致清晰可见，这个幻象持续时间很短，仿佛被闪电照亮。我在这幻象中发现自己在今后十年、二十年和三十年都会有同样感受，不因时间或时代风气的流逝而麻木。

我已经开始怀念我女儿的婴儿时期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我眼见着现在成为过去，并亲眼见证了生活有了渴望的味道。伴随她的出生而新出现的暴风骤雨似的情感如今已经平息。我发现我活在对于自己拥有的一切的了解之中，所以我能在幸福消失前见证它。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这一壮举，才学会这种之前一直与我无缘的技能。我明白，这意味着我正止步不前。我有时觉得做母亲有点像参加接力赛，这一过程的目的在于传递生命以及所有的功和热的接力棒，前一分钟还匆匆忙忙，后一分钟则气喘吁吁地做起了观众。它也像种集体性的事业，这项事业里，明星总是变来换去。我眼看着女儿匆匆离我而去，猛冲向属于她的未来。看到那一幕，我意识到一段时期即将结束，另一段时期即将开始，也意识到了我生命的界限所在。

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有时，我抱着自己的女儿，试着为了她去理

解这种归属感，感受自己的可靠与固执，并捕捉自己的气味、形状和气场。我试着还原她刚出生时的场景。我试着想象有我这样一个母亲到底是种什么滋味。等我真的这么去做的时候，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笔重要的神秘交易已经在此完成了，就在我家。我提到的交易并非那场将我女儿带到这个世上来的交易：其实是让我成为一名母亲的那个过程。我知道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一件事，可我还是担心自己在做这件事时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瑕疵，而且不够可靠，就像一道烧煳了的菜，一张弄得一团糟的画布。也许只有孩子才能将这种我觉得自己欠缺的意义赋予他们的父母。我不以为然。相反，我认为家庭构造中存在一些固有的保守主义，恰恰是父母将麻烦的领导文化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孩子一旦自己开始掌权，便会像政客一般，通过确保其艰辛且枯燥的衣钵来扮演他们儿时所惧怕的权威角色。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决心，成了自己曾有过抱怨与抗议的对象。他们尊重自己讨厌过的人。那些曾激怒他们的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了一种奇特且神秘的宁静感。我常听人们说，因为自己做了父母，他们真能理解自己的父母了。这种情绪让我很不安，也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某种错误像疾病被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去。这感觉让我想要容忍我的女儿，直至我的容忍不起作用，因此岁月不会败给误解。我发誓要拥有这种别扭和不真实的感觉。我发誓要结束这种继承关系，结束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就在这里，由我亲自来终结。

短暂的停顿开始出现在如何做母亲的这张乐谱上，这些沉默的时刻如同不同曲目之间的安静时刻，虽被音符环绕，但依旧沉默。在沉默中，我开始短暂地瞥见自己，我像打我窗前走过的某个人。那景象让我震惊，如同看到了被认为已离世的某个人。女儿与我渐行渐远，于是乎，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一瞥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久。我意识到，我把她依赖我的每个阶段视作一种不变的新的现实，仿佛我住在某个房子里，房子里的房间正在刷漆，忘掉了我曾难得有机会去使用这些房间。一开始还给我一间房，后来又还给我一间。楼梯依旧还是楼梯。夜晚再次变得模糊且寂静。时间不再让人感到惊慌，不再满是陷阱：事情经得起等待，可以被解释清楚，也能延期。我的身体失去了她出生的那段记忆，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如同少女一般，

既年轻又轻盈。

我女儿意识到我与她有所不同。她把她的午餐让给我，还挠我的脚。她逗我笑。我在我的兜里和鞋子里发现了一些东西，有树叶和贝壳，吃了一半的饼干，一个洋娃娃的微型塑料手包，都是她放进去的，就好像献给某个不重要的女神的一点祭品。有一次，我外出后回到家，她穿过走廊一阵飞奔，然后投入了我的怀抱中。我把她举起来，给了她一个拥抱，好像她是我以为自己弄丢了的某件物品。还有一次，我很沮丧，在其他人外出散步时想要留在家里，这时，我发现她穿着红色外套站在门前，脸上写满了焦虑。她拿起我的靴子，把它们放到了我的座位旁。另一个大人把她抱了起来，然后带她出了门，却没注意到她此前的举动。她们关上门，留下了我和那双靴子—它们代表了她对我的爱—让我和它们整齐地并排坐在厨房的地板上。

在我看来，做母亲这件事渐渐成了一份工作，而非一种状态，一份有确定上下班时间的工作，它有始有终，不用工作时我是自由的。我女儿愈发融入这份自由中，某种新事物经过日复一日的点滴积累，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们成了一种混合物，一项实验。我还不清楚她的存在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可与照顾她这项单纯的工作相比，这种存在提出的要求更深刻，更让人不安。她生命的头一年里，工作与爱被极度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让人感到痛苦。现在，仿佛某种关系脱离了束缚，在我们家中随心所欲。疾风骤雨般的联系在她周围肆虐，起初我发现这变化让我得到了解脱，仿佛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说某种外语，最后终于可以说母语了。事实上，她等了这么久，并非只是为了和我说话：她学会了同他人建立联系，这种能力如同触手一般，源于她自身，又得益于她的成长。等到我们终于能够交谈，这时候我发现她已做了决定，完全成形，且不听劝告。我同她的关系就像我同任何人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体现为一种对统一性的追求，这种统一性虽已丧失，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让我觉得有望重新找回它。我记得这种统一性，也记得那满是雪花的屏幕里，她那两英寸长的身体躺在我漆黑的身体中，仿佛一切发生在昨日；我们俩本来密不可分，对她来说这种状态却遥不可及；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我坐在沙发上和她一起看动画，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她，她不耐烦地甩开我那只胳膊。

几分钟后，她把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放在我膝头，仿佛在安慰我。我们俩都没说话。我们像是尴尬的恋人，像两个老人，笨拙地共度寻常岁月。在这种时刻，我感觉自己仿佛在历经了保险条款中所谓的天灾—如飓风、洪水—后活了下来。它在我周围肆虐，威胁要大搞破坏，随后消失不见，灾后一片寂静，世界满是遭到破坏的事物，我一边耐心地修补着这个世界，一边好奇我到底能抢救一些什么，是否从头来过会更好。

我独自去伦敦过周末，我沐浴在城市夏日刺眼的阳光之中，在牛津街上傻乎乎地走来走去。一切都显得有些科幻，这种感觉很奇怪，仿佛我被一台时间机器留在了那里。我想买衣服，想为这两年的时光做一些补偿，在这两年里，我远离时尚，如同一位人类学家做了一次长期田野调查；可我看不懂衣架上那些衣服，觉得它们与我无关，就好比虽然有戏服，但我已经不再演戏。我对自己不感兴趣，因此学不会如何挑衣服。在生活中，我没把自己当成明星，因此也没急着去打扮自己。我身处幕后，只是个配角。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再与时间同步存在，时间在我这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迟，仿佛我在打越洋电话。我想，这便是做母亲的意义。在商店里，我愈发感到紧张和焦虑，这种感觉非常糟糕。因为恐慌，我的心脏在胸中一通乱跳。我很想念我的孩子，如同想念某个与我一模一样的人似的想念她，她如同一艘领航船，在我前面的航道里飞快地航行，洋溢着青春活力，充满了自信，引领盲目且笨重的我前进。我去了某家百货公司的儿童区，我周围全是婴儿车、宝宝的衣服、玩具泰迪熊和小鞋子。我放松多了，感觉获救，再度活力满满。

我一整天都能听到不同宝宝的哭声，这种连绵不绝的哭声来自别处，很微弱，很悲痛，从空中传到我耳旁；每一次我都会因此而立即颤抖不已—那感觉很尖锐且刻不容缓—我必须强迫自己不四处乱看。在儿童用品部，一个离我不到六英尺远的宝宝哭了起来。哭声很小，不加任何修饰，来自刚刚出生了几天的宝宝。我抬起头，看到了那辆婴儿车，宝宝的母亲一只手发了疯似的摇晃着婴儿车，另一只手在那些挂在衣架上的婴儿服里仔细搜寻着衣服，她的脸像一只紧握的拳头一样。她正语气迫切地跟一位站在她身旁的年长女士—她的母亲—争

论着什么。宝宝哭得很急，哭声的间隔时间不到一个拍子的时间。我知道，这意味着那女人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挑选并购买一整套衣服，可她的母亲却不满意她挑的衣服，正在向她抗议。看她走路的姿势，我知道她的身体还处在生产带来的震荡之中。回家吧，我心里想着。回家吧。把宝宝用茶巾裹起来就行，她不会在意的。算了吧，回家去吧。可她偏不让步。她在脑海幻想过这一次购物之旅，她坚持自己的幻象，并且面露凶相。她无法忍受问题未解决或事情未完成，她担心如此一来，任何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她正努力跟上节奏，不被时间抛弃，现在还想逆流而上。我看见她偷瞄了她母亲几眼，眼里满是渴望、困惑与苦痛。这么多年过去后，她发现了她母亲的秘密，不知何故，这一发现让她有些失望，因为在分娩后的头几天里，她既是母亲，又是孩子；她在脆弱的自己身上感受到了澎湃的激情，可这种情感却得不到她母亲的回应，她母亲只是一味地否定，无情地想去驳斥。多年来与人打交道的经验扎根于她母亲的心中：如同钟乳石、苔藓那样悬挂于心上。她自己的心崭新且质朴，拼命跳动。时间也会将这颗心变得冷酷无情吗？

那个宝宝还在哭个不停。我不能把它从婴儿车里抱出来，不能把它那害怕的小身体紧贴在我胸前，不能一直抱着它，直到它不哭了。我非常确定它会停止哭泣，也非常确定它知道我对它的关心，而且会得到安慰。

译后记

在《成为母亲》的题献部分，作者蕾切尔·卡斯克写道："献给艾德里安"。卡斯克提到的这位"艾德里安"实际上是英国摄影家艾德里安·克拉克（Adrian Clarke），彼时的他是作家的伴侣—书中在提及艾德里安时所用的词皆是partner，两人有过一段婚姻，如今早已分开。卡斯克曾在BBC与《卫报》等媒体上翔实地公开谈论两人的婚姻，甚至就两人的离婚写过一部名为《余波》（*Aftermath*）的非虚构作品，能用如此篇幅去对待或审视这份感情，恐怕也只有勇气十足且个性十足的作家才做得出来。

而在致谢部分，作者提及了其继女莫莉·克拉克（Molly Clarke）。"继女"一词乍看起来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看到"克拉克"这一姓氏，又知"艾德里安"也姓克拉克，一下子便明白这位莫莉乃艾德里安与前妻所生之女。卡斯克能在致谢部分提及莫莉，足见她与其继女感情深厚，她甚至在同一部分也动起情来，写下了颇具泪点的一句话："在某年2月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把她的幸运项链送给了我，也许她已不记得这一幕，我却记得。"

好一句"我却记得"，搭配画面感十足的前半句话，显得既克制又饱含深情，一如《成为母亲》的行文一样：大部分内容为卡斯克冷静的分析与反思，偶尔写到煽情处，又分明能够让读者诸君大哭大笑起来。而让我最有感触的是这句话之前的那句："我希望她某一天能读到这些内容，并喜欢它们。"此处的"她"指的正是莫莉，而"这些内容"则指本书。

理性的反思之处如此直白，感性的煽情之处却如此含蓄—以至于含蓄到读者不去花费时间查证，很难体会到作者之用心。在我看来，这算得上是《成为母亲》这部小书的一大特别之处。

《成为母亲》之所以是一部特别的作品，还因为书中充满了"别

样的真实”—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我通常接触到的育儿类或相关书籍在讨论如何做母亲这一话题时基调愉快且幸福，内容则简单明了，清晰易懂；而卡斯克的这本书却有着较灰暗的底色，直指做母亲的各种难处与困境，部分内容甚至晦涩难懂。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反映了怀孕的真实状况与为人母者的惯常心态。诚然，此书的出版在当时也引起了颇多争议，甚至有读者批评卡斯克在怀孕期间爬山，或是把孩子困在厨房（详见The Independent官网上一篇名为“Rachel Cusk：The Myth of Motherhood”的文章）。在我看来，因为后者不符合主流或不去迎合读者的阅读预期而否定后者，这种做法似乎有失偏颇，不具说服力。套用当下较流行的词汇来说：“小确幸”见多了，也该偶尔见见“小确丧”，是吧？

更何况《成为母亲》并非只是一本对做母亲有颇多抱怨的书。卡斯克也绝非只是一个异想天开、满肚牢骚的神经质小说家。除开就事论事之外，她在文化观察、政治评论以及文艺批评方面的独到见解也展现在此书之中。

《成为母亲》的文本之所以有如上提及的特点与质感，与作者的身份有着很大关系。本书作者卡斯克多数时候以小说家的形象示人，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曾在2003年将其纳入“20位最值得关注的英国青年小说家”之列（这份榜单里还有大卫·米切尔，扎迪·史密斯以及萨拉·沃特斯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截至2018年，卡斯克已经出版了10部小说，而其发表的非虚构作品只有区区三部，其中就包括本书，这也是她的首部非虚构作品。

小说家写起非虚构作品来，语言的确要比一般的散文或随笔作者更具想象力—这意味着形容词与名词的搭配，对于日常事物的指代方式，甚至是比喻的喻体都显得别具一格，经常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与理解范围；其中，部分情况是由文化差异所致，而另一部分情况则是小说家的艺术细胞与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试举一例：作者曾将面临分娩的自己的躯体比作墨西哥皮纳塔娃娃，并就这种娃娃而展开一番夹带自己幼时回忆的妙论。经查证，方知是墨西哥的传统玩具，玩具内装满了小糖果、娃娃等。每逢重大节日和庆祝活动，当地人喜欢挂

起装满糖果的皮纳塔，用棍棒敲击，然后争抢砸破后倾泻如雨的糖果求得好运气。若没有这些背景知识，恐怕读者在读到这部分时会有些摸不着头脑。

此外，作为小说家，丰富的阅历必不可少，其所阅读的书籍也常常出现在作者的作品中，作为佐证其言论的“依据”（这一点作者在《序章》之中也向读者做了坦白），全书翻译成中文不过10万字的篇幅，作者却引用了诸如托尔斯泰、伊迪丝·华顿、D.H.劳伦斯、柯勒律治、普鲁斯特等文学大家的作品片段，也摘取了奥利维娅·曼宁，艾德丽安·里奇，甚至理查德·费伯医生等国内读者不甚熟悉的文学圈内圈外人士的言论。

但是，卡斯克毕竟是一位母亲，而且毕竟写了一本关于“何为母亲，何为母性”的作品。本作也反映了一位母亲对于自己女儿的深沉的爱，虽然这些爱意的表达只散落于本作之中，可每次出现都会令人难以忘怀。

从某种角度来说，译者也是读者。阅读本书有颇多感受，更何况，翻译《成为母亲》的那段时间正值我儿子出生的前后。

阅读《成为母亲》是审视亲密关系的过程，甚至也是自我审视的过程。卡斯克向我展示了很多在实际育儿过程中易于忽视的细节，她给我启发、让我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何谓父子”这个宏大的命题。她笔下的育儿世界的色调灰暗，却更加接近真实。渐渐地，书中的内容与现实互为关照，形成了一种别有趣味的互动：我常常不自觉地去观察睡梦中的儿子，并在他夜里突然惊醒、大哭起来时想起“肠绞痛与其他故事”这一章节；翻译“帮手”那一章时，我又会回顾当时家中请来月嫂帮忙的那段时光，对比着曾经照顾我的妻儿数十日的阿姨与卡斯克请的那些“帮手”有何异同……卡斯克常常能以一种超然—甚至有时候有些过于刻薄—的状态去审视母女关系；我效仿着她的行为，与儿子互动时也会不断思考我与我父亲的关系，回想起我小时候从他身上所收获的情感与智性教育。

阅读《成为母亲》的过程也如同“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我的父

母曾把我幼时的照片与我儿子现在的照片拿来作比较，并发现照片中我俩的神态惊人地一致。或许这只是移情作用所致，却不无道理。我一边见证着艾伯丁（卡斯克的大女儿）的成长，一边静静地看着我儿子慢慢长大，这过程就仿佛是重拾我自己有记忆之前那段因年幼而“失掉”的记忆，再度造访那段“记忆真空”；又仿佛是我看着幼时的自己重新成长起来。可我的儿子终究不是我本人，更不是翻版的我，所以如此想法也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哪怕是臆想，它也会驱使着我用照片，甚至通过阅读和写作去记录我的儿子成长过程中那些宝贵的瞬间，并通过文字让它们永远定格在那里。

于我而言，翻译《成为母亲》是个不小的挑战。一是时间上的挑战，二是内容上的挑战。通常情况下，我只能在下班之后，在孩子和妻子入睡之后才能抽出时间来做翻译；周末和节假日时，除开陪伴家人以外，我的大把时间都花在了与卡斯克“相处”上。即便如此，每日的翻译时间也很有限，好在身边的人都很理解与支持，我才得以每日坚持翻译、最终顺利完稿。

即使顺利完稿，我心中还是有许多忐忑与不安。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语言在转化的过程中很容易丢失原有的意义，再加之《成为母亲》文本语言抽象，表达方式委婉，措辞“天马行空”，着实在翻译过程中给我带来不少困难。

面对种种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很简单：不懂就问。问网络，问朋友，问书本，问师长……陌生的单词与表达查词典，不清楚的典故上网搜索或是与朋友讨论，引文则先自行译出，再参考现有的一些译本、进行比较与修正。所有这些过程不仅是为了完成翻译，也是一种有益的学习过程。

在此需要感谢本书的责编朱老师，在遇到重点段落与难点句时，她常不厌其烦地与我进行讨论，在兼顾原文与中文读者阅读体验的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我很感谢能遇到这样的责编，她的敬业精神也能激励我做一个更好的译者。当然，我也深知自己能力不足，时间有限；若出现误译与其他各种纰漏，还望读者诸君指出，也欢迎随时讨

论，以便日后再版本书时及时改正这些错误。

希望我的家人（尤其是妻儿）能喜欢这部作品，也希望读者诸君能喜欢这部作品。

[1]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擅长描写女性在社会中的经历，她被称为美国20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译者注，全书下同

[2]空中交通管制员（air traffic controller），指的是在机场、地区空管局等地工作，负责指挥飞机的起降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安全指挥、控制的工作人员。他们成天在塔台工作，工作压力极大。

[3]皮纳塔娃娃（pinata doll），墨西哥的传统玩具，玩具内装满了小糖果、小娃娃等。每逢重大节日和庆祝活动，当地人喜欢挂起装满糖果的皮纳塔，用棍棒敲击，然后争抢砸破后倾泻如雨的糖果以求得好运气。

[4]约德尔（yodel），源自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种特殊唱法。在山里牧人们常常用号角和叫喊声来呼唤他们的羊群和牛群，也用歌声向对面山上或山谷中的朋友、情人传达各种信息。

[5]《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56年美国导演唐·西格尔（Don Siegel，1912—1991）拍摄的科幻恐怖片。该片讲述了外星人复制小镇居民，逐渐控制全城的故事。

[6]国民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这个体系一直承担着保障英国全民公费医疗保健的重任，遵行救济贫民的选择性原则，并提倡了普遍性原则。

[7]穆兹利（Muesli），一种用碎果仁、干果和谷物混合制成的早餐食物。

[8]会诊医生（consultant），英国医疗体系中的一种医生，通常是经验丰富、职位很高的专家。

[9]蒂罗尔人（Tyrolean），奥地利蒂罗尔州（Tyrol）的居民，蒂罗尔州为奥地利西南的州。

[10] Lily，百合花。

[11]肠绞痛（colic）的准确说法为婴儿肠绞痛（baby colic），并非一种确切的疾病，指的是有些小婴儿会出现的突然性大声哭叫，可持续几小时，也可阵发性发作。哭时婴儿伴有面部渐红，口周苍白，腹部胀而紧等现象。

[12]原文为lifegrief，为作者所生造，将life和grief两词合为一词。

[13]原文为CRY-SIS，是仿造crisis（危机）一词所生造的词。

[14]兰兹角（Land’s End），位于康沃尔半岛的顶端，三面环海，是英国最南端的陆地。

[15]加尔达湖（Lake Garda），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约在威尼斯和米兰之间，坐落于阿尔卑斯山南麓。

[16] E.内斯比特（E.Nesbit，1858—1924），原名为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英国儿童故事作家，诗人，小说家，善于刻画儿童性格，描写家庭生活，真切动人。她以E.内斯比特为笔名，创作了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此处作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细菌“germ”加上通常表示人的词缀“-an”，变成了德国人“German”。

[17] 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1896—1971），英国著名儿科专家与精神分析学家，曾撰写大量著作，阐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滋养或阻碍孩子发展，亦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广播节目中帮助成千上万的父母，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情绪。

[18]奥利维娅·曼宁（Olivia Manning，1908—1980），英国小说家，诗人与评论家，其作品因作家的艺术眼光与生动描写而广受赞赏。《巨大的财富》（*The Great Fortune*）是奥利维娅·曼宁发表于1960年的一部小说，乃曼宁“战争财富”（*Fortunes of War*）六部曲的首作，六部曲讲述的都是“二战”对于一群身处外国的英国人的影响。

[19]中央沟（central fissure），大脑最为显著的脑沟，大脑以此来分割两个主要的“叶”：额叶和顶叶。

[20]此处的温度单位为华氏度，100华氏度约等于37.8摄氏度。

[21]齐默助行架（zimmer frame），老年人以及虚弱的人用来帮助走动的金属框架。

[22]玩偶盒（jacks-in-the-box），一打开盒子就会弹出一个玩偶来吓人一跳的玩具。

[23]伏尔甘（Vulcan），罗马神话中的火与工匠之神，罗马十二主神之一。他是长得最丑陋的天神，而且是个瘸腿。

[24]佩内洛普·利奇（Penelope Leach，1937—），英国心理学家，她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对父母养育子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25]依恋（attachment），一般被定义为婴儿和其照顾者（一般为母亲）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它产生于婴儿与其父母的互动过程中，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和纽带。

[26]玛丽·波宾丝（Mary Poppins）乃同名电影（又译《欢乐满人间》）中的一个角色，为一名仙女。影片讲述了化身为保姆的玛丽来到人间帮助两位小朋友重获生活乐趣，并让他们的父母重享天伦之乐的故事。

[27]美国西部片有一惯例，戴黑帽子的人是反派，戴白帽子的人则为正面人物。

[28]苏斯博士（Dr.Seuss，1904—1991），美国儿童文学家、教育学家。其一生创作

的48种精彩教育绘本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早期教育作品。

[29]原文为postcards from the edge，同时也是一部影片的片名，这部群星汇集、描写母女关系的女性题材电影，同时也是好莱坞人和好莱坞文化的真实写照。

[30]书信炸弹（letter-bomb），一个伪装成信件或包裹的小型炸弹，收信人打开信件或包裹时炸弹就会爆炸。

[31]但丁的《神曲》中，地狱被描绘为共有九层。

[32]建构游戏（constructive play），又称结构游戏，是指幼儿利用各种建筑和结构材料（积木、积塑、金属结构材料、沙、雪等）进行各种建筑和构造活动，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

[33]以下译文摘自《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34]圣特罗佩（St Tropez），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瓦尔省的一个市镇，它以富翁的消暑天堂而闻名于世。

[35]《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的小说。作品从一对少年的友谊入手，描写了伦敦近郊布赖兹赫德庄园一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和命运。

[36]埃迪特·皮亚芙（Edith Piaf，1915—1963），20世纪上半叶法国最著名也是最受爱戴的女歌手，代表作有《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爱的赞礼》（*Hymne à l'amour*）等。

[37]图雷特氏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指频繁的运动性抽动和声带抽动，是一种遗传性的神经内科疾病。

[38]《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指1991年12月9—10日，第46届欧共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通过并草签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欧洲联盟条约》。

[39]以上译文摘自《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李恒基、徐继曾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A LIFE'S WORK by Rachel Cusk

Copyright©2001 ，2008 by Rachel Cusk

Chinese simplif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Horizon Media, Co. , Ltd. ,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